

中日韩三国企业经营课题问卷调查报告 2011

张浩川 日本能率协会 韩国能率协会

内容提要 2011年7-9月,中日韩三国的科研人员首次联手,对三国企业经营者就经营课题的认识实施了同时问卷调查。在此次调查结果中,进一步确认了中日韩三国企业之间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关系,既找到了同处东亚文化背景的相似的企业经营理念,也发现了因各自发展阶段不同所显示出的企业战略上的差异。

关键词 中日韩 企业经营课题 问卷调查

2011年7-9月,中日韩三国的科研人员首次联手,对三国企业经营者就经营课题的认识实施了同时问卷调查。本次调研的结果由各国调研负责人使用各自的母语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三国分别发表。希望公开的这些调查数据可以给中日韩三国企业的发展带去有价值的信息,给企业研究者带去有意义的参考。

一、调查概要

1. 问卷调查的目的

中日韩三国同处东亚,在企业文化、经营理念等方面有着较为相近的社会背景,特别是在制造业的产业链中既有相互合作又有相互竞争。本次问卷调查正是基于上述情况,在确认各家企业各自当前与中期经营课题的同时,增进对他国企业经营课题的认识,结合企业人才管理等现状,为三国企业更加健康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参考。

2. 调查方法

本次问卷调查分别由中日韩三国的研究小组对各自国家的企业经营者实施问卷调查。中国方面实施调查的是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张浩川研究室。该研究室于2011年7-9月使用直接访问、邮件、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回收问卷106张。日本方面实施调查的是社团法人日本能率协会。该协会于2011年7-8月使用发送邮件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回收问卷510张。韩国方面实施调查的是韩国能率协会。该协会于2011年7-9月使用直接访问、邮件、传真和网络问卷等方式回收问卷108张。

3. 特别注意事项

(1)本次调研为了尽可能体现三国经营者的独自经营战略,所以作为样本的中国企业全部选择了民营企业,而日韩两国的企业也全部选用了资本独立的企业(即非受财团或集团控制、独立经营的企业)。

(2)问卷的设定由日本能率协会起草,经中韩双方确认修订制作而成。

(3)涉及金额的部分,中韩两国企业的数据均折算成日元。

(4)本研究成果于2011年末首次在日本公开,在日本经济界产生较大的影响,经中日韩三方确认,本调研项目将在今后几年内连续实施。

二、回答企业的概要

<日本>

1、行业分布(n=510)(详见表1)

表1

行业分类		%	回答数	行业分类		%	回答数
制造业	食品杂货制造	5.7	29	农林、水产、矿业	0.6	3	
	纤维制造	1.2	6	零售业	7.5	38	
	纸浆、纸、纸加工	0.8	4	商社、批发商	8.6	44	
	化学制品制造	5.3	27	证券、金融、保险	0.8	4	
	医药品制造、批发	2.4	12	房地产	1.2	6	
	石油、煤炭制造	0.4	2	土木、建设、建筑	6.1	31	
	橡胶、陶瓷、土石制品制造	1.8	9	物流	5.9	30	
	钢铁、有色金属、金属制品制造	3.9	20	仓库、运输	0.6	3	
	一般机械制造	3.3	17	软件开发、信息服务	7.1	36	
	精密机械制造	1.6	8	通信服务	0.4	2	
	电器、电子机器制造	8.0	41	出版、电视广播、新闻报道	0.4	2	
	运输机器制造	6.3	32	公共服务	0.8	4	
	其他	4.1	21	酒店、餐饮服务	3.3	17	
	制造业合计	44.8	228	人才、教育相关服务	0.8	4	
				警备、保安	1.6	8	
				广告、宣传、展示	0.6	3	
				其他	8.6	44	
				非制造业合计	54.9	279	
				无回答	0.6	3	

2、员工人数(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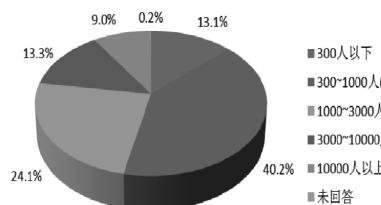


图1

3、2010年销售额(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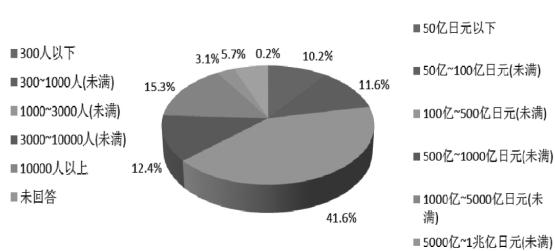


图2

3、海外销售所占比率(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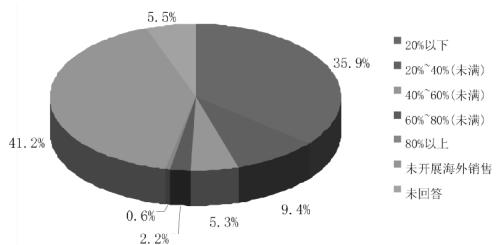


图 3

4、上市、未上市情况(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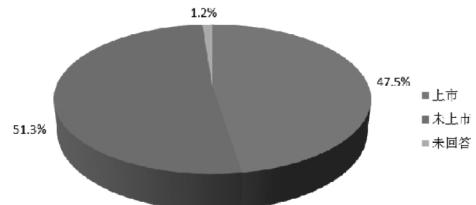


图 4

接受调查的日本企业中,从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大致相当;从员工人数来看,300–1000 人的企业、1000–3000 人的企业占据了大半;从 2010 年销售额来看,100–500 亿日元的企业占据了 41.6%;从海外销售所占比率来看,20%以下和没有海外销售的企业大致旗鼓相当,各自占到了 4 成左右;从上市情况来看也基本是五五开,47.5% 的企业已经上市。

<中国>

1、行业分布(n=106)(见表 2)

表 2

行业分类	%	回答数	行业分类	%	回答数
食品杂货制造	3.8	4	农林、水产、矿业	1.9	2
纤维制造	1.9	2	零售业	—	—
纸浆、纸、纸加工	—	—	商社、批发商	1.9	2
化学制品制造	3.8	4	证券、金融、保险	—	—
医药品制造、批发	0.9	1	房地产	0.9	1
石油、煤炭制造	0.9	1	土木、建设、建筑	0.9	1
橡胶、陶瓷、土石制品制造	0.9	1	物流	3.8	4
钢铁、有色金属、金属制品制造	9.4	10	非仓库、运输	—	—
一般机械制造	18.9	20	软件开发、信息服务	0.9	1
精密机械制造	4.7	5	通信服务	0.9	1
电器、电子机器制造	8.5	9	出版、电视广播、新闻报道	—	—
运输机器制造	0.9	1	公共服务	—	—
其他	21.7	23	酒店、餐饮服务	—	—
制造业合计	76.3	81	人才、教育相关服务	—	—
			警备、保安	—	—
			广告、宣传、展示	—	—
			其他	9.4	10
			非制造业合计	20.6	22
			无回答	2.8	3

2、员工人数(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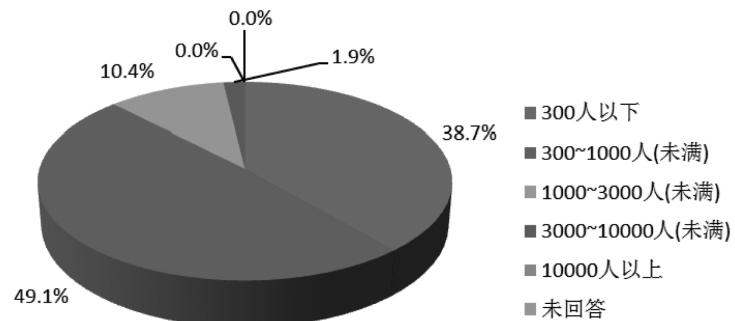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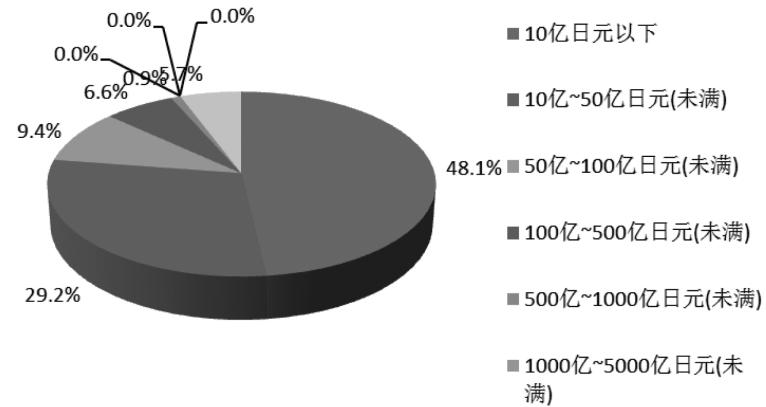


图 5

3、2010 年的销售额(见图 6)



注:收集得到数据经 2011 年 8 月末的汇率(1 元 =12.02 日元)换算。

图 6

4、海外销售额所占比率(见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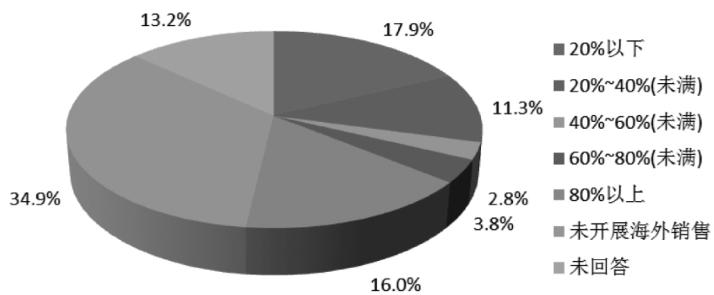


图 7

接受调查的中国企业在，从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占据了76.3%；从员工人数来看，300~1000人的企业占49.1%，300人以下的企业占38.7%；从2010年销售额来看，10亿日元以下的企业占了48.1%，10~50亿日元的企业占了29.2%；从海外销售所占比率来看，未开展海外销售的企业只占34.9%，而海外销售超过80%的企业占了16%。

<韩国>

1、行业分布(n=108)(见表3)

表3

行业分类		%	回答数	行业分类		%	回答数
制 造 业	食品杂货制造	1.9	2	非 制 造 业	农林、水产、矿业	1.9	2
	纤维制造	1.9	2		零售业	5.6	6
	纸浆、纸、纸加工	0.9	1		商社、批发商	11.1	12
	化学制品制造	9.3	10		证券、金融、保险	7.4	8
	医药品制造、批发	4.6	5		房地产	—	—
	石油、煤炭制造	—	—		土木、建设、建筑	1.9	2
	橡胶、陶瓷、土石制品制造	—	—		物流	6.5	7
	钢铁、有色金属、金属制品制造	2.8	3		仓库、运输	1.9	2
	一般机械制造	2.8	3		软件开发、信息服务	5.6	6
	精密机械制造	2.8	3		通信服务	1.9	2
	电器、电子机器制造	2.8	3		出版、电视广播、新闻报道	0.9	1
	运输机器制造	2.8	3		公共服务	3.7	4
	其他	2.8	3		酒店、餐饮服务	0.9	1
	制造业合计	35.4	38		人才、教育相关服务	6.5	7
					警备、保安	—	—
					广告、宣传、展示	—	—
					其他	2.8	3
					非制造业合计	58.6	63
				无回答		6.5	7

2、员工人数(见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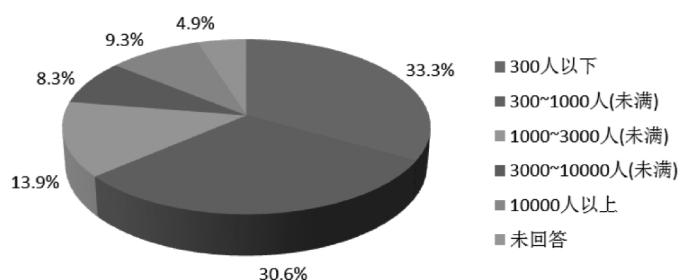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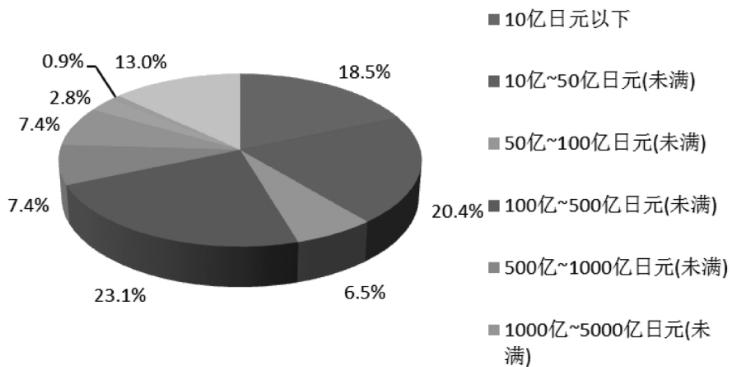


图8

3、最近一期的销售额(见图 9)



注:收集得到数据经 2011 年 8 月末的汇率(100 韩元 =7.16 日元)换算。

图 9

4、海外销售额所占比率(见图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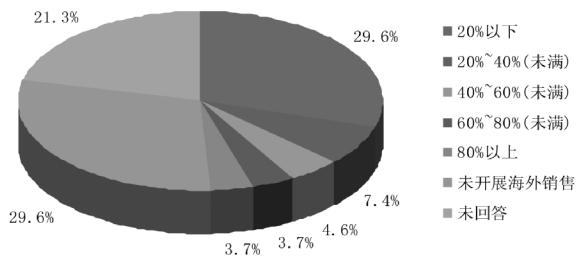


图 10

接受调查的韩国企业中，从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占据了 35.4%，非制造业占到了 58.6%；从员工人数来看，300–1000 人的企业占 30.6%，300 人以下的企业占 33.3%；从 2010 年销售额来看，100–500 亿日元的企业占了 23.1%，10–50 亿日元的企业占了 20.4%；从海外销售所占比率来看，超过半数的企业经营着海外业务。

三、调查结果

1.当前的经营课题与中长期的经营课题

(1)对当前经营课题的认识(详见图 11)

就当前经营课题的认识，中日韩三国企业不谋而合地把“扩大市场份额与销量”放在了首位。对日本企业来说，第 2 位是“提高收益率”(51.2%)，第 3 位是“强化人才培养”(39.8%)。而中国企业把“新产品、新服务、新事业”(34.9%)放在第 2 位，“强化公司治理”(24.5%)放在第 3 位。韩国企业则把“提高收益率”(39.8%)放在第 2 位，“全球化经营”和“提升产品服务质量”(22.2%)放在第 3 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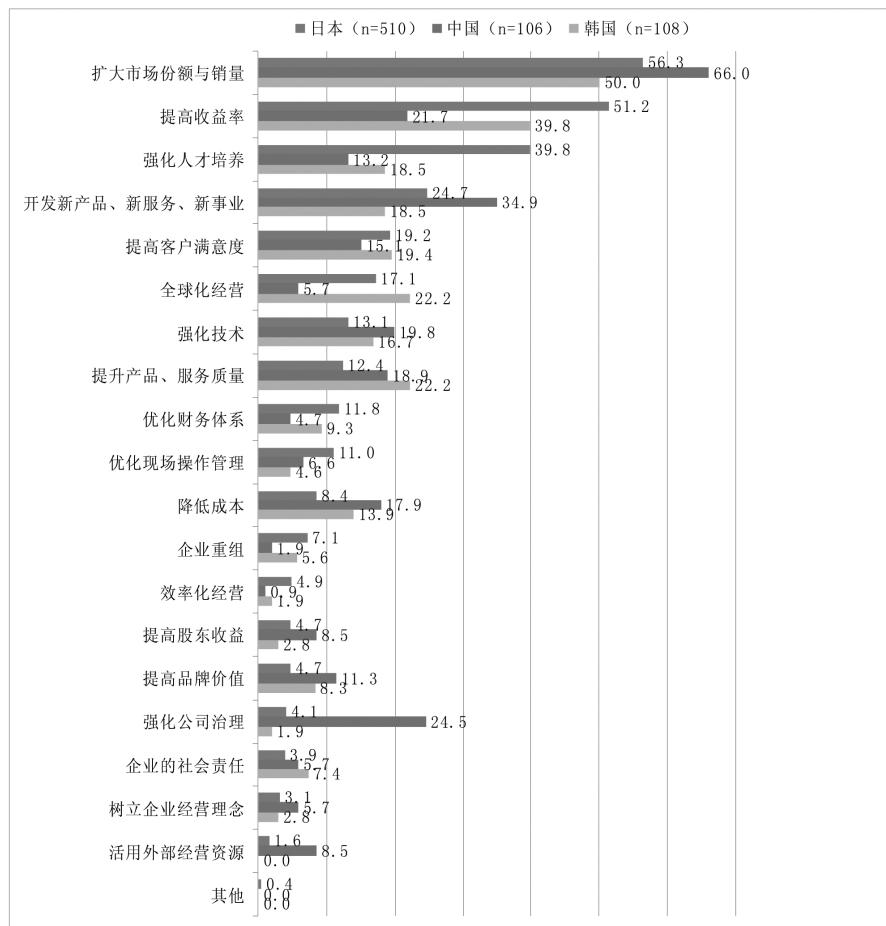


图 11: 对当前经营课题的认识

● 日本企业的特点

就日本企业而言,在过去的几年中“提高收益率”一直是首要的经营课题,但是今年被“扩大市场份额与销量”所代替。可以说至今为止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率的经营手法已经到了一个极限,日本企业不得不转向追求销售额。随着国内市场饱和,国际市场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因此日本企业的“全球化”成为一个新的亮点。而在中韩两国企业中,“提高质量”和“强化公司治理”等考量仍处于前列,这是日本企业过去几年致力的重点项目。同时,日本企业一直强调的“强化人才培养”依然与中韩两国企业保持着较大的差距。这也许意味着比起中韩企业,日本企业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人才是竞争优势的源泉”。

● 中国企业的特点

中国企业经营课题最大的特点是“强化公司治理”跻身第 3 位,与日韩两国的企业保持着相当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以 IPO 为目标的生产型企业正在逐年增加,而从传统的家族式经营向制度化的现代企业转化的民营企业也愈来愈多,“强化公司治理”正是这种企业自身需求的体现。

● 韩国企业的特点

与中日企业相比,韩国企业对“全球化”、“提高质量”、“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关心程度有

所提升,对差别化经营和确保竞争力的关心度比较高。

(2)对将来(5年后)的经营课题的认识(见图12)

关于今后5年的经营课题,日本企业把“提高收益”(44.5%)放在第1位,中国企业和韩国企业都把“新产品、新服务、新事业”(35.8%和33.3%)放在第1位。日本企业放在第2和第3位的分别是“提高销售额、市场占有率”(42.5%)与“强化人才培养”(39.6%)。而中国企业则把“提升品牌价值”(34.0%)、“提高销售额、市场占有率”(32.1%)放在第2和第3位。韩国企业把“提高销售额、市场占有率”(32.4%)、“全球化”(31.5%)放在第2和第3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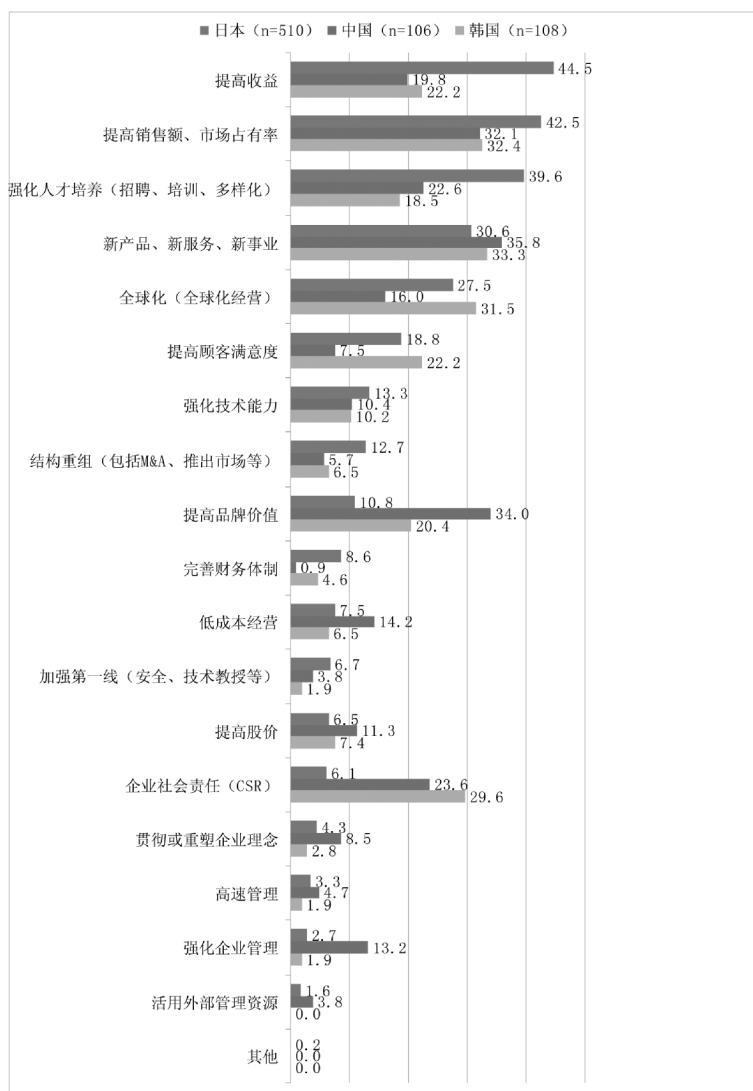


图12:对将来(5年后)的经营课题的认识

●日本企业的特点

日本企业设定在前3位的经营课题的百分比比中韩两国高出不少,可以看出日本企业以“强化人才培养”为基础的“提高收益”和“提高销售额、市场占有率”双管齐下的发展战略。

另一方面,曾经在日本国内红极一时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已经褪去了光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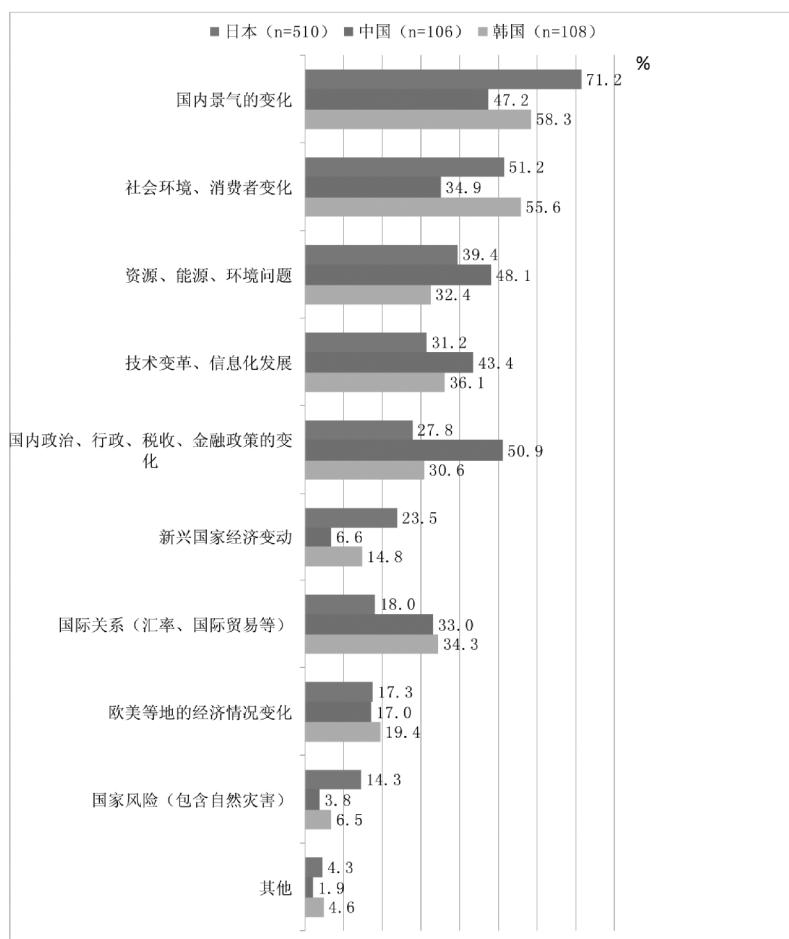
●中国企业的特点

中国企业排名靠前的经营课题分别是:“新产品、新服务、新事业”、“提升品牌价值”、“提高销售额、市场占有率”和“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排名有些出乎意料,应该说2008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连续给中国企业上了一堂又一堂企业伦理的课程,为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开辟了新的篇章。

●韩国企业的特点

韩国企业对5年后“提高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的认识比现在的课题认识要低17.6%,这应该和韩国企业开始更多地向其他课题倾斜有关。此外,和中日两国的企业相比,“全球化”和“企业的社会责任”都得到了较高的百分比。应该说这两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随着韩国企业国际化的展开,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认识也就更为深刻,而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认识的深入又为韩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国际化的契机。

2. 影响经营业绩的外部环境因素(见图13)



(回答以3个选项为止 / 没有回答的除外)

图 13: 影响经营业绩的外部环境因素

作为影响经营业绩的外部环境因素，日本和韩国企业都把“国内景气的变化”(71.2%，58.3%)、“社会环境、消费者的变化”(51.2%，55.6%)放在前列。而中国企业则把“国内政治、行政、税制、金融政策的变化”(50.9%)放在了首位。另外，在对“国际关系(汇率、国际贸易等)”的认知上，与日本企业的18.0%相比，中国企业(33.0%)和韩国企业(34.3%)显得更加敏感。这也意味着比之日本企业，中韩企业遇到汇率等问题更加脆弱。

●日本企业的特点

总体来讲，日本企业的对海外销售比例较低(应该是受到相当多没有海外销售的企业的影响)，可以说影响日本企业经营业绩最大的因素是“国内经济情况变化”。另一方面，日本企业对新兴国家的依存度正在不断提高，这也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业绩。在“国际关系”的要素分析上，日本企业的百分比只有中韩企业的一半左右。这是因为较之中韩两国的企业，日本企业在企业活动方面有着更大的自主权，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很小。但是在“国家风险”上，日本企业也比中韩两国的企业显得敏感很多，或许是受到了“3.11”东日本大地震的影响。

●中国企业的特点

“国内景气的变动”的百分比不是很高，相反“资源、能源、环境问题”和“国际关系”的百分比有所提高，应该说中国企业处于容易受到海外影响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石油及原材料的价格变动对国内的影响很大。此外，“国内政治、行政、税制、金融政策的变更”的百分比与日韩两国差距很大，说明中国企业的发展受制于国内政策、体制影响的成分偏大。

●韩国企业的特点

“社会环境、消费者的变化”的百分比仅次于“国内景气变动”处于第2位。这个结果可以理解为：掌握韩国消费者变化的难度很高，同时韩国国内的劳资问题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大。此外，对“国际关系”的重视程度方面，韩国企业的百分比也是三个国家中最高的，这也体现出韩国企业强烈的对外发展志向。

3. 在经营方针上今后5年重视的项目

在寻找经营方针上今后5年中最重视的项目方面，中日两国企业都把“开拓新市场”放在了第1位，而韩国企业也将其放在了第2位。可见，“开拓新市场”是中日韩三国企业今后5年非常重视的项目。

●日本企业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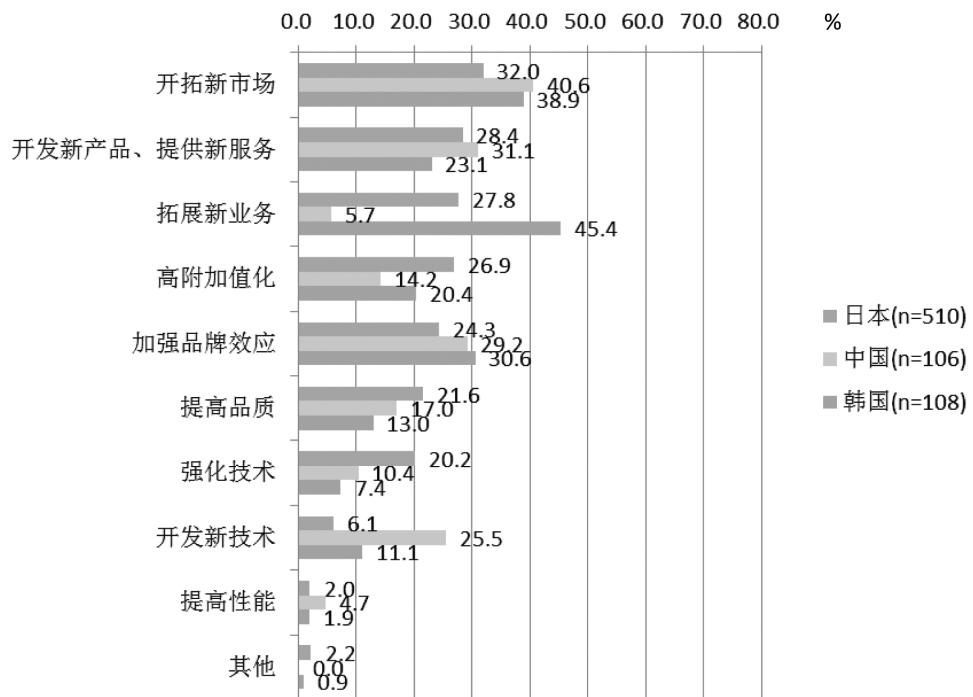
排在前三位的项目是“开拓新市场”、“开发新产品、提供新服务”和“拓展新业务”，可见寻求“新”的突破是日本企业今后5年经营战略中的重中之重。另外，与中韩企业相比，日本企业在“高附加值化”和“提高品质”、“强化技术”的百分比较高。这些是日本企业的传统强项，今后也会继续被重视。总体上，日韩企业有着相近的倾向，可以说两者对市场课题的认知上有着相通的部分。但是，在“拓展新业务”中差别很大。这是因为整体而言，日本企业经历了更多的周折，更加偏向于主营业务及其相关业务，或者说对新业务的反应较为消极。

●中国企业的特点

在中国企业今后5年中最重视的经营方针中，“开拓新市场”、“开发新产品，提供新服务”处于前列。应该承认中国国内还有很多空白的市场，在产品和服务上还有很大的开拓余地。与新市场、新产品和新服务相比，开发新业务显然风险更高，因此在这方面中国企业并没有显示出较强的兴趣。

●韩国企业的特点

与中国企业相比,韩国企业对“拓展新业务”情有独钟,其百分比高达45.4%,约是中国企业的8倍(5.7%),即便是面对日本企业(27.8%)也高出了17.6个百分点。这主要可以归结为:韩国国内市场的极限迫使韩国企业拓展新业务。当然,韩国的企业大都已经走过了模仿追随的发展阶段,经营者们也开始筹划以我为主的发展模式。这些都使得今天的韩国企业更偏向于各种事业组合的多元化经营发展战略。



(回答2个选择为止 / 没有回答的除外)

图14 今后5年中最重视的经营方针

4. 推动经营战略上的重大课题(见图15)

在论及“推动经营战略上的重大课题”时,日本企业和韩国企业都在人才方面表示出极度的重视,而中国企业则将重点放在了供应链的管理和生产的硬件方面。

●日本企业的特点

在各个领域都非常重视人才,尤其是在销售、市场营销领域。

●中国企业的特点

目前,中国企业在大规模生产方面优势比较明显,这主要归功于生产设备和供应链等的衔接。

●韩国企业特点

韩国企业在推进经营方针的同时,在人才方面也颇为重视。相对来说,在销售、市场营销的领域投入较多,在生产领域投入较少。与中日两国相比,韩国企业对“企业并购,构筑联盟”更加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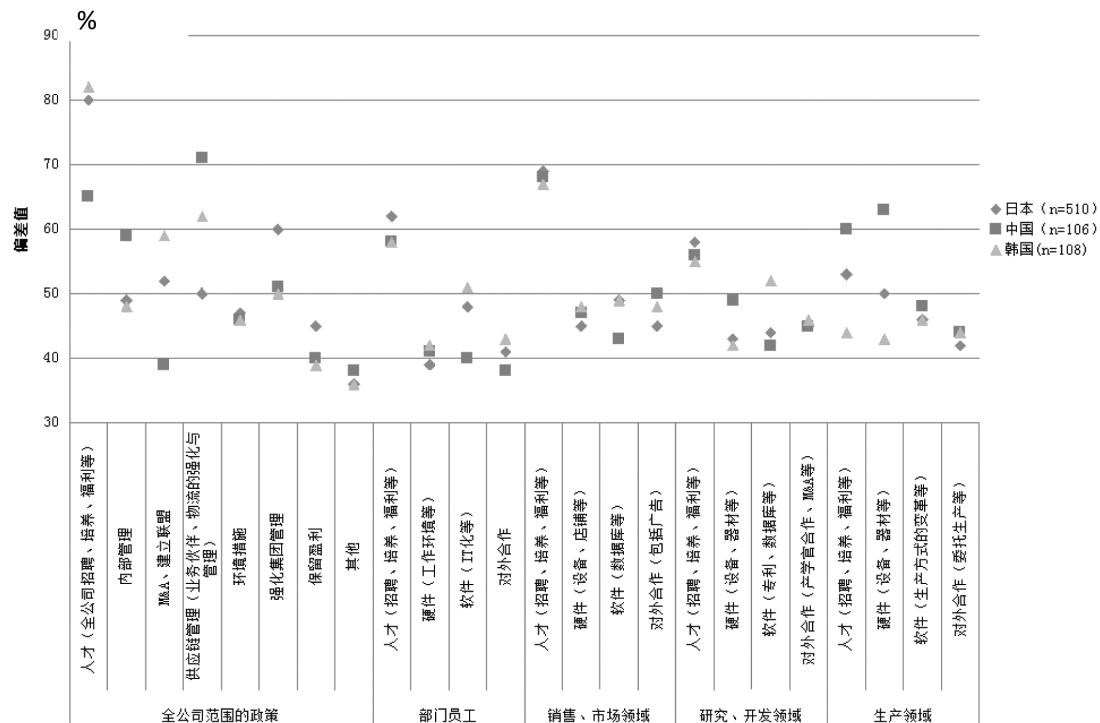


图 15 推动经营战略上的重大课题

5、关于组织、人才(见图 16-27)

在关于组织、人才方面的 12 个调研项目中,中日韩三国的企业表现出最大差异的是第 9 项“不反感员工辞职”和第 10 项“不反对辞退员工”。可以看到,日本企业对此有着明显的抵触。此外,在第 8 项“结果与过程更注重结果”上,日本企业也表现出看重过程的倾向。

●日本企业的特点

虽然在录取员工时,日本企业更为注重“质”而非注重“量”,但是中日两国的倾向较为接近。另外在研修、调动、考核等方面,日本企业和韩国企业有着相近的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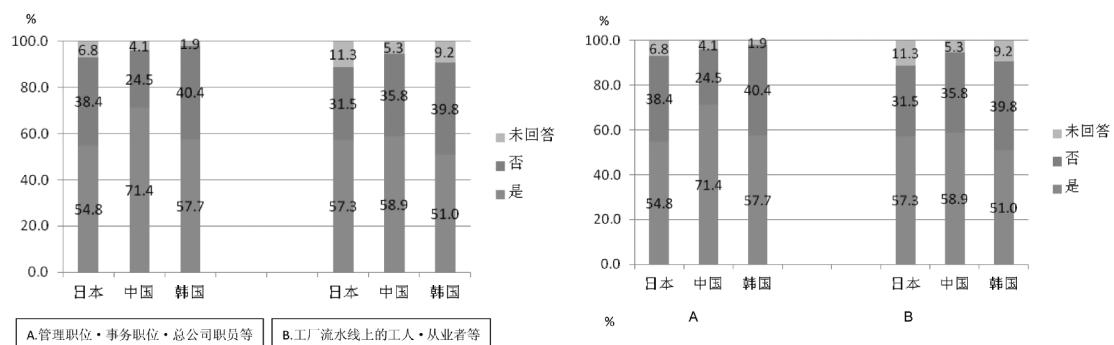


图 16 在数量上能够招到想招的人

图 17 在素质上能够招到想招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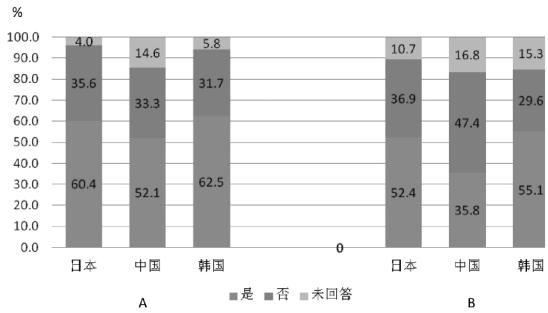


图 18 员工的进修机会增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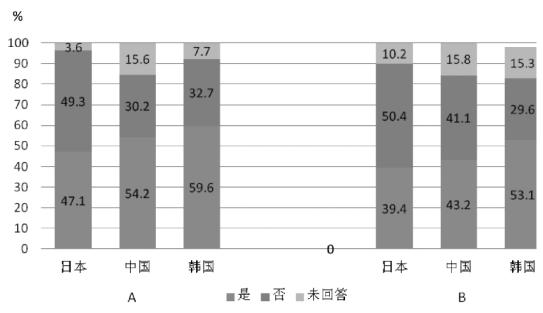


图 19 员工的进修经费投入增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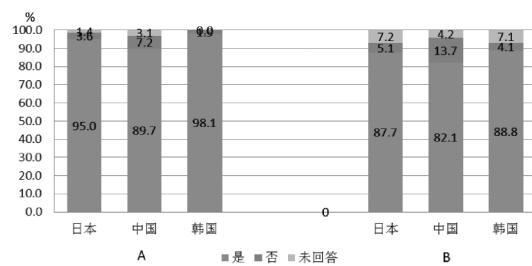


图 20 企业有培养员工的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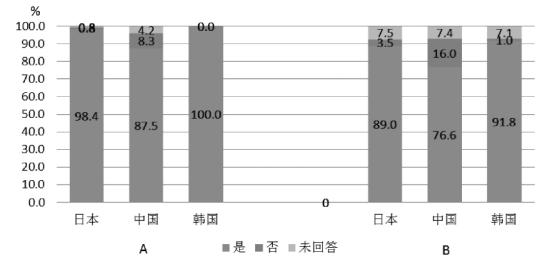


图 21 有共同的企业理念非常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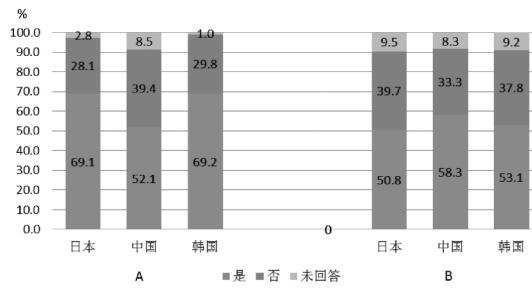


图 22 有定期的人事调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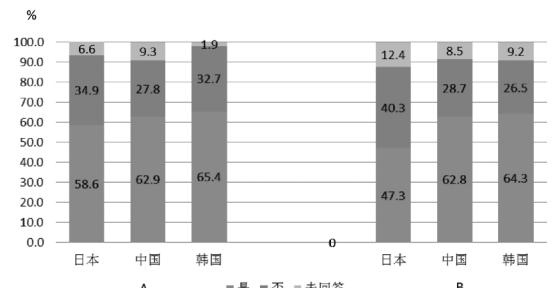


图 23 结果与过程更注重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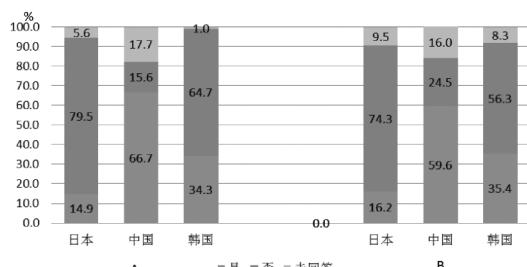


图 24 不反感员工辞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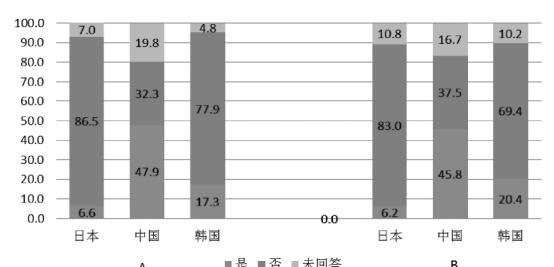


图 25 不反感辞退员工

● 中国企业的特点

中国本来就是人才流动性很高的国家，员工对于薪酬待遇非常敏感，而中国企业显然也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劳资关系。特别是在沿海地区，企业有着和欧美相近的志向，相对重视有

相关工作经验能立刻上手工作的熟练工。

●韩国企业的特点

韩国企业在人事方面与日本企业颇为相似。在度过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企业与工会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有所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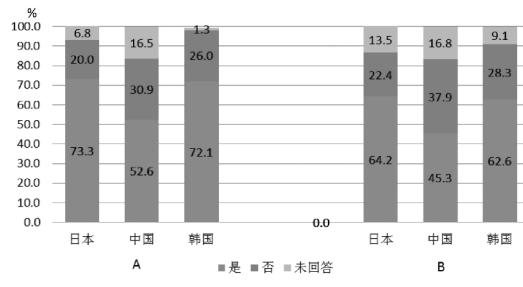


图 26 有系统的员工考核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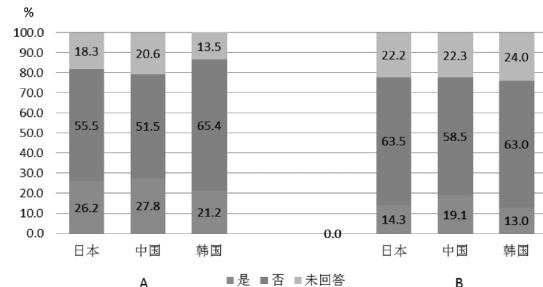


图 27 有计划地引进海外人才

6、对对方国家企业的印象(有关对方国家企业的印象根据同行业企业的回答整理分析)

总体上可以看出,中日韩三国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的格局。

(1)对日本企业的印象(中、韩)

●中国企业对日本企业的印象(图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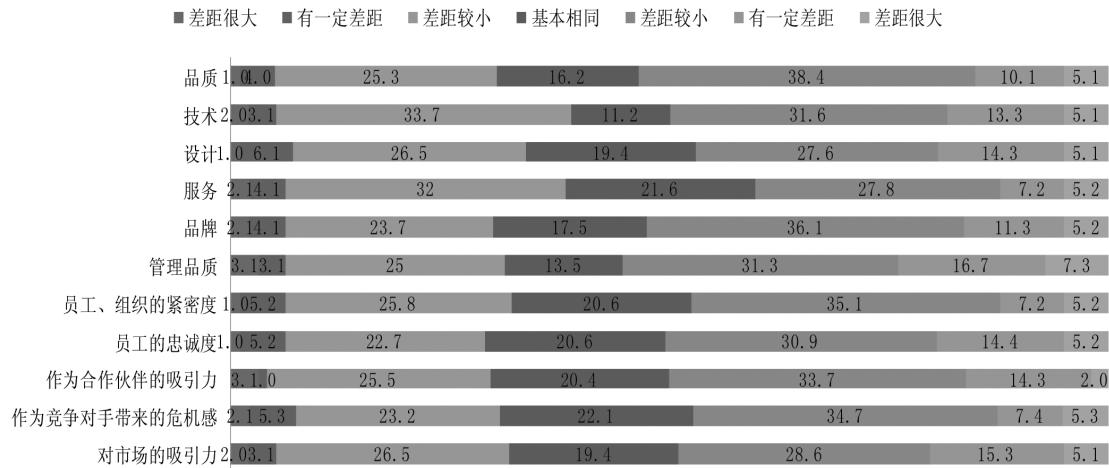


图 28 对日本企业印象 1- 中国企业的回答

整体上对日本企业有较好的印象。因为日本的平均所得很高,所以对日本的市场也认为有一定的魅力。认识到降低成本能在价格战中起到决定胜负的作用。

●韩国企业对日本企业的印象(图 29)

整体上对日本企业的印象较好,特别是作为合作方的魅力程度很高。在质量方面也有很好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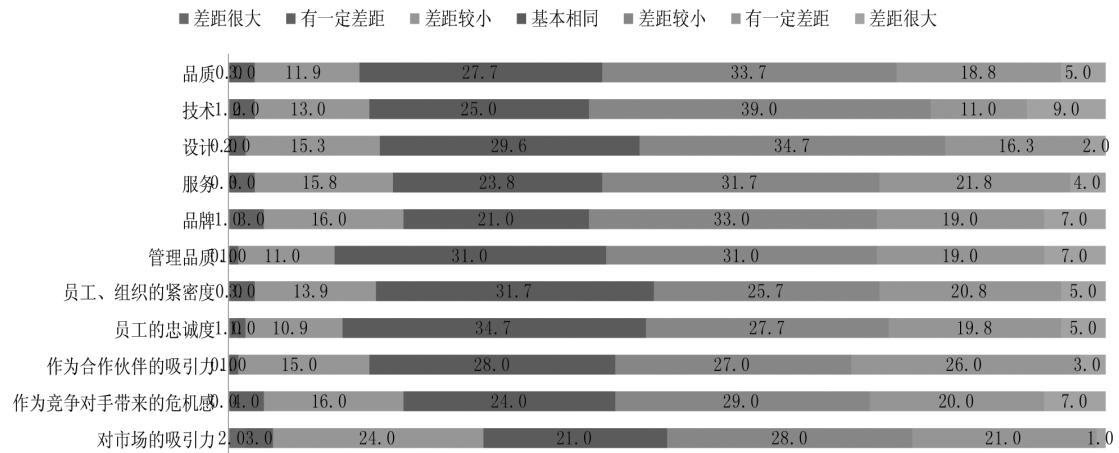


图 29 对日本企业印象 2- 韩国企业的回答

(2)对中国企业的印象(日、韩)

●日本企业对中国企业的印象(图 30)

日本企业自认是最能感受到中国“市场魅力”的企业,但同时也感到“作为竞争对手的威胁”。今后这种倾向还会持续,甚至升级。此外,相比中国企业,日本企业依然相信自身在“质量”和“服务”方面占据一定的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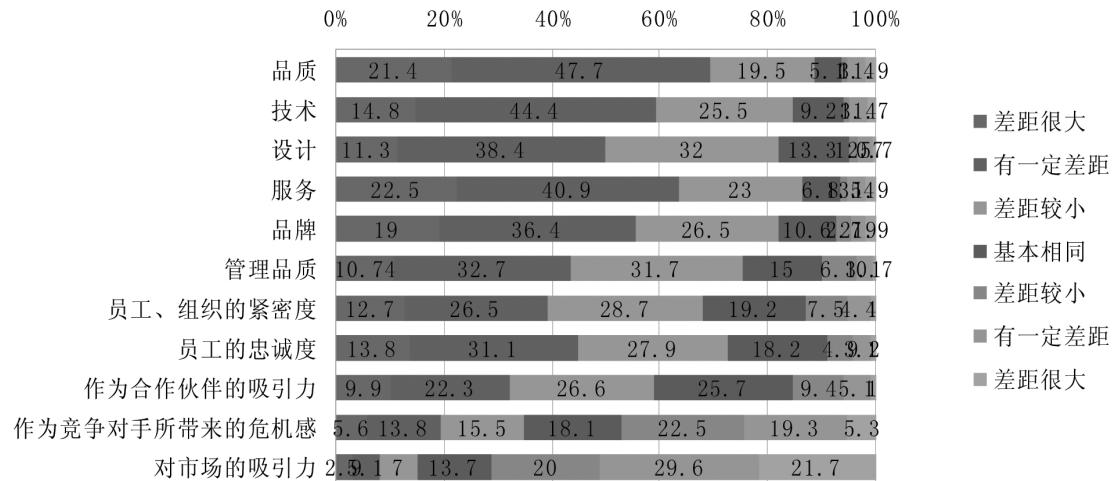


图 30 对中国企业印象 1- 日本企业的回答

●韩国企业对中国企业的印象(图 31)

韩国企业和日本企业一样,认为最能感受到的是“作为竞争对手的威胁”和“市场的魅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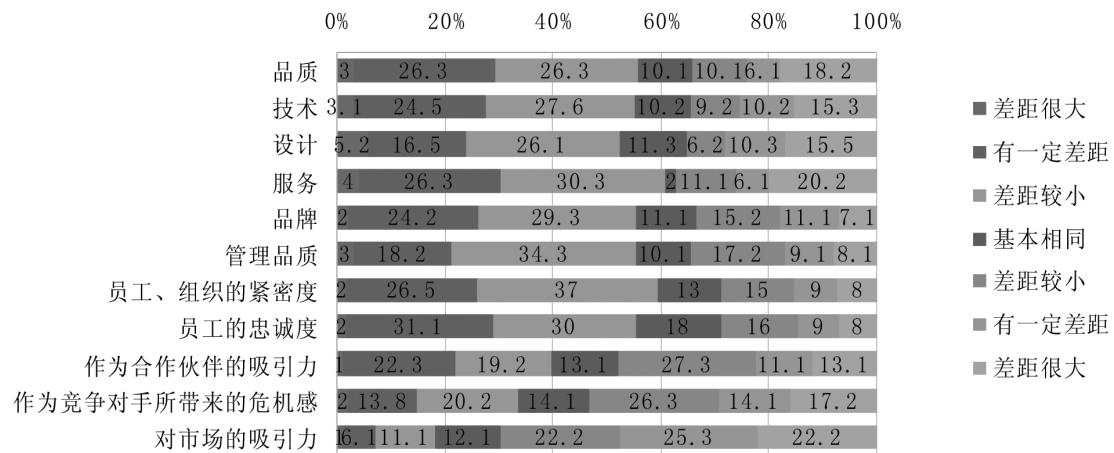


图 31 对中国企业印象 2- 韩国企业的回答

(3)对韩国企业的印象(日、中)

●日本企业对韩国企业的印象(见图 32)

对于韩国企业,有 4 成的日本公司认为能感到“作为竞争对手的威胁”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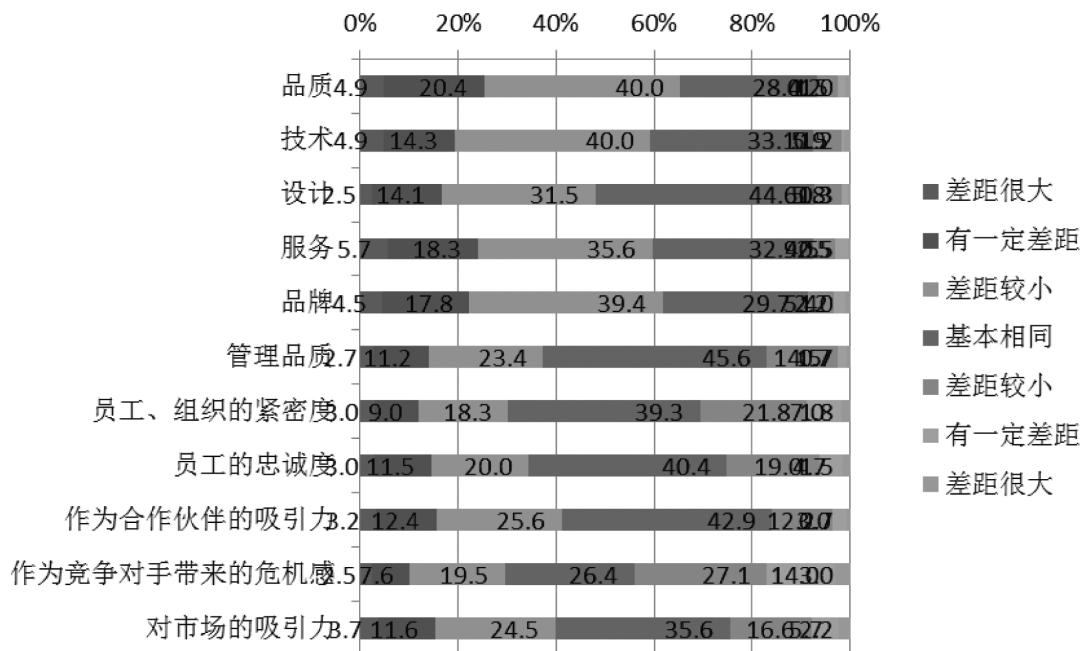


图 32 对韩国企业的印象 1- 日本企业的回答

●中国企业对韩国企业的印象(见图 33)

中国企业对韩国企业所能感受到的主要是“市场的魅力度”和“作为竞争对手的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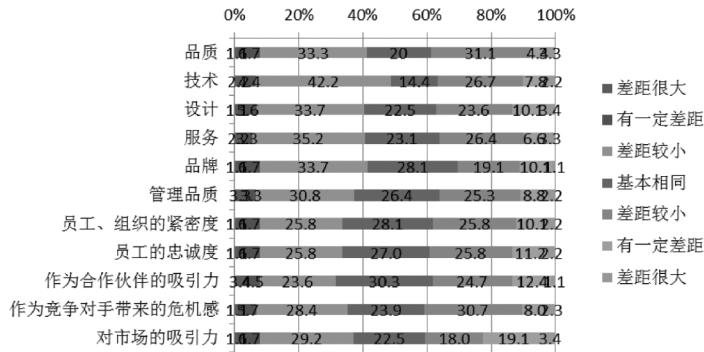


图 33 对韩国企业的印象 2 – 中国企业的回答

7、业绩、员工人数的演变(见图 34–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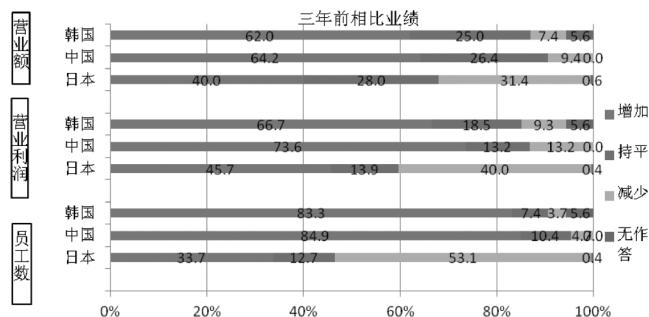


图 34 三年前相比业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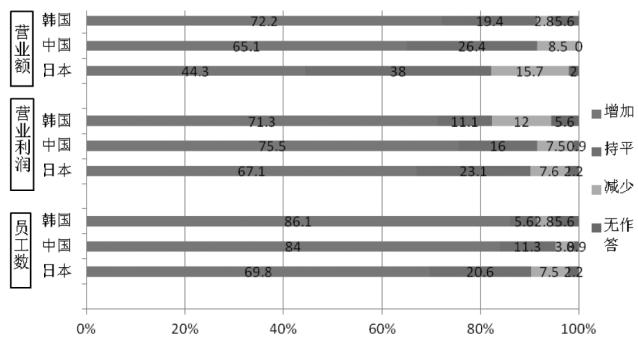


图 35 三年后业绩预测

与三年前相比，在销售额、营业利润、员工人数方面，日本企业认为有所“增加”的不到 5 成，但中韩两国企业有 6-8 成认为在“增加”。而在对三年后的预测中，中韩两国的企业在销售额、营业利润、员工人数方面，选择“增加”选项的比例都要高于日本企业。从中也可以感受到中韩两国企业势不可挡的后发优势。

(张浩川：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责任编辑：魏全平)

中国崛起、中美日安全困境与钓鱼岛争端

朱 鸣

内容提要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的持续快速崛起,尤其是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其“发展利益”所要求的以第一艘航母为标志的海上力量的崛起,导致近年来(即美国奥巴马政府和日本民主党政府自2009年上台执政以来)中美日关系中的安全困境迅速加剧。这又导致美国和日本的对华政策明显地向“遏制”与“制衡”方向倾斜以及美日安全同盟的再次紧密化,中国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因此面临着严峻挑战。作为一个长期存在的、被寄予太多历史记忆和民族感情的领土主权纠纷,钓鱼岛争端是引发中美日安全困境加剧的一个诱因,中美日安全困境的加剧又促使钓鱼岛争端在短期内频发和升级。为弱化安全困境,中国与美日之间必须再次做出战略安全保证。

关键词 中国崛起 安全困境 中美日关系 钓鱼岛争端 战略安全保证

一、问题的提出与分析的层次

自2010年9月中日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导致外交危机之后,2012年9月因野田佳彦政府宣布对钓鱼岛“国有化”而挑起的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升级令中日关系在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陷入“最低点”。^①与2010年的中日危机相比,此次钓鱼岛争端不仅使中日两国深陷外交僵局,而且使得两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迅速激化,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严重受损。更严重的是,争端的持续发酵转化为中日双方擦枪走火、甚至军事摩擦的可能性不容小觑。关于这两次钓鱼岛争端的具体过程,本文不予赘述。需要关注的是,钓鱼岛问题是由来已久、长期搁置的争端,为什么会在最近短短两年内爆发如此严重的冲突?难道中日两国不愉快的历史记忆和日益对立的国民心态足以使两国政府为了几座无人居住的岛礁而承受中日关系全面倒退的代价?难道钓鱼岛海域的油气和渔业资源是如此重要以致中日两国甘冒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风险?显然不是。

持国内政治视角的分析认为,日本野田政府“购岛”是为了避免中日关系出现更糟的情形——即由于“对华强硬派”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购岛,^②同时野田此举也是为了挽救民主党在国内低迷的支持率。^③这一分析还认为,中日两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受到两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意变化的严重制约,因此两国为解决争端而采取妥协让步几乎变成“不可能的任务”。^④也有学者认为,为了赢得在2012年12月举行的众议院大选,野田首相和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争相擦亮自己的对华强硬派证书,这意味着无论如何,东京的外交政策都会变得更加保守,^⑤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外交僵局也因此在短期内很难得以改观。

诚然,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单元层次)来解释钓鱼岛争端的发生与激化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本文认为更重要的是还需从东亚国际关系的体系层次对此问题做出理论性的解释。本

文认为,中国的持续快速崛起,尤其是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其发展利益所要求的以第一艘航母为标志的海上力量的崛起,导致近年来(即美国奥巴马政府和日本民主党政自2009年上台执政以来)中美日关系中的安全困境迅速加剧,这又导致美国和日本的对华政策明显地向“遏制”与“制衡”方向倾斜以及美日安全同盟的再次紧密化,中国的和平崛起也因此面临着严峻挑战。而作为一个长期存在的、被寄予太多历史记忆和民族感情的领土主权纠纷,钓鱼岛争端是引发中美日安全困境加剧的一个诱因,中美日安全困境的加剧又促使钓鱼岛争端在短期内频发和升级。

二、中国崛起^⑥与中美日安全困境^⑦的加剧

今天的(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与过去的(冷战时期或冷战前的)国际体系没有本质区别,即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依旧,因此由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安全困境”也依然存在。安全困境的基本逻辑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无政府国际体系中,两个或更多的潜在敌手之间由于互不信任,导致每一方都采取预警性的、防御性的而在对方看来是进攻性的举措。这会导致对方也采取相似的举措,从而导致地区紧张逐步升级,削弱地区安全,每一方安全环境的恶化也就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⑧安全困境是各国之间军备竞赛乃至冲突或战争的根源。在我们所处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时代,^⑨弱化安全困境从而维护相互安全的根本途径是,各国保持战略克制和自我约束,在追求自身国家安全利益的同时对他国的核心利益提供战略安全保证。^⑩

大国崛起往往导致安全困境的加剧。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一旦某个国家因跨越式的发展而崛起,增强了实力,那么不管其增强实力的动机是为了增加民众的福利,还是为了自身的安全,或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都会迅速引起霸权国及本地区其它国家的疑虑、警觉和不安,因为它们自己的实力因那个新崛起国家实力的增加而相对减小,不安全感由此而迅速增加,安全困境也因此而加剧,虽然这并不必然源于崛起国的侵略扩张意图。^⑪中国学者叶江据此推论,只要中国的崛起是在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之中展开的,那么其势所必至的结果就是加剧“安全困境”,并因此而导致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传统大国(美国和日本)的疑虑与恐惧。于是,“中国威胁论”也就成为某种“客观的存在”,而不论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是否推行侵略扩张的政策。唐世平同样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大也许并没有威胁别国,但别国仍会感到不安全而采取一些敌意的政策,这反过来使第一个国家采取反对策,其结果是两国的安全环境都恶化了。这种一国的发展与政策和他国的发展与政策的相互作用是影响国家的安全环境的重要因素。^⑫

从“权力转移”^⑬理论的角度来看,大国崛起导致安全困境恶化的逻辑更为明显——崛起中的大国能够在地区政治秩序中要求更大的发言权,进而要求与其新力量相称的更大的安全。崛起中的大国所要求的变化可以包括以下战略性物品:新的或更大的势力范围^⑭、对海上航道的控制权、可靠地获取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的资源。这些要求本质上具有破坏稳定的作用,因而经常遭到一些现状维持国(指霸权国及其盟国)的反对。这些国家不愿为了满足崛起国的要求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略调整,担心由于失去盟国或获取自然资源的通道变得更为脆弱而造成安全系数降低。因此,权力转移常常导致大国战争,因为一个崛起国可能采取预防性战争手段来取得现状维持国不愿和平让与的东西,一个现状维持国也可能在权力转移

的早期使用武力消除崛起国构成的潜在挑战。^⑤陆伯彬(Robert Ross)据此认为,1978~2008年,中国以和平方式崛起,整个东亚地区正在形成一个以中美两国为核心的两极结构:中国正成为整个东亚大陆(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地区^⑥)的主导力量,而东亚海域(包括日本、菲律宾及其它东南亚海洋国家)依然处于美国的势力范围。^⑦但是,21世纪初叶以发展一支远洋海军为标志的中国的进一步崛起(陆伯彬称之为“始于2009年的中国的第三次崛起”^⑧)将对美国在东亚海域的控制力及其全球的安全利益形成挑战,^⑨中国与美日两国间的战略竞争和安全困境必然加剧。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和平的”大国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与美日两国的安全困境,从而为自身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地区安全环境,除了中国执行以战略克制为主的“韬光养晦”政策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美日相互间在关乎对方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上提供了最低限度的战略安全保证(如表1所示)。

表1 战略安全保证——中美日相互安全的基石^⑩

保证提供国\被保证国	美国	日本	中国
美国		保证日本的安全(包括日本的海上生命线),不抛弃日本。	不主动威胁中国安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大陆或台湾单方面改变现状。
日本	不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不排斥美国的亚太存在。		不主动威胁中国安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大陆或台湾单方面改变现状。
中国	不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不排斥美国的亚太存在。	即便中国统一,中国也不会威胁日本的海上生命线。	

然而,出于恐惧和互不信任,上述战略安全保证是脆弱而模糊的——美日从根本上并没有接受台湾是中国生死攸关的利益,却不是美日的生死攸关的利益,甚至不是他们的重要利益的事实。美国还始终不愿明确放弃对台湾的防卫承诺,^⑪而一旦中美在台海发生冲突,日本将别无选择,只能与美国站在一边。因此,中国不得不发展能够阻吓美日卷入台海危机的“反介入”武器系统(如反卫星导弹、反舰弹道导弹、核潜艇等)。但是,在美国看来,中国防御性的军备建设威胁到美国在东亚海域的军事霸权和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在日本看来,中国防御性的军备建设更是威胁到对它而言生死攸关的海上生命线,^⑫而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正处于这条海上生命线上。因此,美日不得不在冷战后不断调整和巩固安全同盟,联合研发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在日本部署最尖端武器(如F-22战机),日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可以利用日本基地执行全球军事任务,应对所谓“周边事态”^⑬,而不仅局限于保卫日本本土。与此同时,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也正在成为世界上最现代化的海空力量之一,^⑭并在事实上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谋求“集体自卫权”,^⑮参与由美国领导的海外军事行动。这反过来又会加剧中国的不安与恐惧,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因此逐步升级。^⑯

随着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更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及其进一步崛起,^②中国日益依赖于国际贸易和自然资源的进口,这使得中国对发展一支远洋海军的兴趣不断增长(中国首艘航母在2012年正式交付海军)。^③这支海上力量可使中国能够在国际海洋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包括在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和维持全球秩序方面,并使中国有能力保护其海外经济利益。尽管中国海军现代化和建设海洋强国的意图是和平性质的,但在美日看来,这无疑进一步削弱了中国战略安全保证的可信度。在美国看来,中国海上力量的崛起将挑战美国在东亚海域的势力范围及其全球的安全利益,因此自2010年以来美国先后在南海领土争端和钓鱼岛争端中重申对菲律宾和日本的安全保证,还加强了与越南和印度的安全合作,并开始在澳大利亚部署海军陆战队。在日本看来,中国海上力量的崛起将使中国有能力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打断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并在未来可能的台海危机中为了阻止驻日美军协防台湾而攻击包括冲绳在内的日本西南诸岛。^④因此,中美日安全困境骤然加剧。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10年以来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会爆发如此严重的冲突,而国内政治和民族主义情绪也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三、2009年以来美日对华政策的同步转变

在讨论美日对华政策的转变之前,首先必须对中美日关系的性质做出澄清。正如唐世平指出的,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中美日关系中基本上不存在中日联合起来对付美国,或者中美联合起来对付日本的可能性。这也就是说,在政治和安全事务上,中国和美日的任何一方之间都只存在着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战术配合,不可能存在战略合作来对付剩下的一方。因此,中美日关系不是一个三角关系,而是一个联盟(美日)对另一个国家(中国)的双边关系。^⑤

其次,美日同盟是一个不对等的联盟关系。作为联盟的领导者,美国很清楚日本基本上没有脱离美日联盟的可能性,因此在联盟内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日本的谈判地位大打折扣。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只要美国决心已定,最后总会占上风。大多数时候,日本即使反对,最后也不得不追随美国。日本在一些时候想采取一些独立策略,但最终都会因为谈判地位较弱而向美国妥协。这种情况在日美同盟面对明显的外部威胁(或感知到的威胁)的时候尤其明显。

最后,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台海危机后),美日逐渐将中国当成敌人或潜在的敌人,日本对中国的疑虑不断加重,因此美日安全同盟重新走向紧密化(如1997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和日本出台“周边事态法”)。^⑥2012年8月,正当钓鱼岛争端持续发酵之际,日本防卫大臣森本敏访美与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举行了会谈,双方同意修改1997年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化共同对付中国的能力。双方认为,当前的东亚局势与十几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的海洋进出战略直接威胁到日美的安全,中国海军在东海地区的高压姿态越来越明显,不排除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冲绳附近的西南诸岛的攻击,所以有必要对“指针”进行修改。

既然中美日关系在本质上是双边关系,那么就不难理解,在中国持续快速崛起导致东亚安全困境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对华“接触加遏制”的政策天平逐渐向“遏制”倾斜^⑦,而日本也亦步亦趋,采取“联美制华”政策。可以说,钓鱼岛争端的升温同中国崛起以及美国奥巴马政府高调“重返亚洲”(pivot back to Asia)的战略是同步的,此次日本政府执意“购岛”的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企图利用美国“重返亚洲”的机会，挟美自重。^⑧虽然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触碰了中日间最敏感的政治神经，表面上是一起偶然事件，但背后折射出的是亚太地区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客观上，亚洲的主要安全问题是中国崛起同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之间的矛盾；主观上，中国同美日之间严重缺乏信任，“信任的稀缺”导致各种矛盾和冲突频发。^⑨

“重返亚洲”并不是奥巴马 2009 年初入主白宫时就有的想法。但是，在奥巴马主政第一年结束之际，包括其助手在内的批评人士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对中国过于软弱。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Benjamin J. Rhodes)表示：“我们需要在第二年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我们正是那么做的。”^⑩ 在 2009 年 1 月至 2011 年 4 月间担任奥巴马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高级主管的贝德(Jeffrey A. Bader)认为，奥巴马政府与中国的关系在 2010 年发生了变化。他总结道，在美国承认中国崛起不可避免的同时，奥巴马政府“寻求确保中国崛起将促进、而不是削弱亚太地区的稳定，包括美国的五个盟国及美国关心其安全的其他伙伴国”。鉴于此，奥巴马政府重申了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利益，^⑪并再次强调了美国对日本的安全承诺(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尽管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仍然保持所谓“中立”。^⑫

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的核心就是要给中国崛起划出一条红线，确保在亚洲维持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均势。这就要求美国在外交、军事、经济上采取一系列步骤，即巩固与日韩澳的同盟关系，发展与中国其他邻国(越南、印度、缅甸)的合作关系，继续提升针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战略姿态(军力部署再平衡、空海一体战、导弹防御系统等)，并加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2011 年 11 月，日本正式决定加入 TPP 谈判，而中国没有被邀请参与 TPP 谈判)。^⑬

并非巧合的是，自 2009 年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明显转变，呈现出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同步性”。2009 年上台的鸠山由纪夫政府致力于建立“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关系”，积极倡导“东亚共同体”，^⑭重视对华外交，显示出在对华关系上某种程度的独立性策略。^⑮但是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日益强硬，2010 年上台的菅直人政府重归对美“协调”路线，极力修复和深化鸠山时期因普天间机场等问题而受损的日美安全同盟，在钓鱼岛撞船事件及东海油气田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渐趋强硬。^⑯2011 年野田当政后，日本政府称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基轴中的基轴”，“联美遏华”倾向进一步凸现。^⑰有学者指出，在外交安全上，日本民主党政府从菅内阁开始“去鸠山化”，“回归自民党”，到野田内阁则更进一步。日本要真正“独立”，首当其冲的是美国，但现阶段日本无力向美国叫板，中国崛起更使它无意这样做。此外，日本战略文化独特，向来有追随强者的传统。^⑱因此，可以预期，只要中美两国在亚洲的战略竞争继续保持紧张状态，那么几乎肯定于 2012 底上台的日本安倍晋三政府将延续对华强硬政策，^⑲尽管安倍为了缓和因钓鱼岛争端而严重受损的中日关系可能会采取某些和解性的姿态。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安倍晋三在其 2012 年 11 月提出的自民党竞选政纲中强调要打造“强大日本”，其最大特征在于安保方面的新政策，内容包括：一、制订新宪法，修改不允许日本有交战权的现有宪法第九条；^⑳二、新宪法将目前的自卫队定位为“国防军”；三、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㉑四、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些新政纲一旦转化为新政府的政策，无疑将大幅度削弱实施了六十多年的日本宪法中的和平意涵。^㉒可以说，安倍和野田在外交政策上的立场总体上是一致的。安倍的竞选政纲实际上体现了日本中右派政治精英对国家战略的高度共识，而中右派政治精英将在今后至少十年主导日本的命运。^㉓

四、弱化中美日安全困境与管理钓鱼岛争端

如前文所述，被寄予太多历史记忆和民族感情的钓鱼岛争端是引发中美日安全困境加剧的一个诱因，^⑩而随着中国海上力量的崛起，中美日安全困境的加剧又促使钓鱼岛争端在短期内频发和升级。然而，在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里，国家可以通过谋求合作的手段来弱化安全困境，获得更多的安全。因此，中美日三国必须认识到，国家安全是相互依赖的，一个国家在追求本国的安全时必须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安全。这一点绝不是“利他主义”或是“理想主义”，而恰恰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精髓。要同时达到追求本身的安全和考虑其他国家的安全两个目标，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安全合作，^⑪即通过有质量的对话与沟通，一方面阐明本国的核心安全利益，另一方面做出战略安全保证，阐明为什么维护本国核心安全利益的举措不会威胁他国的核心安全利益，从而缓解战略互疑。当然，这将是一个异常困难、充满曲折的过程，并且需要三国领导人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简单地说，在目前中国海上力量崛起的背景下，中美日最低限度的相互战略安全保证应该如表 2 所示。

表 2 战略安全保证——中美日相互安全的基石

保证提供国\被保证国	美国	日本	中国
美国		保证日本的安全(包括日本的海上生命线)，不抛弃日本。	不主动威胁中国安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大陆或台湾单方面改变现状；尊重中国正当的发展利益。
日本	不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尊重美国在东亚海域的势力范围，不排斥美国的亚太存在。		不主动威胁中国安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大陆或台湾单方面改变现状；尊重中国正当的发展利益。
中国	不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尊重美国在东亚海域的势力范围；中国的发展利益不挑战美国的亚太存在。	即便中国统一，中国也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及海上生命线；中国的发展利益不挑战日本的安全。	

首先，就中美战略互疑而言，必须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双方应该如何进行军事部署和正常活动，才能既允许中国捍卫其核心安全利益，同时又允许美国充分履行其对该地区的盟国和朋友应尽的义务？^⑫中方须向美方阐明，作为一个崛起大国，中国不断增强军事能力尤其是发展一支远洋海军的进程是为了适应其不断增多的地区及全球活动的发展利益，而不是为了挑战美国在东亚海域的势力范围。正如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的：“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加强国防建设的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②目前,在中国的发展利益的正当性还未获得美日充分理解的情况下,中方必须谨记:中国越是强大,需要肩负的国际责任就越多,“自我克制”就变得越重要,“韬光养晦”决不只是权宜之计。^③美方须向中方阐明,美国在亚太重新配置军力只是为了确保其在东亚海域(日本和东南亚海洋国家)的主导地位,而美国在朝鲜半岛和台湾地区只具有次要的战略利益——正如1950年1月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将美国的“防御圈”限制在东亚海洋国家那样。^④美国还必须向中国保证,其发展中的导弹防御系统不会削弱中国最低限度的威慑能力。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必须放弃其对“信誉”(credibility)或“声誉”(reputation)的过度崇拜,^⑤停止损害中国明确阐述的核心利益。同样,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在对日本做出安全承诺时必须“谨言慎行”,应从本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停止发出自相矛盾的错误信号,从而避免日本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产生误判,采取进一步的挑衅行为甚至采取将争端军事化的行动。^⑥正如一位美国智库学者所言,奥巴马总统应该驳回国务院对1960年《美日安保条约》的诠释,向东京明确指出:不管过去几十年来华盛顿对争议岛屿问题采取什么立场,现如今美国不会因为一些无人居住的岛礁而冒险开战。在战争危机真正爆发前表明这一立场很重要。^⑦

其次,鉴于中美日关系的双边性质及美日同盟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如果中美战略互疑得到缓解,那么中日安全困境将更容易得以弱化,两国也将更容易走出目前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僵局。在中美切实做出相互战略安全保证的前提下,中方须向日方阐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及其在东海和南海领土争端上的严正立场只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而不是针对日本国土或海上生命线的强权扩张。中国的统一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中国不会利用台湾的地理位置来控制日本的海上生命线。中国的核武器也不会针对一个无核的日本。中国的发展利益表明,对于日本生死攸关的海上生命线对于中国来说也变得日益重要,因此两国有机会共同维护海上航道的安全。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方须使日方理解,中国政府如果丢失国土,尤其是向曾侵略中国的日本出让一寸土地,那就意味着政权失去合法性。^⑧日方须向中方阐明,日本海上和航空自卫队的现代化只是为了维护海上生命线的安全,而不会威胁中国的安全,或者为了支持盟国而被用来阻挠中国的统一。日本(也包括美国)必须明确表示支持并接受一个统一的中国到来,因为一个分裂的中国将始终是亚太地区的不确定因素,而只有一个统一的中国才会有与美日共同承担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和意愿。在走向“正常国家”的进程中,日本必须保证不抛弃和平宪法,其任何出兵海外的活动都必须也只能是在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行动。即使日本自卫队参与由美国领导的海外军事行动,也必须以不损害中国的核心安全利益为前提。日本政治家必须正确地面对历史,致力于日本国内达成对过去侵略历史的正确共识,从而消除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挑衅行为的国内基础。就目前而言,作为挑起争端的一方,日本必须承认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的事实与现状,放弃一旦发生武力冲突美国会军事介入的幻想,^⑨回到与中国和平协商解决争端的正确轨道上来。2013年将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5周年。该条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双方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中日两国有必要重新确认这一条约的基本精神,共同遵守这一条约的各项原则和规定。这样,才符合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未来的中日关系才有希望。^⑩

最后,为了弱化安全困境,中美日必须致力于建立“小多边对话机制”,^⑪管控未来可能再次发生的诸如钓鱼岛争端的摩擦与危机。中国理解日本出于安全需要和美国在一段时间继

续维持同盟关系,但中国希望最终东亚地区的安全是建立在包括所有大国(中美日俄)的多边安全合作上,而不是建立在对峙的两个阵营上。美日必须认识到,两国不能继续强化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安全联盟,而是必须朝着一个多边的安全合作机制迈进。为了不让中国感到美日共同对付中国,这一多边安全机制还必须包括和中国关系接近的大国。这样才有可能在东亚地区最终达成大国间的多边安全合作,或者“大国协作”,东亚持久的和平与稳定也才有可能得到保证。

注 释:

①据日本新闻网报道,日本前驻中国大使丹羽宇一郎 2012 年 10 月 20 日在名古屋大学发表演讲,对当前的中日关系发出警告。他表示,如果不尽快改善两国关系,最恶劣的情况是可能导致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年来两国的努力化为泡影,而要修复两国关系,又得花费 40 年的时间。另见:《木寺昌人对解决中日争端不乐观》,《参考消息》,2012 年 12 月 4 日。

②翟新:《日本民主党政权“国有化”钓鱼岛的动因》,《国际问题研究》2012 年第 5 期; 王雅平:《钓鱼岛——中日四十而惑》,《金融时报》中文网,2012 年 10 月 8 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3475>。

③时殷弘:《日本“购岛”缘于其国内政治竞选大背景》,《中国青年网》,2012 年 9 月 17 日,http://d.youth.cn/shrgch/201209/t20120917_2444413.htm; 翟新:《日本民主党政权“国有化”钓鱼岛的动因》。

④吕晓波:《中日韩领土争端的背后》,《纽约时报》中文网,2012 年 8 月 21 日,<http://cn.nytimes.com/article/opinion/2012/08/21/cc21lvxiaobo/>; 关于大众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政策关系的精辟论述,参见 Susan L. Shirk, *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⑤迈克尔·奥斯林:《两名鹰派人物为日本的未来而争斗》,《华尔街日报》2012 年 10 月 8 日,转引自《美报:两个鹰派让日本更保守》,新华网,2012 年 10 月 1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0/17/c_123830979.htm。

⑥关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崛起的著作汗牛充栋,不胜枚举。参见 Robert G. Sutter,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5; Robert S. Ross and Zhu Feng, eds.,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William W. Heller and Thomas G. Rawski, eds., *China's Rise and the Balance of Influence in Asi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7; 朱峰、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最近的两本关于中国崛起的专著是:亨利·基辛格的《论中国》和阿伦·弗里德伯格的《争夺霸权:中美东亚控制权之争》。前者是一部中国外交政策史,书中追溯自 1949 年建国以来中国战略的曲曲折折,其目的是要阐明美国应当优雅地顺应中国的崛起,从而避免悲剧性冲突的发生。后者的观点正相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外交政策顾问弗里德伯格对中美两国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所采取的外交策略进行了分析,试图窥测中国未来几十年的意图。他认为,面对中国越来越大的实力和野心,美国必须在很多中美利益相悖的方面强硬地对待中国。引自 Andrew J. Nathan, “What China Wants: Bargaining With Beijing,” *Foreign Affairs*, Volume 90, Number 4, 2011.

⑦本文主要讨论中国与美日两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关于同盟安全困境的讨论,参见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ume 36, Issue 4, July 1984, pp.461–495.

⑧关于安全困境的经典论述参见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30, No.2, January 1978, pp.167–174; and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chap. 3. 另见 Shiping Tang,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 Vol. 18, No. 3, Sept. 2009, pp.587–623.

⑨唐世平:《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性》,《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3 期,第 140–150 页。本文假设中美日三国都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当然,这也并非一成不变,例如小布什第一任期时的美国就具有明显的进攻

性现实主义国家的色彩。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追求绝对安全,不承认安全困境的存在。

⑩唐世平、曹筱阳:《寻求中美日相互安全的基点》,《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1期,第99—109页。

⑪叶江:《“安全困境”与中国的和平崛起》,《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6期。

⑫唐世平:《国家安全环境的系统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8期,第17页。

⑬关于权力转移的经典著作参见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Robert Gilpin, "Theory of Hegemonic War,"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8, No. 4, 1988, pp.591—613;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8, pp. 338 — 376; 也可参见 Jack Levy,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 Robert S. Ross and Zhu Feng, eds.,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⑭势力范围(sphere of influence)是指一个国家对地区和周边国家及事务的影响力,它只有大小之分,没有正确或错误之别。一个国家对周边国家和事务的影响力,无论我们喜欢势力范围这一概念与否或使用别的概念来描述这种影响力,都将切实存在。势力范围本身,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邪恶的东西,和霸权主义也没有内在的联系。参见唐世平:《再论中国的大战略》,《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第29—37页。

⑮罗伯特·罗斯:《中国崛起、地区权力转移与东亚安全:从1949年到21世纪》,《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1期,第36—43页。

⑯本文不认同陆伯彬提出的关于美国已承认朝鲜半岛和台湾地区已处于中国势力范围的观点。朝鲜半岛仍然是中美在亚洲战略博弈的焦点之一;而台湾地区仍然是美国的准盟友,因为美国并未放弃对台湾的防御义务。

⑰Robert S. Ross, "Bipolarity and Balancing in East Asia," in T.V. Paul and James J. Wurtz,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⑱罗伯特·罗斯:《中国崛起、地区权力转移与东亚安全:从1949年到21世纪》,第41—43页。

⑲罗伯特·罗斯:《中国崛起、地区权力转移与东亚安全:从1949年到21世纪》。

⑳唐世平、曹筱阳:《寻求中美日相互安全的基点》,第105页,表格略有修改。

㉑Lee Shyu-Tu and Douglas Paal, "Responses: Disengaging From Taiwan: Should Washington Continue Its Alliance With Taipei?" *Foreign Affairs*, Volume 90, Number 4, July 2011.

㉒日本国土面积狭小,主要的战略资源都需要进口,而且其能源进口的海上通道要通过几个重要的海上咽喉地区。因此,日本作为离亚洲大陆和中国更近(如同英国对欧洲大陆)的美日联盟中的前线国家,对来自中国的压力更为敏感和脆弱。

㉓所谓周边事态,是指如果置之不理就可能发展为对日本的武力攻击的事态。这虽然不是代表特定区域的地理名词,但随着1997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周边事态主要是指朝鲜半岛有事的情况。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所说的“适应21世纪”的调整,将是“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事隔15年后的再次修改,这将主要针对持续扩军的中国。参见《日美拟修改“防卫合作指针”对付中国》,《参考消息网》,2012年8月5日,<http://world.cankaoxiaoxi.com/2012/0805/73626.shtml>。

㉔关于本世纪初以来日本的军事现代化和中日军备竞赛的详细讨论,参见 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 Quiet Japan-China Arms Race and Global Power Projection," *Asia-Pacific Review*, Vol.16, No.1, 2009, pp.84—98.

㉕所谓集体自卫权,是指在与本国关系密切的国家遭遇第三国攻击时,本国将其视为对自己的攻击而行使武力的权利。一直以来,日本政府对集体自卫权的解释是:“日本拥有集体自卫权,但这超越了宪法允许的最低程度的自卫权,因此日本不能行使此项权利。”2012年9月,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在总裁选举中说:“民主党政权的外交已经失败。为了重新构建日美同盟,有必要行使集体自卫权。”

㉖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4, Spring 1999, pp.49—80.

㉗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外汇储备高达3.2万亿美元。中国还取代美国成为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越南等东盟国家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重要

的直接投资对象。中国已成为东亚经济体的“增长引擎”和东亚贸易区的中心,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形成挑战。就军事力量而言,在过去23年里,除了一年外,中国官方公布的国防预算年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速。2012年3月,全国人大发言人李肇星表示,2012年中国军费预算为6702.74亿元人民币,增幅为11.2%。

㉙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18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发表讲话时表示,中国应当“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页。

㉚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A Quiet Japan–China Arms Race and Global Power Projection”.

㉛唐世平、曹筱阳:《寻求中美日相互安全的基点》。

㉜同上。

㉝周方银:《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略互动》,《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6—26页。

㉞张立伟:《钓鱼岛背后的政治》,《金融时报》中文网,2012年9月21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688>。

㉟赵磊:《中美日缺少互信加剧钓鱼岛冲突》,《纽约时报》中文网,2012年9月28日,<http://cn.nytimes.com/article/opinion/2012/09/28/cc28zhaolei/>。

㉟Mark Landler:“奥巴马对华政策的转变”,《纽约时报》中文网,2012年9月22日,<http://cn.nytimes.com/article/china/2012/09/22/c22policy/>。

㉟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在贝德和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的协助下,出乎意料地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宣告,美国将过问南海海上纠纷的解决。中国怒不可遏,而越南和菲律宾觉得他们有了强大的新后盾。

㉟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America's Asia Strategy*,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2012;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近日表示,虽然美国并没说它认为中日两国谁对东海的争议岛屿拥有合法主权,但不要误以为这代表美国持中立态度;当日本受到胁迫、侵犯或恐吓时,美国是不会中立的。参见阿米蒂奇:《美国对中日岛争非持中立态度》,《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12年11月29日,<http://cn.wsj.com/gb/20121129/bog160027.asp?source=UpFeature>。美国参议院全体会议2012年11月29日决定,在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增加一个附加条款,明确规定《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该修正案称美对钓鱼岛最终主权不持立场,但承认日方对该岛屿的行政管辖权,任何第三方单方面行为均不会影响美上述立场。

㉟Andrew J. Nathan, “What China Wants: Bargaining With Beijing”.

㉟鸠山政府在2009年明确提出“东亚共同体”不包括美国。参见吴心伯:《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第64页。

㉟关于鸠山政府的外交安全理念,参见 Leif-Eric Easley, Tetsuo Kotani and Aki Mori, “Electing a New Japanese Security Policy? Examining Foreign Policy Visions within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Asia Policy*, No. 9, January 2010, pp.45–66.

㉟林晓光、周彦:《2010:日本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和日美关系、中日关系》,《和平与发展》,2011年第1期。林晓光和周彦认为,日本外交理念视中国为现实威胁的因素在上升,利用与中国的纷争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政策模式值得关注。

㉟黄大慧:《从“对等”到“协调”:日本民主党政府对美外交走向探析》,《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3期;关于野田政府的外交安全政策的讨论,参见王广涛、张雪妍:《野田内阁的外交政策及中日关系的走向》,《日本学刊》,2012年第1期。

㉟杨伯江:《日本民主党对外战略方向确立》,《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2期。

㉟自民党在2012年12月16日的大选中以绝对优势击败执政的民主党,巨大的优势意味着该党若与规模较小的政治盟友公明党联手,就能通过立法,而不必受议会的制肘。这一举改写了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政治版图,它标志着日本在财政及货币政策,在对中国和其他邻国的关系上都可能出现深远转变。在由于疾病、

政策受挫及丑闻下台五年后，安倍晋三将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他的当选也表明，日本将在正处于紧张状态的对华领土争端以及日韩关于日本二战历史的摩擦中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参见《安倍晋三当选日本首相》，《金融时报》中文网，2012年12月17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8050>。

④5安倍于2012年12月16日晚对日本广播协会表示：“修改宪法首先要修改规定了修改手续的宪法第96条，我想维新会对此能够理解。希望一起合作。”参见《鹰派安倍如何执政有待观察》，《参考消息》，2012年12月17日，第1版。

④6安倍强调：“恢复日美同盟的信赖关系是最重要的……不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就不可能获得强有力的外交力量。总的来说，我希望把美国作为首访的国家，希望做好日程上的安排。”参见《鹰派安倍如何执政有待观察》。

④7林泉忠：《2013年中日剑拔弩张 更趋紧绷？》，《明报》，2012年11月26日。

④8迈克尔·格林：《日本有没有战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2012年11月28日，转引自《美媒：日本精英对国家战略有高度共识》，新华网，2012年12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2/03/c_124035229.htm。

④9需要明确的是，钓鱼岛争端只是一个诱因，它既非导致安全困境加剧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因为，即使不存在钓鱼岛争端，中国的持续快速崛起尤其是海上力量的崛起必然引发中美日安全困境的加剧。

④10唐世平：《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性》。

④11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12年。

④1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第41—43、48页。

④13秦家骢：《力量越大，责任也越大》，《参考消息》，2012年11月30日。

④14罗伯特·罗斯：《中国崛起、地区权力转移与东亚安全：从1949年到21世纪》，第41页。

④15Shiping Tang, “Reputation, Cult of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Security Studies*, Vol. 14, No. 1, January March 2005, pp.34–62.

④16特德·盖伦·卡彭特：《岛屿战争》，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2012年10月1日，转引自《美刊：美方卷入钓鱼岛争端很愚蠢》，新华网，2012年10月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0/04/c_123786850.htm；另见《美政府重申钓鱼岛问题立场未变 拒评参院修正案》，央视网，2012年12月4日，<http://news.cntv.cn/world/20121204/106757.shtml>。

④17特德·盖伦·卡彭特：《岛屿战争》。

④18M. 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Fravel（傅泰林）探讨了政体安全如何影响领土争端。另见 Susan L. Shirk, *Fragile Superpower: How China's Internal Politics Could Derail its Peaceful Rise*, Chapters 3 & 6.

④19目前，日美两国反复强调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即一旦钓鱼岛发生冲突，美军将驰援日本。其实这根本靠不住。该条约第五条规定：“各缔约国宣誓在日本国施政下的领土，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击，依照本国宪法的规定和手续，采取行动对付共同的危险。”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有在日本行政管辖下的领土才是美国对日提供安全保障的对象。即，要适用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两个要件必须具备，一是要在日本合法合理的“行政管辖”之下，二是属于日本的“领土”范围。就美国立场而言，施政权并不等于主权，既然美国从未承认日本拥有钓鱼岛主权，就等于从未承认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因而就根本不具备适用于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的基本要件。参见刘江永：《日本武力介入钓鱼岛的图谋与法律制约》，《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5期，第22页。

④20刘江永：《日本武力介入钓鱼岛的图谋与法律制约》，第21—22页。

④21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第52—53页。

（朱鸣：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外事处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胡令远）

日本与印度“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探析

李 坤 杜 钦

内容提要 随着日印“全球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成“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持续升温。日印结成“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既有两国的历史因素和国家利益考虑，也有美国鼓励和牵制中国的因素。但日印双边关系中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和矛盾，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对中国造成了不同的影响。

关键词 日本 印度 全球战略伙伴关系

日本与印度距离遥远，历史上两国官方和民间往来较少，冷战时期受制于国际形势，两国关系较为冷淡。冷战结束后，印度适时调整了自身的对外政策，开始大力“东向”发展，日本对印度也给予了更高的关注。2000年8月，日本时任首相森喜朗访问印度，两国宣布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之后，双方关系持续升温。2006年12月，印度总理辛格访日后双方决定建立层次更高、合作更为深入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日印“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表现在哪些领域，双方接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一“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又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对处于日印之间的中国会产生何种影响？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日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形成

冷战期间，日本与印度高层互访较少，且互访问隔的时间较长，双边往来处于近乎冷淡的状态。冷战结束后，日印开始重视彼此，官方往来逐渐增多，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双方高层往来密切，互访频繁，在很多领域达成了共识，日印关系获得了全面的发展，逐渐进入“高热”^①状态。

政治上，两国关系不断升温。2000年8月，日本时任首相森喜朗访印，修复了因印度核试验而一度跌停的两国关系，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宣布两国将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两国关系以此为开端开始升温。2001年12月，印度时任总理瓦杰帕伊访问日本。双方签署了《印日联合宣言》，表示要加强双方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的全面对话与合作，并决定每年举行外长会谈。日本在瓦杰帕伊访问期间还承诺加大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力度，决定于次年派经济合作调查团访问印度。这次访问深化了双方的合作，加强了两国关系。2005年4月，日本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了印度。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印日在亚洲新时代的伙伴关系，印日全球伙伴关系的战略定位”等联合声明和八点倡议，在以前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日印关系。继小泉之后，日本大批高官相继访印，拉近了日本与印度的关系，日印关系持续走高。

日印两国在2006年掀起了双方高层交往的高潮。2006年1月，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就任

之初，即将印度作为首访的亚洲国家。9月，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其在就任首相之初，即认为日本应大力加强与印度的关系，与印度关系的加强对日本国家利益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就任首相之后，开始大力倡导“价值观外交”，鼓吹拥有相同价值观的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加强合作，共建亚洲新秩序。同年，印度总理辛格访日，也将共同的价值观作为双方走近的基础。双方发表了《面向日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表示作为“亚洲最大的和最发达的民主国家，双方理应成为伙伴以谋求共同的进步和繁荣，两国有责任也有能力面对来自地区和全球的挑战。为此，双方领导人决定建立全球战略伙伴关系”。^②双方还就日本天皇夫妇和首相访印以及日本在印度班加罗尔建立领事馆等议题达成了一致，从而使“全球伙伴关系”提升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

经济上，日印两国政府大力推动经济合作，日本对印直接投资和官方援助出现超越性增长（表1）：

表1 2000至2011年印度FDI流入国排名(单位:百万美元)

排名	FDI流出国	06-07财年	07-08财年	08-09财年	09-10财年	10-11财年	00-11年加总
1	毛里求斯	6363	11096	11299	10376	6987	62471
2	新加坡	578	3073	3454	2379	3999	15894
3	日本	85	815	405	1183	1562	12030
4	美国	856	1089	1802	1943	1705	10333
5	英国	1878	1176	864	657	755	9215
6	荷兰	644	695	883	899	1213	6772
7	塞浦路斯	58	834	1267	1627	913	5839
8	德国	120	514	829	626	200	4394
9	法国	117	145	467	303	734	2710
10	阿联酋	260	258	257	629	341	2091
FDI总流入		15726	24579	27331	25834	19427	158091
日本FDI投资占比(%)		0.54	3.32	1.48	4.58	8.04	7.61

数据来源：印度工业政策与促进部

从上表可以看出，2006年之后日本对印度投资出现飞跃性增长，除受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投资有较大幅度下降外，其余年份一直持续大幅增长。另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统计，日本在印度的投资份额有赶超日本在中国投资份额的趋势。2003年，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为39.8亿美元，占日本在亚洲投资总额的79%，对印度投资则仅为1.24亿美元，占日本对亚洲投资总额的2.5%。而到了2008年，日本对印直接投资已经与其对中国直接投资不相上下，分别为23.8%和27.8%（表2）。

表2 日本对中国、印度的直接投资(单位:百万美元)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亚洲	5028	10531	16188	17167	19388	23348
占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中国	3980	5863	6575	6169	6218	6496
占比	79.20%	55.70%	40.60%	35.90%	32.10%	27.80%
印度	124	139	266	512	1506	5551
占比	2.50%	1.30%	1.60%	3.00%	7.80%	23.80%

数据来源: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经济援助是日本战后外交的一个主要工具。^③由于意识到印度对日本的巨大作用,日本对印度的官方援助力度明显加大,即使在整体削减对外援助预算,甚至停止对中国官方发展援助后,日本对印度的“偏爱”也未缩减。2004年,日本参议院提出报告强调将把废止对华发展援助纳入视野,同年,印度超越中国成为日本最大海外援助对象。^④在日本对印度的官方发展援助中,ODA贷款无论是总体规模还是上升趋势均颇为显著(表3)。

表3 日本对印度官方发展援助情况(单位:亿日元)

财政年度	ODA 贷款	人道主义捐款	技术合作
2000	189.26	18.29	9.03
2001	656.59	14.34	10.15
2002	1112.39	9.10	9.60
2003	1250.04	17.44	10.34
2004	1344.66	29.89	9.67
2005	1554.58	21.09	8.36
2006	1848.93	5.96	13.17

数据来源:日本驻印度大使馆

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双方高层都高度重视并一再强调加强安全和防务合作。例如,2001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日本时双方敲定每年举行一次国防部长和外长的安全对话机制,2006年印度总理辛格访日时又强调“双长”会议的重要性。以此为契机,日印加深了在军事上的协同合作。2000年10月,日印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海举行了名为“2000远征太平洋”的联合军演,11月日印在印度洋举行反海盗演习。2004年9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和印度海军接连在印度洋进行了数场演习。2007年4月,美国和日印在日本冲绳外海举行联合军演,9月印美日澳又在孟加拉湾举行联合军演。2009年4月,美印日在冲绳外海举行了名为“马拉巴尔09”的联合军演。通过不断的军演,印度和日本在军事上的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

二、日印建立“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原因

(1)历史因素

历史因素历来是困扰日本战后外交的难题。因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政策的侵害，战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对日本都抱有一定的警惕心理。但是，印度与日本关系却未受历史因素的困扰，相反，历史因素对日印关系还产生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二战期间，印度上下弥漫着强烈的反英情绪，对英国强行将印度拉入战争相当不满。日本侵入东南亚后，利用印度的这种情绪，打着“将亚洲从白人统治圈中解放出来”的旗号，支持印度著名的国大党领袖苏巴斯·钱德拉·鲍斯组建印度国民革命军，成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以所谓“解放印度”为主要任务。后因二战后期大势所趋，鲍斯借助日本力量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企图最终化为泡影。但在相当多的印度人民心目中鲍斯仍是英雄，日本也因此在印度人民心中留下了较好的印象。^⑤另一方面，通过东京大审判，日本对印度也产生了良好的印象。这种印象主要源于东京审判时来自印度的法官拉达·毕诺德·帕尔在审判期间提出了“全员无罪”的判决意见，表达其对东京审判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东京审判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因国际法中并没有规定战争就是犯罪；东京审判只有战胜国的法官，而没有战败国的法官，这本身就是不公正的行为；美国对日本投掷原子弹的行为也是反人类的，理应受到审判。^⑥拉达·毕诺德·帕尔的这种另类意见在日本引起了轰动，日本天皇为此曾授予他一等瑞宝勋章。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总理辛格在 2006 年访日时还引用拉达·毕诺德·帕尔的事例，强调日印两国深厚的友谊和面临危难时相互协作的传统，认为拉达·毕诺德·帕尔传达的日印友谊依然留在日本人民的脑海里。^⑦日本外务省对两国关系也有相同的评价，称“日本与印度于 1952 年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印度国内强烈的亲日感情支持下，两国友谊得以维持”。^⑧

由此可见，二战期间的敌对关系并没有对日印关系造成如中日关系那样的阻碍，相反还演变成了促进两国关系的“有利因素”，这客观上也有助于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2）国家利益因素

印度战略家切拉尼曾这样评价日印关系：“这两个国家是天然盟友，没有基本的利益冲突，只有利益的共性”。^⑨这句话用来分析日印结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原因可谓恰如其分。显然，日印在国家利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上的共性是两国建立“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主要动因。

在经济利益方面，印度与日本在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印度持续的经济改革和日本的结构改革恢复景气以及两国间现存的经济互补性，为更进一步增进两国经济关系提供了合作的基础”。^⑩首先，印度经济改革后，亟需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日本作为世界上第二大发达经济体，有着雄厚的资金、完善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日本的援助促进了印度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且日本出口到印度的产品大都属于技术密集型产品，对印度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不构成冲击，不会引起印度财团的反感，因而也不会对印度政府造成过大的国内压力，两者合作相得益彰。其次，日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国内严重缺乏劳动力，印度则是一个劳动力资源极大丰富的国家，双方经济合作既可以为日本的资金寻找“利润增长地”，又可以为印度数量众多的劳动力寻找“出口”。况且，印度众多的人口形成庞大的消费市场，特别是印度的中产阶级，消费能力相当强。再次，印度作为新兴市场，已经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但其国内落后的基础设施对经济的阻碍日益显现，而印度改造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外来投资约 1500 亿美元。^⑪对日本来说，这是一个绝对不能放弃且利润丰厚的机会。

在政治利益方面，尼赫鲁总理之后，印度历届政府一直遵其嘱咐，谋求成为一个“有声有

色的大国”。日本在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也试图改变其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尴尬地位,谋求成为全方位的世界大国。双方都努力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扩大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这一点在两方均积极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改革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日本设定的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之一即是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获取这一位置,也是印度实现“大国梦”的重大步骤之一。因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成为双方一致的政治诉求,双方为此互相借重,共同联手推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扩大。2004年8月,日本外相川口顺子访问印度,印度外长纳特瓦尔·辛格在与其会见后对媒体表示:“两国希望联合国能尽快改革,根据目前国际社会的现实状况,双方均认为对方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合适人选,两国均支持双方谋求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努力”。^⑫2005年日本时任首相小泉访印期间,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决定在推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加强合作,在“入常”问题上互相支持。日印两国认为互相支持符合双方的利益,可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取得更大的声势。

另外,印度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对外能源及其他物资需求逐渐增多,如何保证海外运输线的安全,成为印度政府必须妥善应对的重要挑战。2000年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访问日本时就声称,“从阿拉伯海的北面到南中国海,都是印度的利益范围,”“印度关注的安全环境以及潜在的安全考虑包括从海湾到马六甲海峡的印度西边、南边和东边地区,西北边的中亚,东北亚的中国和东南亚”。^⑬印度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进口的石油天然气和从东亚进口的其他物资都需要经过日本及南中国海海域,为了确保这条运输线的安全,印度需要与日本加强关系。同样,日本作为孤悬海上的贸易大国,各项进出口物资大都需要海运,远洋运输线对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如进口石油中五分之四来自中东国家,印度洋航线关乎其经济命脉,号称“经济生命线”。印度作为印度洋上的大国,能协助日本维护其印度洋航线的安全,1999年印度海军成功解救被海盗劫持的日本商船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与印度发展友好关系,成为日本外交政策中的优先选择。

(3)国际因素

除前述原因为外,日印建立“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还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其中,美国因素和中国因素最显突出。

正如中日建交深受中美关系解冻的影响,日印关系的接近也深受印度与美国关系改善的影响。2000年3月,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访问印度,美印建立了新型伙伴关系。同年8月,日本首相森喜朗也访问印度,与印度建立了“全球伙伴关系”。1998年印度核试验之后,日本对印度进行了制裁,虽然之后两国于2000年建立了“全球伙伴关系”,但日本并未取消对印度的制裁。“9.11”事件后,美国将打击矛头指向了恐怖主义,力图防止“失败国家”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并以此为基础开始调整其外交战略,重点转向稳定地区大国,构建美国领导的反恐体系,美印关系逐渐改善,日本也顺势取消了对印度的制裁。另外,美国也努力为日印的接近搭建平台。2003年6月,日、印、泰、新加坡等国和美国在阿拉斯加参与了为期十五天的合作对抗演习,印度军队和日本自卫队借美国这一平台实现了交流。对此,印度海军的一位高官承认:“日印关系在经过好几十年的冷却之后重新升温,印美战略框架促成了日印之间的战略交流。”^⑭

此外,面对中国加快崛起,日印两国都有紧迫感和焦虑感,这也是两国走近的重要因素。中国与印度和日本都存在领土争议,1962年中印曾为此在边界发生过武装冲突,虽然这场冲突没有对中国造成大的影响,但对印度的影响却非常深远。时至今日,纵然中印之间已经实

现了关系正常化，双边关系有了极大改善，但印度国内一部分人，特别是一些政界和军方人士对中国的不信任感依然存在。印度国防部长穆克吉曾告诫国人，“印度必须密切关注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计划及其海军的扩张，我们必须留意这些变化给我们的战略带来的影响。”^⑯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面对日本的拉拢，印度自然不会拒绝。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也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与印度拉近关系也是其中措施之一。日本首相森喜朗在印度演讲时对此有所暗示，他说，“关于日印关系，只要看一眼地图就可一目了然，在战略上也是重要的，我们想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问题上同印度紧密合作。”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对此评论说：“在首相的讲演中虽没有使用‘中国’这个字眼，但要说的意思是很明确的。对都想当常任理事国的两国来说，中国是‘共同的障碍’。”^⑰印度作为亚洲另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日本与其加强关系，有利于牵制中国。

三、日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日印关系虽然进展迅速，但也并非十全十美，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问题，具体如下：

在政治领域，首先，日本在外交上长期追随美国，唯美国马首是瞻，与印度发展关系时也不得不顾及美国的反应。美印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虽然“9.11”事件后，美国出于反恐的需要调整了和印度的关系，但这仅仅是掩盖了矛盾，而非消除了矛盾。因此，日本对印度的政策还会受美国对印度政策和美国对南亚政策的牵制。印度政府对日本也有一些负面认识，或者认为日本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或者认为日本的外交不成熟，对日本没有独立的外交表示遗憾。^⑱其次，日本外交的重点集中在经营周边外交和其主要投资对象国，其印度洋航线的安全问题主要依靠美国。这一点让印度相当不满，认为日本只关注中国、韩国、俄罗斯和东盟各国，对印度不够重视。

作为二战后第一个摆脱殖民统治并积极支持其他国家争取独立斗争的国家，印度自视甚高，认为自己为大国，是天然的领导者。当年尼赫鲁在加拿大议会发表演讲时就曾经这样明示过，他说：“印度作为亚非自由和种族平等的维护者，是由地理和历史的事实自然形成的。”^⑲所以，无论是发起“不结盟”运动，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与其建立外交关系，都有印度大国理想的痕迹。因此，印度在发展对外关系时十分注重自己的大国地位，注重“扎扎实实依靠自己站立起来的国家形象”^⑳。日本与印度发展关系，还有制衡中国的战略考虑。印度历届政府对日本的这项战略虽有所回应，也只是“左右逢源外交”手段使然，在最终目的上，印度出于大国战略考虑，并不愿与日本同步。

另外，在“入常”问题上，两国都想跻身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尽管目前日印结成“同盟”，试图一起“冲常”，但两国发展层次不一样，各自的国家利益也不一样，而且双方同为亚洲国家，在争夺亚洲票源上存在一定的竞争。目前，双方都面对各自邻国的反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一再惹怒曾受其侵害的国家，而且执意不肯纠正自身的历史问题，不断和邻国发生领土纠纷，在入常问题上日本遭遇邻国的阻力很大；印度也面对巴基斯坦等邻国的反对，双方在入常问题上的步伐最终很难一致。

在经济领域，经济是目前日印关系中的主要因素，但其发展也不尽如人意，双边贸易量只有一百多亿美元，日本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及投资企业也不是很多。因此有印度学者评论认

为，“经济关系支配着印日关系的全部，却没有达到日本与中国以及东南亚关系之间的程度”。^②究其原因，还是印度国内投资环境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印度对外国投资和商品进口限制较严，导致日本企业对印度投资时比较谨慎。其次，印度基础设施落后，特别是经常性停电、限电，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收益减少，从而导致海外投资驻足不前。再次，双方经济实力并不对等，日本在印度对外贸易份额中所占比重较大，而印度则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很少。因此，印度将日本视为重要的经济伙伴，而日本拉拢印度则主要出于政治和安全考虑，双方认识有一定的错位。

在核武器问题上，双方也有一定的矛盾。1998年印度核试验之后，日本对印度进行了制裁，虽然“9.11”事件后制裁解除，但时至今日，日本依然督促印度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印度认为核武器是大国地位的象征，也是其实现大国梦想的最重要的依靠，在此问题上印度不会轻易妥协，放弃更不可能。因此，双方在此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

四、对中国的影响

日印分别位于中国的东端和西端，且与中国都有领土纠纷。基于此，部分学者认为日印的合作将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对中国产生消极影响。笔者认为在此问题上应该具体领域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认为都是消极的。

在政治方面，虽然中国与日印两国都有领土纠纷，但目前中印边境处于平静状态，两国出于发展经济的目的，都需要良好的边境环境。因此，两国在边境上都倾向于维持现状，近期内两国关系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动。日本拉拢印度有牵制中国的意图，印度对此也心知肚明，虽然出于外交策略会共谈民主、价值观，但事后对中国会有所解释。如印度总理辛格访日大谈民主价值观后，在吉隆坡接受记者访问时，公开表示印度和中国具有极大的合作可能性，因为世界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这两大经济体的成长。^②另外，印度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国，有着本国的国家利益考量，冷战时期尚不肯为此轻易与美国等超级大国妥协，在多极化时代更不肯轻易与日本结盟抗衡中国。印度领导人辛格曾对温家宝总理明确表示，“印度不允许任何人利用印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更不会参与任何包围、遏制中国的行动”。^②

在经济方面，日印两国都努力推动双方经济交往，日本试图不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印度则出于发展的需要。但基于经济利益而言，双方都离不开中国。首先，中印之间优势互补。中国的制造业和对外出口有优势，印度则擅长于信息产业和高科技服务，双方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美国部分学者于此认为双方利益最关键的契合领域是经济关系，特别是双边贸易，^②这个认识是符合现实的。中印两国首脑在2006年发表的《联合宣言》中也决定大力发展战略的贸易，目前中国已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其次，中日之间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2004年中国就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且日本在中国有着巨大的投资，两国的经济依存度远远大于日印之间的经济依存度。因此，无论日印之间如何合作，都难以完全绕开中国。

在安全方面，日印接近于中国有潜在的消极影响。首先，在台湾问题上，1972年日本与中国签署建交公报时，对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只是尊重而非承认，而且随着日本将台湾纳入其“周边事态”范围，台湾问题日益成为中日安全领域的核心问题。印度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一直比较谨慎，但中印边界冲突之后，印度议会就有与中国台湾地区联合共同遏制中国大陆的

声音,至今这种声音在印度还时有出现。因此,台湾问题可能成为日本联合印度共同制衡中国的重要筹码。其次,在能源航线问题上,日本试图在印度洋发挥影响,为此曾向印度建议互相使用对方的海军基地。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中国海军在太平洋受到美日海军的牵制,难以持续在印度洋发挥影响。因此,日印军事上的接近使中国面临更加复杂的安全形势。

综上所述,日印关系的接近在政治上对中国影响有限;经济上,随着日印经济关系的发展,可能对中国带来一定消极影响,但不会很大;安全上,则在中国周边增加了一些不确定因素乃至负面影响。其消极和负面影响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印关系的发展变化。

注 释:

- ①《日印关于建立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日本外务省,<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india/pdfs/joint0612.pdf>。
- ②《印日发表联合声明公布战略伙伴关系路线图》,新华网 2007 年 8 月 22 日新德里电。
- ③K.V. Kesavan, “Japan’s Expanding Diplomacy: Some Considerations for Indo-Japanese Relations,” in M. Rasgotra, V.D.Chopra, K. P. Misra, eds., *Indi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90s*, New Delhi: Patriot Publishers, 1990, p.191.
- ④唐璐:《透视印度成为日本首援国背后双方各执何种态度》,《国际先驱导报》,2004 年 4 月 12 日。
- ⑤林承节:《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与日本》,《南亚研究》,1996 年第 1 期,第 50—58 页。
- ⑥盐田道夫:《天皇和东条英机的苦恼——甲级战犯的遗书和终战迷录》,东京:日本文艺出版社,1988 年,第 221—222 页。
- ⑦李若愚:《历史因素对日印关系的现实影响》,《日本问题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13 页。
- ⑧《日本与印度关系》,日本外务省网站,<http://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data.html>。
- ⑨The Hindustan Times, August 9, 2000.
- ⑩钟耿涛:《日本与印度经济合作的发展及其战略分析》,《集团经济研究》,2006 年第 3 期,第 234 页。
- ⑪马挺:《日本人为何关注印度》,《瞭望新闻周刊》,2006 年第 8 期,第 57 页。
- ⑫卫灵:《大国战略下的日印关系》,《当代世界》,2007 年第 5 期,第 27 页。
- ⑬陈利君:《21 世纪中国与日、印、俄战略关系走势探析》,《云南社会科学》,2003 年第 2 期,第 34 页。
- ⑭邱永峰:《日本自卫队三巨头密集访印》,《青年参考》,2006 年 2 月 18 日。
- ⑮西达尔特·斯里瓦斯塔瓦:《印度高声谈论针对中国的轴心》,亚洲时报在线,2005 年 4 月 7 日。
- ⑯堀江隆:《森喜朗想通过改善日印关系牵制中国》,《朝日新闻》,2000 年 8 月 25 日。
- ⑰Rajaram Panda, “India and Japan in the New Century,” in Nalini Kant Jha, ed., *South Asia in 21st Century: India, Her Neighbours, and the Great Powers*, New Delhi: South Asian Publishers Pvt Ltd., 2003, p.278.
- ⑱Jawaharlal Nehru, “Asia Is Renascent,” in *Jawaharlal Nehru’s Speeches, 1949–1953*, Delhi: The Publications Division,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 Government of India, 1954, p.128.
- ⑲伊曼纽尔·波奇帕达斯笔录:《甘地夫人自述》,亚南译,时事出版社,1981 年,第 140 页。
- ⑳V. P. Dutt, *India’s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 1999, p. 330.
- ㉑赵胜玉:《印度总理辛格:世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印中两大经济体》,中新社 2010 年 10 月 28 日吉隆坡电。
- ㉒郭金超:《中印总理会晤,辛格称不参与任何遏制中国的行动》,中新网 2012 年 6 月 21 日里约热内卢电。
- ㉓Ashley J. Tellis, “China and India in Asia,” in Francine R. Frankel and Harry Harding, eds., *The India-China Relationship: What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Kno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2.

(李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杜钦: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贺平)

论中韩战略合作及其对日本的战略影响

查晓刚

内容提要 近年来,中日韩三国合作无论从内容还是机制上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因为域内域外的非经济因素,三国合作仍面临诸多困难。综合考虑经济与政治安全因素,在东北亚的中日韩三边合作中,中韩合作可以比中日、韩日合作发展得更加迅速和深入。中韩合作的深化可以推动日本参与中日韩三边合作以及东亚合作的意愿和动力,也可以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起到一定程度的软性抵制作用。作为理性的国际行为体,韩、日两国都具有做出这种选择的利益逻辑。这种路径的顺利实现,不仅将加强中韩两国在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也将进一步促进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从长远说,还可以成为中国以“两步走”战略实现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效抓手。

关键词 东亚合作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 中国区域合作战略 中韩关系 中日关系

自从奥巴马政府推行所谓的重返亚太战略以来,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以及东亚区域合作进程都出现了重大变化,中国受到的挑战之严峻也是近年来所罕见。如何看待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带来的在政治安全和区域合作两大领域的挑战,成为中国国内热烈讨论的话题。^①大部分讨论都集中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本身以及对中国的影响,关于中国如何应对的讨论则相对较少。本文注意到韩国在中美关系中的特殊性,试图分析加强中韩全面战略合作^②可能会对日本在中日韩和东亚合作上的态度以及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产生怎样的影响,进而分析其对中国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获取区域合作主动权上具有哪些重要作用。

一、中日韩合作的现状与特征

中日韩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三个主要大国和先后腾飞的经济体,相互间的合作交流一直比较密切,新世纪以来取得较大进展。经济方面,日本作为本地区最先发展起来的经济体,在中韩两国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一直都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韩国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也逐渐扩大了在中国的市场参与;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也由过去主要是接受日韩两国的投资以及向两国出口,发展到现在开始向后两者投资并成为它们的主要出口市场。政治安全方面,尽管三国存在政治制度差异,但是在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却存在共同利益,朝核问题是三国政治安全合作的重心。对中日韩三边合作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三个特征。

首先,三国正式合作机制形成时间不长,近年来虽取得一些进展,但受到历史问题和领土争议等问题的消极影响明显,中韩双边合作机制相对比较顺利。中日韩三边的正式合作直到上世纪末的1999年才开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得到加速。1999年在东盟10+3的框架下,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与东盟举行峰会的同时也开始举行短暂会晤,商讨共同关心的问题。这种非正式机制尽管也产生了《中日韩推进三国合作联合宣言》(2003)、《中日韩三

国合作行动战略》(2004)等重要文件,取得一些合作成果,但相较于三国密切的经济关系背景,三国合作明显存在更大空间。2008年以第一次中日韩领导人峰会机制正式建立为标志,三国合作开始得到三国领导人的重视,这一进程也得到加速,主要成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三国合作秘书处于2011年9月1日在首尔成立,三国合作有了一个明确的机制性载体;二是2012年5月13日签署的三国投资协定。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推出,韩日、中日之间领土争议的激化,中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的推进遇到了困难,中日、韩日之间的双边合作机制也受到阻碍。2009年日本民主党掌握政权之初,鸠山由纪夫政府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概念,强调了中日韩合作的重要性,但是美国的反对使得日本首相换人,使其对东亚合作的态度也发生巨大改变。2009年10月7日,日本外相冈田克也在阐述鸠山首相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时,虽然强调了日美关系,但是在说明共同体构成时只提到了日本、中国、韩国、东盟、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没有提到美国。2009年10月14日,美国对“东亚共同体”首次作出正式表态,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提醒亚洲各国“任何重要的机制都不要把美国抛置在外”。^③鸠山首相因为在政策上背离美国意愿,在国内外受到强大压力,被迫下台。新上任的菅直人、野田佳彦两位首相都从鸠山政府的政策上退缩,强调美国在亚太的不可或缺性,并宣示要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伙伴计划(TPP)。由于钓鱼岛争议激化,中国和日本在东亚峰会上的双边首脑会晤未能实现,双边的合作机制也几乎陷于停摆;日本则因为韩国总统李明博登临独岛、要求日本天皇访韩前进行道歉等事件对韩国表现出了强硬姿态,不愿对到期的韩日货币互换协议进行延期,以作为对韩国的惩罚。^④尽管三方在东亚峰会期间仍然宣称要继续推进中日韩三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但是目前看来该谈判的进展将难以快速进行。

与此相对,中韩之间的合作机制则继续得到强化。政治安全上,2008年两国建立了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就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讨论,迄今已经顺利进行了五次,而且由于不限制话题,该机制被评价为中韩两国沟通的有效窗口。^⑤经济上,中韩两国于2012年5月正式启动了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目前已经进行四轮谈判,双方都强调要加速推进。

其次,经济上的中日合作规模大于中韩、韩日,但是日韩两国对中国的依赖度均比中国对二者的依赖度高,特别是韩国对中国的依赖度更高。第一,从经贸合作总体规模来看,三国合作程度提升非常迅速,其中中国又发挥了主要推动作用,成为日韩两国的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从2000年到2011年,三边贸易由1690亿美元猛增至6941亿美元,增长了3.1倍。其中中韩贸易增长了6.1倍,中日贸易增长了3.1倍,日韩贸易增速则相对缓慢一点,增长了1.1倍。与此同时,三边投资规模也在快速扩大,如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余额在2000年末只有86.99亿美元,到2011年末已猛增至833.79亿美元,11年间增长了8.6倍。同期日本对韩国的直接投资余额也由41亿美元增至179.68亿美元,增长了3.3倍(见表1)。^⑥中国对日韩两国的投资近几年来也从少到多,增长迅速。^⑦

表1 中日韩三边贸易(2000–2011,亿美元)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增长率(%)
中日	832	878	1010	1336	1679	1844	2074	2360	2668	2288	2978	3429	312.1
中韩	345	359	441	633	901	1119	1343	1599	1861	1562	2071	2456	611.9
日韩	513	427	440	525	662	714	776	815	882	692	906	1056	105.8
合计	1690	1664	1891	2494	3242	3677	4193	4774	5411	4542	5955	6941	310.7

数据来源：江瑞平：《中日韩经济合作：动因、态势与影响》，《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

第二，就三边经贸关系的绝对量看，中日之间大于中韩与韩日，但中韩经贸关系增长更为迅猛。由表1可以看出，2011年中日贸易额为3429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当年中韩与日韩贸易额的总和，这说明单就经贸合作规模而言，中国和日本是本地区的核心角色，这也与两国分别是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密切相关。但是也必须注意到，中韩之间贸易的增长率为611.9%，比之于中日贸易312.1%的增长率，快了将近一倍，说明中韩之间的贸易潜力和发展势头非常大。

第三，从中日韩三方相互依赖度看，不对称性日趋明显，日韩对中国的经贸依赖度有显著上升，特别是韩国对中国依赖度非常明显。就韩国而言，出口方面，中国在2003年就超过美国成为韩国的最大出口市场，2011年韩国对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出口依存度分别为23.9%、10%和7%，中国的市场重要性比美国和日本加起来还要多将近7个百分点。进口方面，中国在2007年超过日本成为韩国的最大进口来源地，2011年韩国对中国、日本、美国的进口依存度分别为16.5%、13%和8.5%（见表2）。

表2 韩国对中、日、美三国的贸易依存度(2002–2011年,单位:百万美元、%)

对中、日、美的出口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中国	23753.6	35109.7	49763.2	61915.0	69459.2	81985.2	91388.9	86703.2	116837.8	134204.9
中国占比								23.2	24.8	23.9
美国	32942.7	34368.8	43026.6	41499.6	43320.6	45884.1	46500.9	37802.9	49991.9	56417.0
美国占比								10.1	10.6	10.0
日本	15143.2	17276.1	21701.3	24027.4	26534.0	26370.2	28252.5	21770.8	28176.3	39712.5
日本占比								5.8	6.0	7.1
从中、日、美的进口										
中国	17399.8	21909.1	29584.9	38648.2	48556.7	63027.8	76930.3	54246.1	71573.6	86425.8
中国占比								16.8	16.8	16.5
日本	29856.2	36313.1	46144.5	48403.2	51926.3	56250.1	60956.4	49427.5	64296.1	68301.9
日本占比								15.3	15.3	13.0
美国	23111.3	24935.0	28918.7	30787.5	33796.7	37393.4	38556.1	29160.6	40588.7	44815.8
美国占比								9.0	9.5	8.5

数据来源：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DOTS)

从表 2 可以看出，中国作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特别是最大出口市场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重要性要远远超过美国和日本。就日本而言，出口方面，中国在 2009 年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市场，2011 年日本对中、美、韩三国的出口依存度分别为 19.6%、15.5% 和 8%。进口方面，中国甚至早在本世纪初就已经成为日本的最大进口来源地，2011 年日本对中、美、韩三国的进口依存度分别为 21.5%、8.9% 和 4.7%（见表 3）。

表 3 日本对中、美、韩三国的贸易依存度（2002–2011 年，单位：百万美元、%）

对中、美、韩的出口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中国	39957.6	57479.8	73917.2	80004.7	92789.1	109296.5	124968.8	109632.1	149626.1	161818.2
中国占比								18.9	19.4	19.6
美国	120197.8	117384.2	128606.0	136001.6	147230.4	145575.4	138931.7	95343.1	120483.4	127774.0
美国占比								16.4	15.6	15.5
韩国	28611.9	34823.0	44247.0	46678.1	50290.0	54268.5	59425.5	47237.3	62270.2	66006.9
韩国占比								8.1	8.1	8.0
从中、美、韩的进口										
中国	61791.8	75559.2	94335.0	108439.1	118443.8	127760.4	143678.3	122536.2	153368.9	183902.6
中国占比								22.2	22.1	21.5
美国	58588.9	59891.5	63604.8	65446.9	69328.5	72263.9	78974.9	60486.6	69026.5	76172.7
美国占比								11.0	9.9	8.9
韩国	15497.5	17930.7	22062.5	24398.2	27385.1	27299.9	29505.4	21986.0	28648.8	39786.9
韩国占比								4.0	4.1	4.7

数据来源：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DOTS)

从表 3 可以看出，对于日本的对外贸易来说，中国的重要性要远大于韩国。就中国而言，出口方面，美国一直都是最大的出口市场，但是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占比有所下降，日韩在中国对外出口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和中国在日韩的对外出口中所占地位相比，则要低很多。进口方面，日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进口来源地，韩国也仅次于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进口来源，美国名列其后，处于第三位（见表 4）。

再次，政治安全上中韩之间矛盾的刚性弱于韩日与中日两对双边关系的矛盾。中日韩作为邻近的三个主要地区大国，历史上虽有长久友好交往的历史，但是近代以来却主要是战争的记忆，所以三边关系错综复杂，难以简单综合，但三边关系中的矛盾却有刚柔之分。中韩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两国在对待朝鲜特别是如何应对朝核问题的态度上的差异，二是在半岛统一问题上的立场，三是韩国与美国的安全联盟关系。

表4 中国对美、日、韩三国的贸易依存度(2002–2011年,单位:百万美元、%)

对美、日、韩的出口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美国	70063.8	92633.2	125180.7	163348.3	203897.9	233180.6	252786.4	221384.3	283678.8	324856.5
美国占比								18.4	17.9	17.1
日本	48483.0	59422.6	73536.3	84097.2	91772.5	102116.3	116176.5	98044.9	120262.4	147290.1
日本占比								8.1	7.6	7.7
韩国	15508.0	20096.4	27809.5	35116.8	44558.1	56128.5	73905.2	53638.8	68810.6	82924.7
韩国占比								4.5	4.4	4.4
从美、日、韩的进口										
日本	53489.0	74150.8	94191.7	100467.6	115810.9	133903.3	150807.5	130927.9	176304.0	194409.8
日本占比								13.0	12.6	11.2
韩国	28581.0	43134.7	62165.6	76873.8	89818.5	104044.6	112174.9	102501.4	138023.8	161673.3
韩国占比								10.2	9.9	9.3
美国	27251.4	33938.9	44743.9	48994.5	59326.1	69997.6	81722.6	77772.5	101959.2	119163.7
美国占比								7.7	7.3	6.8

数据来源: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DOTS)

如果仔细探讨,我们会发现,中韩之间的矛盾是可以缓和的,并非刚性矛盾。关于如何对待朝鲜和朝核问题,中韩都不希望朝鲜出现动荡,而是希望促进朝鲜实现稳定转型,在这个意义上,中韩两国具有共同看法。在半岛统一问题上,中国政府从来就声称支持半岛的和平统一,实质上只要不危害中国的安全利益,中国也的确不需要反对朝半岛的统一。在韩国与美国的安全联盟关系上,韩国看重的是借此应对朝鲜的可能威胁,也有借美国平衡中国和日本的考虑,但是只要韩国不以韩美同盟作为反对或遏制中国的工具,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因此,中韩之间在政治安全方面的矛盾不是根本性的,具有可协调、可妥协的空间。

与之相对,中日矛盾和韩日矛盾则刚性特征更为明显。中韩两国与日本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上均存在深刻矛盾,短期内几乎没有办法解决,而且妥协的空间很小,特别是在领土争议问题上更是如此。2012年先后爆发的独岛和钓鱼岛争议已经充分地显示了中日、韩日之间在领土问题上的刚性矛盾可能带来的破坏力。中国与日本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很多矛盾,例如台湾问题、日本入常问题、日美同盟与中国的关系问题等,这些矛盾几乎都是结构性的,只要日本不甘于中国成为东亚地区的领导力量,这些问题就会一直存在,而且日方可能随时企图利用这些问题来牵制中国。韩日之间除了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有深刻矛盾之外,在如何对待朝鲜半岛统一的问题上两国也可能存在深刻分歧。日本作为曾经殖民过朝鲜半岛的国家,在中国重新恢复东亚最强国家的背景下,对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的前景会非常担忧,担心自己在东亚的地位会彻底被边缘化,甚至在历史问题上会受到中国和朝鲜的报复。韩日矛盾的深刻性,也是为什么美国试图将美日、美韩两对双边安全同盟整合为美日韩三边安全同盟却受到挫折的原因之一。

二、中韩战略合作可以促进日本深入参与东亚合作

如果日本能够采取较为理性的政策,即不是出于短期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是能够在10-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框架里考虑其利益,则中韩合作的加速将使得其除了选择加入东北亚一体化之外,别无更好的选择。

从中日韩三边经贸合作角度看,如果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中韩经贸关系合作深化,相对于日本,韩国在中国市场上将享有更加便利和优惠的商业环境,这意味着日本企业将受到韩国企业更强有力的竞争。因此,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一旦达成,日本将不得不寻求加紧谈判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进程,将 TPP 在日本对外经济合作战略中的排序推后,以避免在三边经贸合作中被孤立,特别是要防止韩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占得先机。

金明玉等学者对中日韩三国在 1992-1996 年和 2005-2008 年两个时期比较优势变迁的研究显示,过去十几年来中日韩三国的出口结构都有所变化。^⑧中国的变化最为显著,服装、毛皮制品、纤维制品的比重明显下降,皮包、鞋类、食品、农牧业在十大出口产业中完全消失,信息通讯产品、办公机械以及其他机械与装备制造业占比明显提高,出口产业结构得到很大提升。日本的出口结构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汽车和拖车制造业占比较高,其他机械、化工产品比重有所上升,信息通讯产品、电子机械和运输装备比重有所下降。韩国的出口结构中,纤维制品、服装等完全消失,信息通讯产品则占比超过 20%,汽车、拖车、化工产品出口比重也有很大提升。总体来看,中国的比较优势提升明显,韩国的比较优势也进展迅速,日本则相对缓慢。从结构特性看,日本、韩国的十大出口行业都集中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则仍更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货物贸易领域,日本和韩国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虽然在技术密集度较低的领域,中国和韩国存在一定竞争,但是总体来看中国与日韩两国仍都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中国作为日韩两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内需市场仍然以较快速度增长,其规模有望在若干年内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可以说,能否在中国市场占得先机,在相当大程度上将决定今后二十年左右时间日韩两国企业的海外竞争力,也是两国获取“中国经济增长红利”的关键。而且,由于中日韩三国之间产业内和产业间分工已经非常高,如果中韩自贸区建立,中韩之间产业分工在垂直和水平两个维度上将得到深化,将有效提升两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考虑到韩国与日本的出口结构日趋相同,这将给日本企业在海外形成非常大的竞争压力。

从上述意义上讲,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将增加日本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紧迫感,从而事实上迫使日本优先选择东亚经济合作,而不是太平洋方向的 TPP。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影响力迅速上升,特别是在 2009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日本对中国可能主导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事务非常担心,为此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 2011 年 APEC 夏威夷峰会上宣布了加入 TPP 的意愿,以期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引入美国、平衡中国。但是由于国内存在强烈反对,日本官房长官藤村修在 2012 年 8 月 29 日表示放弃在 2012 年加入 TPP 谈判。2012 年 12 月 26 日,自民党的安倍政府重新上台后,新任经济产业相茂木敏称:“有必要在尽早阶段找到机会,与美国商谈今后有可能开展何种磋商”,^⑨可以看出日本态度仍然犹豫。与之相对,在中韩两国于 2012 年 5 月 3 日宣布启动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之后,日本感到了巨大压力,坚定了建立中日韩自贸区的决心。2012 年 5 月 3 日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宣布将于 11 月 20 日启动中日韩自贸区,但中日关系、韩日关系在 2012 年夏季

以后都降到了近几十年来的最低点,使得各界对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能否继续进行深感担忧。有点出人意料的是,在 2012 年 11 月东亚峰会期间,尽管中日领导人在会议上围绕钓鱼岛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甚至都未能进行会晤和交流,韩日领导人之间也互动冷淡,但是三国仍然宣布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决定在 2013 年初举行第一轮。^⑩这充分说明,不仅中韩两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上眼光长远,态度坚定,日本也认识到了脱离中韩经济合作的危险。

从东亚区域合作看,中日韩三国是最大的三个经济体,具有绝对规模优势,但韩国又是中日韩三国中的关键小国,它选择和中日两国中的哪一国进行合作将决定中日两国谁能在东亚合作中具有更大的话语权。从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到 2008 年以前,东亚合作主要是“小马拉大车”模式,即尽管东盟在经济规模上与中日韩相差甚远,但是考虑到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中日韩还是基本上认同让东盟作形式上的东亚区域合作的推手,各种区域合作机制也基本上围绕东盟建立,例如东盟 10+3 机制、中日韩分别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东盟地区论坛、清迈协议等。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中日韩三国之间经贸关系合作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地位的上升,东盟已经难以再扮演所谓的驾驶员角色,在设定议程、协调立场等方面都面临力有未逮的尴尬境地。中日韩三国,特别是中日两国之间能否达成一致,成为东亚区域合作进一步向前顺利推进的前提。以清迈倡议多边化框架下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为例,中日韩三国占到了出资比例的 80%,东盟 10 国只占 20%。但出于平衡考虑,中国和日本均占 32% 的出资比例,两者在该机制的话语权相同。韩国出资比例为 16%,这意味着如果中日发生意见分歧时,韩国的选择将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中韩经贸关系深化,战略合作加强,中韩两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共同利益点也会增多,日本如果不加入中日韩合作,则它在东亚的话语权将相对会受到削弱。

三、中韩战略合作可软性抵制美国“重返亚太”战略

以 2009 年 11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东京的演讲^⑪、2010 年 1 月和 10 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两次演讲^⑫为主要启动标志,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渐次推开。该战略的主要针对目标就是中国,也正因如此,“中美战略关系和中国安全环境发生历史性重大变化”^⑬,中国周边外交形势出现了多年未曾经历的动荡,任由这种态势发展,对中国将非常不利。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主要有两大支柱,即政治安全支柱和经济支柱。政治安全方面主要是加强美日、美韩、美澳、美泰、美菲等军事同盟,重新重视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香格里拉对话等地区机制,积极介入南海、中日等区域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大力推进与越南、缅甸、泰国等东盟国家的外交关系等。^⑭经济支柱则主要是“借壳上市”,利用 TPP 这一原本只有四个亚太小国组成的地区贸易机制作为推广美国自由贸易模式、拓展美国经济利益、分化中国地区经济影响力的重要工具。这两大支柱需要相互支撑和强化,方才能够发挥该战略的整体最大效应。否则,任何一个支柱弱化或残缺,则另一支柱也必然会受到影响,整体效率也会大打折扣。政治安全支柱弱,将难以保证经济合作的稳定性和机制性;经济支柱弱,美国将缺乏在该地区支持其安全同盟的长期经济资源,从而使其亚太战略缺乏可持续性。

客观而言,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的确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⑮通过挑唆和激化“天安号”事件、钓鱼岛争议、黄岩岛争议,美韩、美日、美菲军事同盟都不同程度得到加强,美国也宣布在澳大利亚派驻海军陆战队。通过向缅甸派驻大使、减少制裁,美国正在减少中国在缅

甸的影响力。尽管 TPP 谈判虽然未能如计划安排那样推进,但的确对亚洲区域原有经济合作进程乃至方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效,主要是利用了东亚地区国家由于在安全问题上对崛起后的中国可能在领土以及海洋权益争议上采取更强硬政策的疑惧,以及在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的担心。美国通过大力宣传和煽动东亚地区国家在安全和经济上的这两种担心来推进其重返亚太战略的政治安全与经济两大支柱。为了应对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带来的挑战,中国需要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的前提下,寻找较为软性的方式予以应对,加强中韩战略合作则可以是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

首先,中韩战略合作可以防止韩国加入美国在中国周边构筑以遏制和防范中国的亚洲版“小北约”。在政治安全方面,正如上文所分析的,中韩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在维持朝鲜半岛稳定上目标一致,在应对日本政治右倾化及日本政客否认历史等问题上立场一致,而且韩国清楚知道中国是在朝鲜半岛能否最终实现统一话语权最大的行为体,和中国保持稳定友好的政治安全关系对朝鲜民族的未来至关重要。但是韩美之间在政治安全议题上却存在一定的目标分歧,一是在如何对待朝鲜上,韩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立场就时常出现重大背离,金大中、卢武铉政府,最近新当选的朴槿惠总统都将对朝鲜的援助与其他议题进行分割,这和美日将援助和其他议题相关联的政策具有重大区别。韩国与美日之间的这种区别,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韩国和朝鲜毕竟同属一个民族,在缓解同族的生活苦难方面天然具有更强的同情心,二是韩国和朝鲜紧密相邻,一旦朝鲜因为饥荒等原因出现动乱,最直接受害的就会是韩国,所以韩国必须要以可承受的代价维持北方的稳定。而美日则缺乏这两种动机,它们更多的是追求遏制朝鲜军事能力,甚至利用内部动荡更迭朝鲜政权。因此,就维持朝鲜半岛的稳定而言,中国与韩国,比之于韩国与美日,具有更大的共同利益。韩国也不愿卷入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中去,这也是为什么在延坪岛炮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访问韩国和日本,希望构筑美日韩军事同盟,并以举行美日韩联合军演作为第一个行动步骤。对此提议,韩国政府以“虽然韩国同日本在较低水准上存在军事合作,但要想达到共同演习的合作程度恐怕很难”作为托词予以婉拒。^⑩韩国对此加以拒绝应该主要出自两个原因,一是韩国国内的确存在对与日本进行军事合作的强烈反对情绪,2012年韩国政府与日本开始草签《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上受到国内强烈反弹,最后不得不放弃,并以惩处相关负责人而尴尬收场,^⑪二是也担心如果支持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的建立将会激怒中国,从而导致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可能采取与韩国对抗的措施。

对于中国来说,在如何应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问题上存在着层次性。第一,既有的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不是中国最优先关注的对象。虽然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与本地区的日、韩、菲、澳、泰等国的所谓“辐轴型”军事同盟体系早已不合时宜,且无正当性,但它们毕竟是历史的产物,难以在短期内消除。而且它们尽管有针对和防范中国的意涵,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没有构成非常直接的威胁,所以中国固然不喜欢它们的存在,但也没有必要和投入过多资源来迫使它们消失。第二,一个可能形成的亚洲版“小北约”将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中国必须予以坚决反对,但亦应注意应对方式,宜软宜巧不宜硬。中美关系是当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好坏与否将决定整个全球战略格局的走向。对于正处于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的关键阶段的中国来说,维持一个“斗而不破”、“斗智斗勇不斗气”的中美关系就更为重要。但中国也不应该坐视美国建立亚洲版“小北约”不管,“美日同盟是

美国在东亚联盟体系的核心辐条，美韩同盟是其在东亚联盟体系的重要辐条”，^⑩如果这两根辐条合二为一，中国的国家安全将受到极大牵制和威胁。为此，充分利用各方之间的利益与矛盾，在理性基础上使相关国家认识到进一步深化军事同盟的危害性就是中国可以采取的有效应对策略。

韩国恰恰是中国可以做工作、打破美国在东北亚维持陈旧冷战思维的重要环节。由于韩国与日本既有历史宿怨又有领土争议等刚性矛盾，与美国在应对朝鲜半岛的长期目标上存在差异，对中国朝鲜半岛局势发展走向的影响上有不可缺少的期待和倚重，再加上美国在韩日之间表现出的重日轻韩态度也经常引起韩国国内的不满，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加强与韩国的战略对话和安全合作，说服韩国不要在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和亚洲版“小北约”扮演实质性的角色。这种选择从长远来说，也完全符合韩国的战略利益，韩国完全有动力这样做。只要韩国不支持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那么在中国最邻近也是经济合作最密切的地理区域就不会出现严重的安全威胁，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政治安全支柱的核心就会出现空洞，其效果也自然会大打折扣。

其次，中韩战略合作可以是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经济支柱（TPP）的重要手段。美国推进 TPP 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由于亚太是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区域，美国希望通过在该地区构建以自己标准为主导的自由贸易区来获得经济增长红利。二是由于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在构建亚太特别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担心其经济影响力可能会逐渐被中国所取代，进而会丧失其政治安全影响力的经济基础，为此需要推行一个中国目前难以接受的自贸区版本，使得中国事实上自动被排除在外，而美国又将该地区的众多经济体纳入其经济链条中去，从而重新夺回本地区的经济主导权。

而美国如果希望达到其重返亚太的经济支柱的目标，韩日两国加入 TPP 又是关键。因为无论从地理位置、经济规模、产业链，还是与亚洲其他部分的经济关系而言，日本与韩国都是本地区除了中国之外最重要的经济体。如果日韩两国加入 TPP，则事实上就在亚太形成了一个排除了中国而涵盖了其他几乎所有重要经济体、规模极其庞大的自由贸易区，其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对中国经济来说将是相当大的挑战。

就是否加入 TPP，日本和韩国国内支持与反对的声音都较为强烈，但日本的加入意愿总体来说比韩国更积极。日本之所以希望加入 TPP，主要有如下动因：一是在经济上配合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二是政治经济上制衡中国，三是要分享亚太主导权，四是要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⑪韩国官方在加入 TPP 方面则显得较为迟疑，也没有特别迫切的愿望。一方面，韩国认为它已经和美国、欧盟分别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因此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去参加前景尚不明朗的 TPP 谈判对韩国来说没有太大价值。另一方面，韩国认为中日韩自贸区应该成为向泛亚太自由贸易区发展的起始阶段，而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又是对韩国来说最重要的奠基石。因为中国作为迅速增长的全球大市场和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才是韩国最应该优先考虑的事项。在当下中日韩三国自贸区协定谈判还存在一些阻碍因素的背景下，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朴宰完于 2012 年 9 月 15 日在北京表示，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非常迫切，应该加快签订速度。^⑫另外，韩国认为 2012 年 11 月 20 日东亚领导人会议期间正式启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⑬相较于 TPP 而言，更加适合本地区国家的需要。^⑭

由此可见，中韩具有充分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以加强战略合作，加速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其他各种财政金融合作机制的形成。如果中韩自贸区在一两年内能够达成，则日本将面

临非常大的紧迫感,为了防止韩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享有超过日本企业的优势,避免在东亚合作中丧失核心地位,日本将不得不加速与中韩建立三边自由贸易协定或者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也就是说中韩合作将是一个撬杆,撬动日本加入东亚合作,促使日韩两国在东亚合作与美国所寻求的亚太合作中选择前者。只要中日韩三国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自由贸易区机制,那么即使日韩再加入 TPP 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也会大幅度下降。TPP 进展迟缓或者缺少日韩加入形成的规模制约,将极大影响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政治安全支柱的经济基础,使得其可持续性和有效性大为削弱。

中国在政治安全领域不反对美国和本地区国家既有的军事同盟体系,但是应积极做韩国工作,防止亚洲版“小北约”的形成,以非对抗的方式抵制美国企图扩张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的动作计划;在经济领域加速推进中韩合作,通过首先建立中韩双边自由贸易区和中韩财政金融合作机制,撬动日本深化参与东亚合作的意愿,从而以间接方式化解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给中国乃至东亚区域合作带来的巨大挑战。从上述角度意义而言,中韩加强战略合作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是中国“以柔克刚、着眼长远、寻求共同繁荣”的战略表现。

结论:中国应将加强中韩战略合作作为区域合作的突破点

总体来看,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从政治安全与经济两个方面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压力和挑战,中国必须加以妥善应对,但是又应该努力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大局,这也是对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考验。在这个过程中,全面加强中韩战略合作具有全局性意义,可以成为“四两拨千斤”的典型案例。中韩之间存在巨大的共同经济与安全利益,相互间没有根本性的政治安全冲突,双方之间的政策和战略目标具有高度重叠性,具体的分歧也属于可控和可协调范围,这就为中韩加强与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提供了非常稳定的基础。只要日本政府能够理性思考,中韩加强战略合作将使日本出于自身长远安全与经济利益的考虑,对中日韩三边合作和东亚合作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中韩全面战略合作将使得美国重返亚太的政治安全支柱里构建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作为其亚太同盟体系核心的企图面临阻碍,日韩两国优先选择与中国和东亚方向的合作也会使美国通过 TPP 掌控亚太区域合作主导权的愿望落空,中国近几年来面临的周边安全与区域合作的严峻形势将会有明显改善。为此,中国需要将全面深化加强中韩战略合作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区域合作的重点。

从长远看,中国在东亚和亚太区域合作上可以实行“两步走”战略,首先以中韩合作为撬杆,推动建立中日韩三边合作实体,以其作为东亚合作的核心。三国通过经济一体化进程,包括产业的垂直和水平分工的深化、各种财政金融合作机制的建立,各自比较优势都将得到提升。其次,在此基础之上,再以 TPP 的所谓高端标准构建亚太区域合作机制则更为可行。必须指出,这是这三个邻近国家密切的经济、文化和人文交流的合理发展要求,也是其自然的结果,而并非有意去排斥美国。美国则必须在亚太地区采取更为明智的战略,而不是到处煽风点火,拨弄是非,以求遏制中国,否则该地区将面临碎片化的风险,稳定也就受到威胁。如果上述两点(最优方案)都不能实现,中国则应该加强与韩国的合作(次优方案),以中韩作为未来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将日本边缘化,并进而让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找不到经济基点,最终归于徒劳。

备注:本文为复旦大学“985 工程”三期整体推进社会学科研究项目“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跨区域合作:中国对外战略选择与国家建设转型”(2011RWSKYB00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 释:

- ①用 google 中文搜索引擎搜索“美国重返亚太”一词,得出的结果数量为约 360 万条。
- ②本文之所以使用“中韩全面战略合作”一词主要是因为 2008 年中韩两国将“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本文讨论的中韩战略合作主要在政治安全和经济合作两个方面。
- ③王英英:《论东亚区域合作中的美国因素和主导权问题》,《亚太经济》,2012 年第 3 期。
- ④《日韩决定不再续签扩大货币互换规模协定》,2012 年 10 月 9 日,中国经济网,http://intl.ce.cn/specials/zxxx/201210/09/t20121009_23738013.shtml。
- ⑤《中韩举行第五次战略对话》,2012 年 11 月 28 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11/28/c_124014767.htm。
- ⑥江瑞平:《中日韩经济合作:动因、态势与影响》,《外交评论》,2012 年第 5 期。
- ⑦香港文汇报:《今年中国对韩投资将高达 5 万亿韩元》,2011 年 10 月 9 日,<http://news.wenweipo.com/2011/10/09/IN1110090099.htm>。
- ⑧金明玉、王桂敏:《中日韩比较优势模式的变化特征及其启示》,《东北亚论坛》,2011 年第 2 期。
- ⑨《日本经产相称将尽早与美国展开 TPP 商谈》,2012 年 12 月 27 日,亚太外汇网,<http://www.ytwhw.com/cn/2012/1227/168018.html>。
- ⑩《中日韩启动自贸区谈判》,2012 年 11 月 21 日,文汇报,<http://global.whb.cn/recommended/view/25647>。
- ⑪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东京发表演讲》,2009 年 11 月 14 日,<http://www.whitehouse.gov/files/documents/2009/november/president-obama-remarks-suntory-hall-chinese.pdf>。
- ⑫Hillary Rodham Clinton, “Inaugural Richard C. Holbrooke Lecture on a Broad Vis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January 14, 2011; Hillary Rodham Clinton, “America’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Honolulu, Hawaii, October 28, 2010.
- ⑬任卫东:《美国重返亚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 年 12 月 26 日。
- ⑭张慧玉:《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发展及其影响》,《太平洋学报》,2012 年第 2 期。
- ⑮《社科院报告: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效应已初步显现》,2012 年 12 月 26 日,中新网。
- ⑯金鸿:《东亚博弈,韩国不宜与美日绑太紧》,《求知》,2011 年第 3 期。
- ⑰牛珺珺:《韩日军事协定难产,美国重返亚太受阻》,2012 年 7 月 3 日,财讯网。
- ⑱王晓波:《冷战后美日韩联盟体系与中国》,《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 期。
- ⑲吴太行、周永生:《野田内阁关于日本参加 TPP 谈判的政略》,《日本学刊》,2012 年第 4 期;廉德瑰:《日本在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的战略选择》,《东北亚学刊》,2012 年第 1 期。
- ⑳丁栋:《韩国经济官员:中韩将加快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中新社北京 9 月 15 日电。
- ㉑中国商务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新闻发布,2012 年 11 月 21 日,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ftanews/201211/11202_1.html。
- ㉒2012 年 12 月 27 日韩国国立外交研究院代表团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进行交流对话时的观点。

(查晓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贺平)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析论

朴昭姬

内容提要 在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各国纷纷通过成立贸易振兴机构的方式来推进国际贸易与投资。“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作为韩国政府成立的专门对外经济机构，通过积极推动本国出口、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等方式，为韩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 贸易振兴机构(TPO) 韩国对外贸易政策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政府纷纷把建立“贸易振兴机构”(TPO)作为本国参与世界经济的政策选项。各国的贸易振兴机构虽然在组织设置、人员数量以及具体运作上区别很大，但目的均是为了振兴本国出口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参见表1)。

表1 亚洲贸易促进论坛(Asian Trade Promotion Forum)成员国

国家/地区名	贸易振兴机构名	设立年份
澳大利亚	Australian Trade Commission (AUSTRADE)	1985
孟加拉国	Export Promotion Bureau (EPB)	1972
文莱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Primary Resources (MIPR)	1989
柬埔寨	Cambodia Trade Promotion Department (TPD)	2008
中国大陆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CPIT)	1952
中国台湾	Taipei World Trade Center (TWTC)	1970
中国香港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HKTDC)	1966
印度	India Trade Promotion Organization (ITPO)	1977
印尼	Direktorat General of National Export Development, Ministry of Trade of Republic of Indonesia (DGNE)	1971
日本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JETRO)	1951
韩国	Korea Trade-Investment Promotion Agency (KOTRA)	1962
老挝	Trade and Product Promotion Department (TPPD)	-
中国澳门	Macao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motion Institute (IPIM)	1994
马来西亚	Malaysia External Trad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MATRADE)	1993
蒙古	Mongolian 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MNCCI)	1960
尼泊尔	Federation of Nepal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FNCCI)	1965
新西兰	New Zealand Trade and Enterprise (NZTE)	1988
巴基斯坦	Trade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Pakistan (TDAP)	2006
菲律宾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Expositions and Missions (CITEM)	1983
新加坡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Singapore (IE Singapore)	1983
斯里兰卡	Sri Lanka Export Development Board (SLEDB)	1979
泰国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romotion (DITP)	1952
越南	Vietnam Trade Promotion Agency (VIETRADE)	2000

资料来源：亚洲贸易促进论坛(ATPF)官方网站(<http://www.atpf.org/>)。

1962 年,朴正熙政府宣布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韩国开始转为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随着《第 1059 号大韩贸易振兴公社法》的颁布,“大韩贸易振兴公社”(Korea Trade-Investment Promotion Agency, 以下简称 KOTRA)于同年 6 月正式成立。^①

一、KOTRA 的基本职能及其特点

各国官方或半官方的 TPO 尽管并未直接参与工厂建设、产品研发及提供优惠信贷等事务,但对连接政府和企业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具体职能可以分为商品和市场服务、贸易信息服务、支持服务以及海外活动等。^②在开展出口振兴业务时,TPO 首先对本国商品和海外市场进行基础分析,建立开拓海外市场的战略性计划;然后通过举办国内展览会、出口商会议以及参加海外展览会等形式,推进出国商品的宣传与营销。此外,TPO 还负责收集海外信息,并写成报告提交本国政府。除上述的几个基本职能外,随着科技、信息等技术的发展,目前 TPO 还新增了与网络系统、产权保护等有关的新功能。值得一提的是,各国的 TPO 工作常常带有鲜明的本国特色。例如,韩国的 KOTRA 拥有进修学院,具有进行“国际商务专家培训”的教育功能;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具有推广国家形象(如“Cool Japan”)的功能,包括宣传饮食、服装、娱乐等特色文化;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AUSTRADE)同时还负责澳大利亚留学和吸引外国留学生的工作。^③

与其他国家的类似机构相比,KOTRA 在覆盖范围、机构设置等方面有着诸多与众不同之处。从覆盖范围看,KOTRA 在韩国国内拥有总公司和一个机场办事处,在海外 79 个国家设有 9 个地区分部和 114 个韩国海外贸易馆(Korea Business Center,简称 KBC);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 55 个国家设有 73 个办事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CPIT)的覆盖范围更少,加上香港、澳门代表处也只有 16 个驻外代表处。从机构设置层面来看,KOTRA 在国内仅设有总公司和机场办事处,没有一家国内贸易馆;^④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在本国设有 5 个本部和 13 个办事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日本拥有两个本部和 1 个经济研究所以及 36 个办事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大陆地区拥有 50 个地方分会;台湾的台北世界贸易中心(TAITRA)也包括一个台北本部与 4 个岛内办事处。在工作重点方面,KOTRA 注重建立海外贸易网络,强调本土化和海外支持;与此相反,受国际环境的影响,日本贸易振兴机构长期以来从事进口振兴工作,^⑤直到 2002 年以后这一方向才出现转变。^⑥另据统计,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员工数为 1545 名;KOTRA 的人员总数为 690 名,只是前者的一半。虽然如此,KOTRA 凭借丰富的海外网络,仍创造出胜人一筹的工作效率(见表 2)。

表 2 韩中日三国贸易振兴机构的比较

国家名	机构英文名	设立年份	机构性质	职员人数	资金来源
韩国	Korea Trade-Investment Promotion Agency (KOTRA)	1962	知识经济部所属机构	690	政府
日本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JETRO)	1958	经济产业省所属独立行政法人	1545	政府
中国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CPIT)	1952	政府机构	400	政府

资料来源:参考各机构官方网站的信息整理而成。

二、KOTRA 作用的历史沿革

总体而言,KOTRA 作为知识经济部下属的半官方机构,自成立之初就在韩国政府的对外贸易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⑦具体而言,KOTRA 通过在海外开展市场调查,搜集当地最新信息,并以调查为基础,评估该国的整体经济形势以及与韩国的贸易趋势,为韩国的外贸政策提供信息支持。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KOTRA 的作用又存在较大的区别。韩国学者Jong-Chul Park 在《韩国的发展战略》一书中,把韩国的产业化分为“农地改革”、50 年代的“进口代替型战略”、60 年代的“出口导向型战略”、70 年代的“重化学工业化”等几个时间段。^⑧自韩国“出口导向型战略”以后,KOTRA 开始根据国家战略需要不断调整自身功能。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军方精英开始执掌国家权力。军人政权通过改革国家机构、提供贷款等方式加强对社会经济方面的控制。在新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国家精英与出口商形成了紧密的伙伴关系,韩国经济政策也随之从进口替代战略转换为出口导向型战略。^⑨作为支持韩国企业出口的贸易振兴机构,KOTRA 也在这一时期成立。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大企业在重化学工业化方面形成过度竞争,财阀之间出现分裂现象。当时,大部分财阀没有选择通过组建联合会的方式来实现利益诉求,而在企业层次寻求与官僚或相应负责机构建立关系网络来维护自身权益。因此国家得以继续在决策过程中占据优势,并与财阀大企业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⑩Parvez Hasan 指出:20 世纪 70 年代,韩国私营企业在高度集权化的政府指导下运行,韩国政府在实际经济决策中不仅是参与者,而且发挥了决定性作用。^⑪韩国高丽大学教授 Jang-Jip Choi 主张:从政策形成的层面看,韩国经济开发计划为私营企业提供了详细的指令性规划(indicative planning);从政策执行层面看,韩国经济开发计划具有国家直接介入个别企业活动的指令性经济的性质。^⑫这一时期,为增加重化学工业的海外投资,KOTRA 展开了相应的出口振兴活动,比如:设立出口信息中心、海外巡回营销、促进重化工成套设备出口等。与此同时,KOTRA 还在引入海外资本、促进韩国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方面,由于重化学工业化顺利进行,大型出口企业与外资的影响力与活动能力大大增加;另一方面,随着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的蔓延,韩国政府不断调整国家对经济方面的介入程度,提高市场经济机制的基础作用。在新的市场环境下,三星、LG 等大企业获得高速发展。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开始关注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提出中小企业的国际化战略。KOTRA 开始向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出口振兴支持业务方向发展,陆续提出“中小企业出口成交支持”、“有发展前途的出口商品发掘支持”和“海外贸易馆(KBC)的中小企业支社化事业”等三项具体工作。90 年代中期以后,为协助韩国政府吸引外资和克服外汇危机,KOTRA 开始将振兴国际投资和支持技术产业合作项目作为新任务,公社也于 1995 年更名为“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

进入 21 世纪以来,韩国对外贸易政策再次发生转变。韩国政府提出建立“复合通商国家型”体系,即改变原先以制造业为主的出口结构,实现韩国出口产业领域的多元化。^⑬在新的政策指引下,KOTRA 正在着力提高服务产业的出口竞争力,分别于 2003 年和 2005 年开通了双向互联网门户网站“Invest KOREA”和“Buy Korea”。在 2010 年的“韩国贸易日”活动中,韩国知识经济部按照 KOTRA 的调研报告,发布了未来韩国贸易政策的主要方向:推动服务业向 7 个新兴市场的出口;加强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力量;继续完善贸易基础设施。^⑭根据 KO-

TRA 的计划,在中国的“韩国贸易馆(KBC)”数量将增加为现在的 2 倍,并继续加强共同物流中心、招商引资机构等贸易基础设施建设。KOTRA 前任社长 Hwan-Ik Cho 进一步提出,有必要构建“以能够对抗经济危机并易于化解危机为特点的韩国经济体质”,促进 KOTRA 与韩国中小企业振兴公团开展合作,支持韩国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进程。^⑯2012 年,KOTRA 现任社长 Young-Hwan Oh 对 KOTRA 进行组织调整,设立专门的“中小企业支持本部”以满足中小企业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⑰

由此可见,KOTRA 在韩国对外贸易的决策和运作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关于 KOTRA 的优劣分析

如上所述,KOTRA 在开展国际业务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当前,KOTRA 的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开展“支社化事业”。所谓支社化事业,是指 KOTRA 的海外韩国贸易馆(KBC)受某企业的委托,以类似该企业海外支社或者办事处的形式从事海外业务。一般认为,企业设立独立海外运营支社的成本约为每年 2 至 3 亿韩元,而参加 KOTRA 的支社化事业每年只需支付 260 万韩币。^⑯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资金和海外经验较为缺乏,所以 KOTRA 的支社化事业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实质性帮助。据统计,2010 年有超过 2000 家韩国企业参与 KOTRA 的海外支社化事业,其中大半部分是中小企业或风险企业。

第二,从事招商引资工作。自 1998 年正式开展招商引资活动以来,KOTRA 吸引的外资已占到外商对韩直接投资的 50%。^⑰2010 年 5 月,KOTRA 先后在首尔和上海成立名为“China Desk”的专门组织,旨在通过与中国的主要城市、金融机构以及潜在投资者的联网,扩大中国对韩直接投资。China Desk 成立的头三个月,就成功引入 3 个大型绿地(Greenfield)投资项目,总价值接近 1.5 亿美元。^⑱KOTRA 通过信息化体系可以与顾客实现双向实时沟通,为客户提供电子结算等便捷服务。截止到 2010 年 10 月,KOTRA 已成功引入总价值达 18 亿 4500 万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⑲

第三,承担政府工程。在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期间,KOTRA 负责韩国馆的运营工作,上海海外贸易馆(上海 KBC)则以世博会为契机开展“2010 年韩国在华信息通讯技术路演”(Korea ICT Road Show China2010)活动,推进了信息技术领域的韩流营销。这一路演活动的洽谈件数为 1103 件,洽谈额达到 1.5 亿美元,成交金额为 4100 万美元。^⑳

第四,提供出口支持。一方面,KOTRA 按照技术、品质、财务健全度、市场性等标准选定优秀中小企业,给予其“KOTRA 保证”这一认证品牌。另一方面,为减少汇率波动、物流费用上升等成本压力,KOTRA 将“海外共同物流中心”从 12 个增加到 14 个,^㉑从而有效地降低了韩国中小出口企业的经济负担。

尽管 KOTRA 在上述领域为韩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外市场的开拓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其在机构设置、职能运行等方面仍存在着若干有待改进之处。

首先,韩国官方机构的海外派驻人员任职周期普遍较短。KOTRA 职员一般首先在总部工作 2 年,然后被分派至海外贸易馆工作 3-4 年,再返回总部工作。短短 3-4 年的工作时间不足以全面掌握和理解东道国的语言文化,因此难以有效把握当地的社情、民情,影响了

KOTRA 职员的工作连贯性和专业性。

其次,韩国企业特有的“以成果为中心”的评价方式以及企业文化是一把双刃剑。KOTRA 按照年薪制与奖金制结合的方式运作,对职员进行绩效评价时集中于定量的成果指标。这种评价体系虽然有助于激发职员的工作热情,但是也容易将 KOTRA 的工作重点集中在大型项目上,因为大型项目容易取得明显的成果,从而使那些中小企业的项目有可能遭到忽视。

再次,与其他国家的 TPO 相比,KOTRA 在韩国对外贸易活动中的职能定位不够明晰。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专门负责为出口企业提供培训教育、营销支持、信息提供等相关的志愿活动。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则通过与日本国内有关政府机构的合作,共同运营海外办事处,扮演起维护日本海外利益的代理人角色。^②而在韩国的机构设置中,KOTRA 不是唯一具有出口支持功能的单位,所以常常会与韩国农水产物流通公社等其它机构之间发生业务重叠甚至竞争,降低了运营的效率。

最后,KOTRA 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KOTRA 虽然只是半官方组织,但在经费方面完全依赖于韩国政府,因此无法在资金方面为中小出口企业提供大力支持。^③不过,2011 年 KOTRA 与中小企业振兴公团联合推出一项总值 800 亿韩元的“中小企业出口金融”项目:任何一家参与 KOTRA 支社化事业的企业,如果能够取得海外韩国贸易馆馆长的推荐,都可以获得“中小企业出口金融”的补助。^④今后,KOTRA 还将通过与其他有关机构的合作,进一步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

四、结语

KOTRA 作为促进韩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主要机构,长期以来在以出口导向的韩国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KOTRA 根据不同时期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自身职能设置和业务范围。进入新世纪以后,KOTRA 把工作中心放在新兴市场、中小企业以及服务产业方面,在提升韩国国家形象、搭建韩商网络平台、培养绿色成长型产业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但韩国贸易总值依然在 2011 年和 2012 年连续突破 1 万亿美元,贸易的总体规模排在世界第 7 位。其中,集专业性和丰富经验于一身的 KOTRA 自然功不可没。

对于 KOTRA 今后的完善与发展,本文提出以下个建议:

首先,加快培养“地区专家”,满足顾客专业化和多样化的需求。KOTRA 可参考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工作周期制,后者的职员在日本国内工作 5 年以后,赴东道国进修 1 年当地语言,然后回到日本总公司工作 10 年,最后再派到东道国工作。尽管 KOTRA 没有必要照搬日本同行的长期工作制,但由于 KOTRA 的主要工作集中在海外,所以应尽快改变海外工作时间较短的不利情况,通过增加培养项目等方式延长任职周期,培养出达到专业需求的“地区专家”。

其次,强化软硬件建设。在硬件层面,应继续加强“顾客的声音(VOC)”等 KOTRA 与顾客沟通的现有渠道,同时拓展其他可以反映顾客实际需求的有效途径。在软件层面,由于 KOTRA 职员数量相对较少,KOTRA 有必要强化提高成员创新能力和领导力的培训教育,促进职员个体素质的提升。

最后,积极协助外国投资者解决劳资问题。长期以来,劳资问题是韩国招商引资面临的

主要障碍,尤其对于外国投资企业而言,陌生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成为在韩投资的主要困难。因此,KOTRA不仅要积极引入外商投资,还应在处理劳资关系等日常经营问题上提供更多的支持。

总之,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环境中,KOTRA必须根据国家需要,适应环境变化,才能继续生存与发展。今后,KOTRA只有把握机遇,加快改革,才能继续成为国际领先的贸易振兴机构,也才能继续推动韩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注 释:

①Ji-Jeung Yoon:《关于出口振兴与贸易振兴公社作用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建国大学行政学院,1972年,第9—21页。

②Camilo Jaramillo, “The Basic Functions of National Trade Promotion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Trade Forum*, Issue 3, Jul—Sep.1992, p.18; Daniele Giovannucci, “National Trade Promotion Organizations: Their Role and Functions,” The World Bank.

③参见韩国KOTRA网站(<http://www.kotra.or.kr>)、日本JETRO网站(<http://www.jetro.go.jp/en/trends/>)、澳大利亚AUSTRADE网站(<http://www.austrade.gov.au/>)。

④2008年,李明博政府推行“业务窗口单一化”改革,由KOTRA全面负责中小企业的海外市场支持。从2008年6月1日起,KOTRA的国内贸易馆都被关闭。参见KOTRA支社化事业物流组:《中小企业振兴工团类似功能的改组与合并推进情况》,KOTRA,2008年。

⑤Min-Kyung Gu:《关于中小企业出口振兴组织的研究——以KOTRA与JETRO的比较分析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高丽大学政策学院,2007年。

⑥Myeon-Jin Chae、Hye-Jin Seon:《关于JETRO的海外PR活动的研究》,《日本近代学研究》,2007年第18集,第187—201页;新韩综合研究所:《JETRO的出口振兴活动及其启示》,新韩综合研究所,1992年,第79—83页。

⑦韩国知识经济部官方网站,<http://www.mke.go.kr>。

⑧Jong-Chul Park:《韩国的发展战略》,韩国学术情报(株),2008年;Byeon-Soo Park、Gi-cheon Kang:《反思韩国通商政策》,三星经济研究所,2006年。

⑨重化学工业推进委员会规划团:《关于韩国工业化发展的调研3:决策过程的幕后历史》,1979年。

⑩同上,第137页。

⑪Parves Hasan, *Korea: Problems and Issues in a Rapidly Growing Econom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 p.29.

⑫Jang-Jip Choi, *Interest Conflict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South Korea: A Study of The Labor Union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1961—1980*,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3, pp.329—330.

⑬知识经济部:《第47届韩国贸易日报道资料》,韩国知识经济部,2010年11月29日;《今年贸易顺差》,Newsis,2010年11月30日电,<http://news.naver.com/main/read.nhn?mode=LSD&mid=sec&sid1=101&oid=003&aid=0003563822>。

⑭韩国三星经济研究所Tae-Hwan Lee在题为《韩国出口的善战原因与启示》的研究报告中指出,2008年虽然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但是2009年韩国实际出口额与前年对比有所增加的原因在于韩国成功地抢占了高成长性的新兴市场。他认为韩国应继续强化对新兴国家的出口。Tae-Hwan Lee:《韩国出口的善战原因与启示》,三星经济研究所《经济焦点》,第295号,2010年;《2011年经济政策方向》,企划财政部官房网站,http://www.mosf.go.kr/_policy/policy09/policy2010/12_111/201012172.jsp;Jin-Woo Kim、Jeong-Hyuk Kim等:《关于服务产业发展的企业和政府的课题》,三星经济研究所,2009年5月27日。

⑮《第24回新年新计划:采访KOTRA社长Hwan-Ik Cho》,ET新闻,2011年2月14日电,<http://www.etnews.co.kr/201102140043>;《KOTRA—中小企业振兴公团,帮助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进入国际市场》,

电子时报,2011年2月15日电,http://www.dt.co.kr/contents.html?article_no=2011021502019932614002。

⑯《KOTRA社长Young-Hwan Oh表示,为了顾客,KOTRA将坚持革新》,亚洲经济,2012年4月1日电,<http://www.asiae.co.kr/news/view.htm?idxno=2012040110235840788>。

⑰KOTRA:《KOTRA顾客满意经营案例集》,KOTRA,2008年12月,第20-45页。

⑱Yan Manman, “South Korea Welcoming More Investment from China,” *China’s Foreign Trade*, February, 2009, pp.30-31.

⑲这三个项目分别是:Sam-il重工业(1亿美元)、Bakwoo集团(2000万美元)、Bogang集团(1500万美元)。

⑳上海KBC:《上海KBC10月工作报告》,KOTRA,2010年10月,第19页。

㉑KOTRA中国地区本部:《KOTRA中国地区工作报告》,KOTRA,2010年10月;KOTRA品牌事业组:《上海世博会国家形象提高效应以及经济价值》,KOTRA,2010年10月29日;KOTRA中国通商战略研究中心:《200%利用上海世博会的我国企业》,KOTRA,2010年10月;上海KBC:《上海世博会韩国馆闭幕报告》,KOTRA,2010年11月。

㉒KOTRA中国地区本部:《KOTRA中国地区工作报告》。

㉓唐杰英:《日本企业开展海外事业的特征及对华业务的新动向》,《亚太经济》,2007年第6期,第36-40页。

㉔KOTRA企划预算组:《公社经营效率化推进案》,KOTRA,2008年12月31日。

㉕《KOTRA-中小企业振兴公团,帮助中小企业的国际化进入国际市场》。

(朴昭姬: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浩川)

东亚跨区域双边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国内动因

郭 佳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以来,东亚的经济区域合作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至今仍然没有发展出一个成熟稳定的区域制度框架。进入 21 世纪以来,东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迅速发展,其中又以跨区域的贸易协议居多。同时,东亚内部大国之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区建设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整体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东亚各国为何更倾向于签订跨区域双边协议,而非多边协议?除了外部环境变化冲击以及全球范围内多边贸易体制发展缓慢的影响之外,东亚各国国家内部因素的影响也十分重要。

关键词 东亚 贸易合作 跨区域 双边自由贸易区

一、东亚地区的双边自由贸易区潮流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利益相互交织程度日趋加深,区域合作不断推进。在东亚地区,区域合作设想最早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但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进程已经明显地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西欧和北美地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东亚各国痛切地意识到加强区域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已有的区域合作框架亚太经合组织(APEC)毕竟是一个非制度化的合作框架,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东亚地区开始从包括区域、次区域和双边等多个层次探索合作的模式和路径。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东亚双边自由贸易区(FTA)发展迅速,东亚各国寻求通过双边 FTA 形成区域及跨区域网络,加深区域贸易合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这一“亚太政治经济最重要的新发展”^①是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发展缓慢、双边 FTA 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同时双边 FTA 这种合作模式的特点也契合了东亚地区的特殊现实。^②

与欧美先发展区域内一体化、再拓展到区域外的传统路径不同,东亚各国在一体化的对象选择方面,从一开始就是区域内与区域外并重,甚至更重视与区域外国家的谈判。跨区域的双边 FTA 被普遍纳入东亚主要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并被提升到与多边贸易目标同等重要甚至更加优先的地位(表 1)。

目前,除东盟自由贸易协定(AFTA)和亚太贸易协定(APTA)外,东亚各国和地区已缔结或达成协议的双边 FTA 达 60 多个。以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为例,从签署的协定来看,各国已经实施或缔结的 FTA,大多是两国间或一个国家与一个区域合作组织间的双边 FTA。其中,中国已经签署或实施的 9 个 FTA 中有 5 个跨区域 FTA;而日本的 13 个 FTA 中有 5 个跨区域双边 FTA;韩国的 8 个双边 FTA 中有 6 个跨区域双边 FTA;新加坡的跨区域 FTA 的发展处于领先地位,在其 14 个双边 FTA 中,有 10 个是跨区域双边 FTA。

可见,东亚国家在进入 21 世纪后,积极寻求签订各种双边 FTA,其中又以地域分散型

表 1 部分东亚国家的 FTA 概况(截至 2012 年 11 月)

	区域内		跨区域		总数
	对象	总数	对象	总数	
中国(大陆地区)	香港(2004) 澳门(2004) 东盟(2005) 新加坡(2008)	4	智利(2006) 巴基斯坦(2007) 新西兰(2008) 秘鲁(2010) 哥斯达黎加(2010)	5	9
日本 ^③	新加坡(2002) 马来西亚(2006) 泰国(2007) 印度尼西亚(2008) 文莱(2008) 菲律宾(2008) 东盟(2008) 越南(2009)	8	墨西哥(2005) 智利(2007) 瑞士(2009) 印度(2010) 秘鲁(2012)	5	13
韩国	新加坡(2006) 东盟(2007)	2	智利(2004) EFTA(2006) 美国(2007) 印度(2010) 秘鲁(2010) 欧盟(2010)	6	8
新加坡 ^④	日本(2002) 韩国(2006) 中国(2008)	3	新西兰(2001) 澳大利亚(2003) EFTA(2003) 美国(2004) 印度(2005) 约旦(2005) 巴拿马(2006) 跨太平洋 SEP(2006) GCC(2008) 秘鲁(2009) 哥斯达黎加(2010)	11	14

资料来源：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站,<http://fta.mofcom.gov.cn>；日本外务省网站,<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fta>；韩国 FTA 官方网站,<http://www.fta.go.kr/usr/intro.asp>；新加坡 FTA 网站,<http://www.fta.gov.sg>。

(或远距离型)的协议居多。这反映了大多数东亚国家对覆盖面较窄、适用范围适中的贸易协定的偏好,与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奉行全面的自由贸易政策,积极追求签订宽范围、广覆盖的贸易协定,囊括电信服务、金融服务、文化产业等各个行业。此外,美国签署的 FTA

还通常包括知识产权、劳动和环境标准等超越世界贸易组织范围的条款。在协议的强度方面,美国寻求较具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而大多数东亚国家更倾向于没有明确义务与争议解决的协定。

与东亚各国迅速发展的跨区域双边 FTA 相对应,东亚各大国之间的双边 FTA 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整体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如中日韩均与东盟签署了 FTA,但中日韩之间却没有签署任何 FTA。这种在 FTA 伙伴的选择上舍近求远的现象及趋势,必将对东亚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贸易格局以及各国的贸易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其动机的探究因而具有重要意义。维诺德·阿加沃尔等学者在 2010 年出版的论文集《亚太地区的贸易政策:理念、利益和国内机制的作用》^⑤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提出了独到的分析框架,本文将简要介绍这一框架的内容并检视其不足。

二、对于东亚 FTA 双边偏好的原因分析

目前全球范围内区域及双边协定迅速繁衍而世界多边自由化进程受阻的现实,与经济学上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关税同盟理论、自由贸易区理论等)相背离,FTA 相关理论的出现较好地解释了传统理论不能解释的现实,例如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E. Baldwin)的“地区主义的多米诺理论”(domino theory of regionalism)解释了 20 世纪末世界经济区域化的浪潮;“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理论(大国小国收益理论、轮轴—辐条理论、非传统收益理论等)不再局限于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分析,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政治、经济、安全等诸多领域,引入了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观点,从不同角度解释了跨区域 FTA 现象。尤其是非合作博弈理论及集体行动成本说对双边 FTA 成为区域合作主流的现象作了较为合理的解释。^⑥而国际关系学上,也有不少学者从相互依存、国际制度等角度探究双边 FTA 快速繁衍的原因。

具体到东亚地区来看,FTA 相关理论的解释力仍存在若干盲点,如“多米诺理论”指出,一国组建或参加 FTA,主要受到两股势力或压力的影响:一是来自国内政治利益集团的政策诉求;一是来自贸易伙伴国同其他国家建立 FTA 形成的国外压力。问题在于,面对外部刺激或冲击,国内政治因素如何与外部因素互动而作用于经济贸易政策的转变。国内机构是否以及如何发挥政治影响来左右贸易政策的制定,而其偏好又是什么?

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以来对东亚经贸发展的分析一般集中于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关注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部署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协定在这一地区所扮演的角色。这一地区国与国之间在贸易协定选择上的差异性并未引起普遍注意。大多数研究往往将不同类型的协定混为一谈,并不区分双边协议、少边协议和多边协议,区域合作与跨区域合作也未做详细描述。总的来说,大量的研究停留在对地区双边和多边 FTA 的关注,或者是对跨区域 FTA 的趋势性描述,分析某一具体跨区域协定动机、影响的研究亦较多,而对东亚各国的跨区域 FTA 的系统研究仍相对缺乏。同时,对于东亚各国贸易战略选择的动机或动因分析多突出国家利益,较少深入国家这一“黑箱子”的内部。

阿加沃尔等学者在其书中则以国家为中心,考察了东亚(中、日、韩、新)与美国不同类型的贸易政策和战略,通过详尽的数据统计、分析、归类,并引入观念、利益和国内机构这三个变量,运用博弈思想,考虑到不同类型的安排,构建出一个系统的框架,将东亚各国的贸易政策变化及其选择的轨迹清晰地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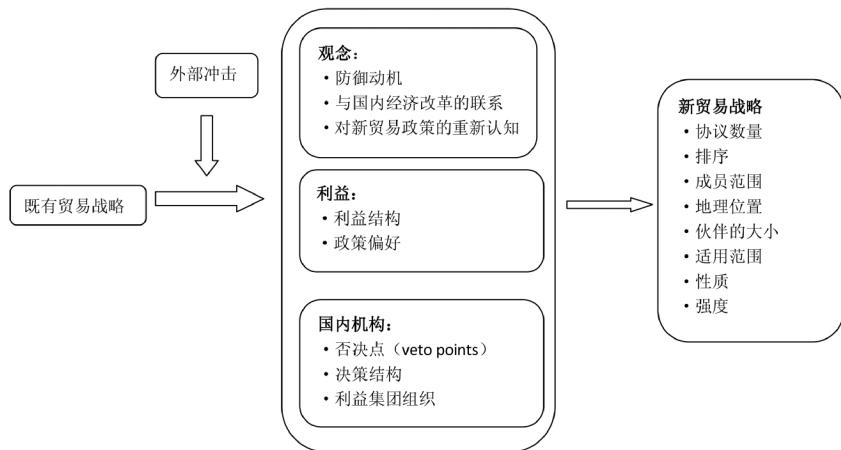


图 1 新的贸易战略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变量

如图 1 所示,当现有贸易战略或政策受到外部压力冲击时,观念、利益与国内机构三个变量相互作用,影响国家对新贸易战略的决策。第一个变量包括观念和思想。主要国内行为者的观念和思想十分重要,因其帮助决策者和其他行为者认知和解释外部变化的性质,这表明选择具体的贸易战略不是对外部变化的自动反应。具体而言,防御动机、与国内经济改革的联系、对新贸易政策的重新认知这三个因素在观念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防御动机(即防止被国际竞争市场排除在外的动机)是一个所有东亚国家都会考虑的共同因素,而后两者的不同影响,导致东亚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同的贸易战略。第二个变量是利益,关键是分析主要行为者在新贸易战略中如何重新配置利益联合,这可以从利益结构与政策偏好两方面来考察。第三个变量涉及与贸易战略有关的国内制度特征。为考察国内机构的跨国家变化,关注的重点在于否决点、决策结构和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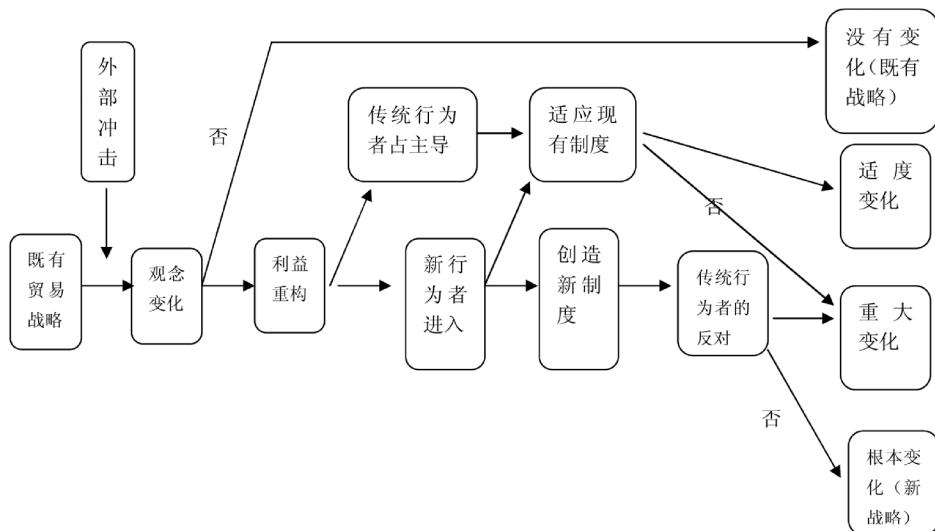


图 2 观念、利益和国内机构的动态相互作用

图 2 则明确展示了三个变量是如何相互作用以影响国家对贸易战略的选择的。当既有贸易战略受到外部冲击时,若国家内居于主导地位、维护既得利益的传统行为者为对新政策的看法未产生新观念或新认知,其他行为者谨慎地配置利益的情况下,不会产生新的贸易战略,这就是第一种“贸易战略特型”(trade strategy constellations),即维持现有框架。

若在受到外部冲击后,国内主要行为者的观念产生了变化(其中政治领导层与官僚系统的支持会起到关键作用),则其将重新审视现有贸易政策与战略,并重新配置利益,修改目前的决策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利益重构通常没有引入新的行为者,或者引入了新的行为者,但他们在现有体制下只能顺从于主要行为者,适应现有政策。此时,变化幅度将是有限的。这即第二种“贸易战略特型”。这个特型下的国家可能成功采取新的双边贸易战略,但也不会完全摆脱传统的多边主义战略。其特点是率先与几个区域合作伙伴签订 FTA,覆盖面有限,且自由化水平较低。

如果新观念出现,利益重新配置,并引入了有能力挑战主要行为者的新行为者,新行为者可以选择在现有决策机制下追求新战略,尽管这会招致传统行为者的反对,这种情况下,国家贸易战略会产生重大变化,这即第三种“贸易战略特型”。这种特型在合作伙伴、地理位置和协议签订顺序方面显示出一种平衡的方式。第三类特型的国家虽然普遍追求较为广泛的综合性 FTA,但有时会把贸易保护主义因素及其他诸多例外情况纳入政策考量,这取决于伙伴国和本国国内的政治形势。

如果新的行为者有能力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和决策结构,尽管其成本高昂,但他们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回旋余地,传统行为者的反对力量在此种情况下也就十分有限,因而,国家的贸易战略会发生根本变化——即第四类贸易战略特型。此类特型中的国家尝试与尽可能多的国家缔结 FTA,不管这一 FTA 是区域性的或是跨地区的。

总之,三个变量、四种特型构成的分析框架将“黑箱子”国家充分打开,剖析了每个影响国家决策的因素,为东亚各国不同的贸易战略的选择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动态分析框架。

按照这一分析框架来看本文所关注的东亚地区,相对于多边 FTA,为何多数国家越来越倾向于签订双边协议,尤其是跨区域的双边 FTA,可以从以下因素得到解释。

1、观念的作用。首先,东亚国家追赶 FTA 潮流,已被普遍地视为是对其他地区的 FTA 迅速扩散的防御性反应。其次,各国普遍认为,FTA 将比多边贸易自由化能够更好地锁定国内经济改革。这一方式在国内较少可能面临激烈的反对,因为通过选择合适的贸易伙伴,决策者可以更为容易地控制经济调整过程。但这种将 FTA 与国内经济改革相结合的观念在东亚各国的接受程度有所不同。再次,对区域和双边 FTA 的重新认识使得东亚国家开始改变完全依赖多边主义的传统想法。

从具体表现来看,以中国为代表的大多数东亚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经济监管机制还不够完善,金融服务不够发达,投资渠道也并不通畅,国家经济治理结构不尽合理,因而在面对完全开放的市场时,挑战与机遇并存,甚至对部分国家来说挑战远大于机遇。但在受到外部压力冲击时,这些国家不可能完全放弃国际或区域合作。出于对被世界市场排斥在外的恐惧(即防御动机),这些国家会主动寻求贸易合作。范围较小或适中、覆盖面较窄的贸易协定一方面可以帮助一国融入国际市场,享受自由贸易带来的福利,另一方面,相对于大规模的多边协议,双边协议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这些国家减少超越其承受能力的条款的制约。

日本自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贸易立国”战略以来就一直是全球自由贸易的最大受惠国

之一。因此,日本多年来扮演着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积极拥护者的角色。1998年10月,日本通产省内部非正式研究小组向时任通产大臣与谢野馨提交了一份题为“促进战略性贸易政策:区域经济协定的定位”的内部报告,论及双边和地区FTA的可能性。有日本学者指出,“这可被视为通产省政策从根本的多边主义向选择性的双边主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大转变。”^⑦作为一个被动反应的国家,日本与东盟迅速缔结FTA就是迫于中国和韩国的压力,表现出日本对其东亚主导地位的维护以及对中国的防范。

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其偏好的FTA的范围和覆盖面介于中美之间。面对国际竞争压力,这些国家一方面积极努力参与大规模的多边贸易合作(这其中不排除政治与安全因素的考虑而被迫加入并不能取得经济优惠的多边协议),一方面也会努力拓展区域内或跨区域的双边合作,以此寻求低成本的贸易合作,同时还能在区域内增强自身实力、提高地位。要说明的是日本和韩国两国的路径选择上仍有分歧,日本通过对其贸易伙伴的更多让步来寻求不对称协议。日本关税消除率范围从87%(日本-墨西哥EPA)到99.9%(日本-文莱EPA),而其他国家通常徘徊在97-100%。^⑧因为相对于贸易自由化,日本更注重加强经济伙伴关系。而追求贸易自由化的韩国则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方式,韩国是少数几个同美国签订FTA的大国之一,这使其不可避免地面临大规模的经济转型。

东亚大多数国家都希冀借力双边FTA实现或推动国内经济改革。即使是在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势均力敌甚至国家力量相对较弱的国家中,国家仍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而一般认为双边FTA谈判将有助于简化、升级及重组经济结构。因而借力双边FTA的国家较为容易削弱国内保护主义的力量,实现国内经济改革。FTA也被日本视为推动国内改革的重要动力。《日本的FTA战略》直接指出,日本在签署FTA过程中,可能伴随着开放国内市场的阵痛,但是这对于提高其产业结构水平非常必要。更典型的例子是新加坡,它认同双边自由贸易与多边自由贸易并不一定冲突,新的贸易战略(FTA)将比现有的贸易战略(多边贸易自由化)能够更好地引导国内经济改革。

2、利益的重构与国内机制。考察东亚各国内外各利益群体(尤其是潜在失败者和潜在得利者)的偏好、行为、利益表达及力量对比为探究贸易政策变化的动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视角。同时,行为者重新配置利益的决策过程即国内机制也是影响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变量因素。东亚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制度的类型,包括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如日本)、新兴民主国家(如韩国)、威权国家(如新加坡)和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和越南)等,关注否决机制、决策结构、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这三个因素是一种可行的替代分析。

就中国而言,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社会利益相对分散,中国政府一直追求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战略区域贸易政策。对于“潜在失败者”即由于贸易自由化而遭受损失或害怕遭受损失的国内群体,中国政府出于同情给予关注,保证潜在受益者与失败者的冲突不至于太激烈而影响贸易政策的推进。日本一直以来对多边主义更感兴趣,也试图加强贸易战略的多元化,以突破其传统的对美依赖。但其国内长达二十年的经济衰退以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东亚金融危机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日本的对外经贸政策在新世纪之初开始转向FTA。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济产业省等传统关键行为者出现了重要的观念变化,要求利益重构,积极推行新的贸易策略。认识到建立一个新机构和决策机制的交易成本高,这些行为体选择通过现有结构实现新利益。同时,保护主义集团有效地阻止了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经济结构调整的贸易战略的根本性变化。韩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也逐渐从多边主义转向区域主义和双边主义,

在这一过程中金大中政府的作用十分重要。金大中政府借力地区主义，积极追求双边 FTA，以克服金融危机并促进国内经济改革。1998 年金大中政府将外交部改组为外交通商部，并增设通商交涉本部长一职，负责韩国贸易谈判和整体的对外经济政策。这种体制的重新安排，推动了韩国政府积极谋求区域内外的双边 FTA。而在国家主导经济的新加坡，面对社会压力政府相对自由，在新加坡的双边和区域贸易政策的制定上，总理及其内阁发挥了关键作用。新加坡力图建成为一个东亚枢纽，实施“全方位”的 FTA 战略。

阿加沃尔的这一框架在解释东亚贸易政策在国别之间的差异性时确有一定的解释力，然而在东亚地区，存在着多样的政治制度类型，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也差异巨大，从发达国家（日本）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四小龙”）到正在起飞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等）再到柬埔寨等相对经济较为滞后的国家。因此，阿加沃尔的这一框架似乎过于简单化，在解释东亚各国为何更倾向于签订跨区域双边协议时存在若干理论提升的空间。

首先，国内关键行为者围绕 FTA 贸易政策选择的利益重构问题，在多数东亚国家都是极为复杂的，最突出地表现在农产品贸易问题所涉及的利益集团对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影响。众所周知，由于本国农产品在生产方面的高成本与低竞争力，以及农产品贸易所涉及的复杂性与政治敏感性，许多国家对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历来心存顾虑，其国内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度一直相对不高，日本韩国表现得尤甚。

在日本，部门主义盛行，各部门之间对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往往存在竞争的关系，往往出于部门利益制定相关政策。贸易谈判通常有四个部门参加，分别是经济产业省、外务省、农林水产省和财务省。经济产业省和外务省一般认为通过 FTA/EPA 与其它国家形成贸易联系是一个必然趋势，经济结构转型的阵痛不可避免。而农林水产省和财务省在 FTA/EPA 缔结过程中相对比较消极，对缔结包括农产品在内的 FTA/EPA 持谨慎态度。同时，农民是日本国内的重要利益集团，政党为获得支持率以取悦农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FTA 政策的选择。总之，日本各部门之间的相互竞争和缺乏协调，特别是农业利益团体的利益冲突，严重阻碍了日本政府形成有效的贸易政策。

其次，在东亚地区，除了协议数量、地理位置、伙伴国大小、协议适用范围等因素之外，许多东亚国家双边关系中存在的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对各国 FTA 合作对象的选择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东亚大多数国家都曾遭受日本的侵略，而日本一些政治家坚持错误的历史观以及日本长期以来对自身脱亚入欧的身份定位及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都引起许多东亚国家的警惕、担忧乃至反感。此外，领土争端问题在大多数东亚国家之间都存在，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国家领土争端日益公开和激烈，甚至引发军事对峙，这都使东亚地区的区域内合作蕴含着不稳定的因素，而跨区域的 FTA 往往能避开这些敏感问题而更容易达成一致。

三、结语

观念、利益、机制三大变量是影响东亚地区跨区域双边 FTA 政策选择的国内动因。东亚国家追赶 FTA 潮流，除了防御性的反应之外，各国普遍认为，FTA 将比多边贸易自由化能够更好地促进国内经济改革。尽管东亚各体制、国情差异颇大，但各国内外各利益群体的偏好、行为、利益表达以及行为者重新配置利益的决策过程——即国内机制均是影响本国 FTA 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基于东亚地区特殊的历史和领土问题的背景，跨区域的双边

FTA 在政治和外交意义上更为可行。跨区域双边 FTA 在东亚的发展必将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及其进程带来复杂而深远的影响。东亚自由贸易区能否早日建成、东亚一体化能否顺利实现,需要各国站在地区利益的高度,从大局出发,使各自的双边 FTA 战略朝向有利于东亚自由贸易区实现的方向发展。

注 释:

- ①Christopher M. Dent, “Networking the Region? The Emergence and Impact of Asia—Pacific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 Project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1, 2003, pp. 1–28.
- ②孙玉红:《东亚国家跨区域双边 FTA 的多样化动机分析》,《东北亚论坛》,2011 年第 5 期,第 32 页。
- ③根据日本政府的定义,FTA 是指特定国家或区域间以削减或撤销商品关税或服务贸易壁垒为目的的协定;EPA 则是指特定的两国或数国之间,以促进域内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撤废边界及国内规制、调整各国经济制度、强化广泛的经济联系为目的的协议。因此日本的 EPA 比传统意义上的 FTA 涉及更为广泛的议题范围,本文集中讨论 FTA 战略,不对二者作区分探讨。
- ④此处主要考察作为国家行为体的新加坡的 FTA 战略,因此未将东盟作为一个集团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FTA 列入其中。
- ⑤Vinod K. Aggarwal and Seungjoo Lee, eds., *Trade Policy in the Asia-Pacific——The Role of Ideas, Interests, and Domestic Institutions*, New York: Springer, 2010.
- ⑥孙玉红:《论全球 FTA 网络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87 页。
- ⑦Tatsushi Ogita, “Japan as a Late-coming FTA Holder: Trade Policy Change for the Asian Orientation?”, in Jiro Okamoto, ed., *Whither Free Trade Agreements?* IDE/JETRO, 2003, p.221. 转引自李俊久:《日本 FTA 战略论析》,《当代亚太》,2009 年第 2 期,第 111–113 页。
- ⑧Vinod K. Aggarwal and Seungjoo Lee, eds., *Trade Policy in the Asia-Pacific——The Role of Ideas, Interests, and Domestic Institutions*, p.13.

(郭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魏全平)

“兴亚论”与“东亚共同体理论”的源流分析

张 燐

内容提要 “兴亚论”是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典型产物，也引发了“东亚共同体”的理念。本文通过梳理“兴亚论”以及“东亚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源流，结合文化人类学的共同体理论发现，在主张跨地域的共同体时，似乎总是存在着一对内涵的矛盾因素，即普遍性的地缘政治利益指向、经济利益指向与文化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在东亚地域，尽管文化上有着很多的共通要素，但这对矛盾是无法解消的，甚至还会因为政治、外交、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使得矛盾对立更加复杂化。因此，事实上“共同体理论”往往带有理想化的因素，认识并理解这对矛盾才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 兴亚论 东亚文化 共同体理论 跨文化

“东亚”这一概念，最早是用来说明文化历史的一个地理概念。日本考古学家滨田耕作（1881—1938）认为“东亚”是以支那为中心，与其东方相接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因“天然的地形”所构成的“一个亲密的文化团体”。^①即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圈的概念。因此，“东亚”或“东亚共同体”这一概念与文化及文明是不可剥离的。在 21 世纪提及“共同体”或是“东亚共同体”，尤其是从经济共同体这一角度出发的认识，似乎都需要说明是在全球化场景下产生而来的。然而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即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并不是新鲜事物。英国学者格雷厄姆·汤普森(Graham Thompson)曾经用 1913 年及 1993 年法国、德国、日本、荷兰、英国、美国的经济数据说明过，1993 年的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其实与 1913 年的情况类似。^②如果共同体理论一定需要强调与经济的国际化发生关系的话，东亚共同体理念的出现必定有促其产生的经济基础。然而事实上，东亚共同体理论及构想是在日本“兴亚论”的影响下产生的。

在东亚的历史上“兴亚论”是日本知识界及财界的共同思想，作为其具体表现的“大亚细亚主义”也曾经有过多种提法，^③被尊为国父的孙中山也曾在日本做过以此为题的演讲。^④然而作为“大亚细亚主义”的基石，无论是涉川六藏的“唇齿相依”论、冈仓天心的“东洋的觉醒”还是土井晚翠的“万里长城之歌”，所代表的都是 20 世纪打破欧洲列强对亚洲的侵略与被侵略这种构图的所谓日本的历史使命。“大亚细亚主义”无非是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以亚洲各民族的文化作为理念基础，另一个则更为重要，必须由已经完成维新，吞并了朝鲜半岛及台湾的日本掌握主动权。由于东亚近代史上，日本曾扮演过极不光彩的角色，因此，近代史上的“大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东亚新秩序”、“东亚联盟论”都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带有法西斯及殖民支配的性质，同时另一方面又都强调日本的主导权。二战结束后，东亚又被冷战格局所规定，朝鲜半岛的三八线与欧洲的柏林墙的作用一样，在地理上分割了东亚。50 年代的朝鲜战争未能改变这个格局，反而是加强了东亚的冷战格局，也使得“东亚共同体”构想及理论隐伏在了水面之下。1972 年 9 月 29 日中国与日本建立正常国家关系，开启了东亚

国家关系的新格局。1978 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及随后 1979 年的中美建交，更是巩固了这种新的格局。在经济方面，60 年代日本经济开始起飞，70 年代末韩国进入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行列，90 年代开始中国经济也实现了快速增长，东亚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东亚自身及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流也日益多元化。进入 21 世纪以后，东亚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2009 年 9 月鸠山由纪夫政府在其外交方针中明确提出创建“东亚共同体”的理念，使得东亚共同体构想再一次被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所关注。

一、中江兆民的“兴亚论”

在论及“兴亚论”、“大亚细亚主义”时，大多数论者都会将曾留学法国的中江兆民（1847—1901）作为肇始者。然而中国学者李廷江却在大量文献的基础上，点出了涉川六藏的历史作用。涉川六藏（1815—1851）是日本江户时期的天文及历法学者，在正值壮年的 35 岁时去世。1840 年鸦片战争，泱泱大清被英吉利的坚船利炮轻易击败，这对邻国日本的冲击极大。在日本知识界，一方面开始找寻清朝失败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开始思考如何化解西洋行使武力带来的危机。在 1841 年 8 月 15 日涉川六藏给幕府的信函中，可以看到“清国同我邦乃唇齿之国”，与清国“保持携手合作、互相帮助的关系”这样的内容。^⑤唇亡齿寒的境遇正是日本知识界力图回避的，因而日清唇齿相依的认识也就在东洋文明、东洋道德基础上形成了。但是，唇齿相依论又分化为“日清平等论”的唇齿相依论，以及“日本盟主论”的唇齿相依论。而“日本盟主论”为以后日本对周边国家的侵略埋下理论伏笔。在铃木俊等人编撰的《亚细亚历史事典》以及竹内好的著作中，这两个不同的唇齿相依论的出发点被归结到民权论与国权论的不同主张上。而中江兆民作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指导者，则最为关注民众与民族的自我觉醒。

1887 年中江兆民发表《三醉人经纶问答》^⑥，借民主主义者“洋学绅士君”、侵略主义者“东洋豪杰君”及自由主义者“南海先生”三人的问答，以“南海先生”的立场表述出了自己的认识。“绅士君”受康德思想影响较深，主张非武装的民主立国论，实现民主共和制。“豪杰君”则是军事大国化及夺取中国论的主张者，是典型的国权主义论调。而“南海先生”则认为民主共和制不过是未来的理想主义，而军事大国化以及吞并中国论则是日本已经开始实施的战略。在“南海先生”看来，日本与亚洲近邻应该致力于建立和平友好关系，虽然国际社会已经是弱肉强食的世界，然而仍应该看到在武力政治与国际法两者之间力量消长的变化。可以说，中江兆民的认识其实是“绅士君”与“豪杰君”的一种折衷。

就“兴亚”的“兴”字而言，翻译过卢梭的《契约论》，并被称为“东洋的卢梭”的中江兆民认为应该指“恢复的民权”。民权在当时存在着两种形态，一种是“恩惠的民权”，是由政府给予民众的。而“恢复的民权”是指民权本来就是民众当然的权利。因此，“兴亚论”即恢复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洋诸国民众的民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诸国间和平、友好的关系。“兴亚论”后来演进为更为复杂的“大亚细亚主义”^⑦，主张形成日本、清国（中华民国）、朝鲜的同盟关系，借以对抗西洋列强。然而，由于“东洋豪杰君”的日本盟主论占据上风，大陆侵略政策的东亚连带开始甚嚣尘上。玄洋社^⑧这样极端重视日本国权、带有强烈侵略主义的团体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早期的东亚共同体论

在讨论东亚共同体理论时,自然跳不过蜡山政道^⑨(1895–1980)这位两栖于日本学界、政界的人物。蜡山政道是日本行政学研究的先驱者,同时也是政治学家,1925年至1927年曾留学英国,研究过英国社会主义,而此后其政治理念逐渐偏向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蜡山自己也曾投身政界,当选过众议院议员。1938年成为昭和研究会^⑩的主要成员。此外,蜡山似乎还有着出色的外交手腕,1934年近卫文麿作为亲善大使访问美国时,蜡山也是重要的访问团成员。50年代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署时,蜡山亦曾作为主要的解读者。^⑪

1938年当时还是东京大学政治学教授的蜡山在《改造》杂志第11月号上发表了《东亚协同志体的理论》一文。这是最早明确提出“东亚协同志体”用语的论文,因此可以说,蜡山就是东亚共同体构想及理论的肇始者。虽然其受到近卫内阁“东亚新秩序”宣言的影响,然而蜡山所强调的“东洋的觉醒”及“东洋的统一”,其出发点是为了对抗西欧帝国主义体制,即是东洋的地区主义与普遍帝国主义体制的对抗。就东亚地理区域而言,由于1938年朝鲜半岛及台湾尚在日本的殖民支配之下,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日本,其视野中所谓的东亚地理版图就专指吞并了朝鲜半岛及台湾的日本、中国的东北(满洲)以及中国大陆。日本确实也曾觊觎过相邻的前苏联领土,但以失败而告终。^⑫因此,蜡山的“东亚共同体”的地理区域其基础就专指上述三个地区。

蜡山政道所倡导的“东亚协同志体”构想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他认为这种协同志体应该是一个拥有新型体制的政治性地域。新的体制是指带有非征服性的、非帝国主义性质的“地域性协同志体”,这大约是受欧美政治制度的影响。^⑬在这一点的认识上,蜡山的“联合体制论”与日本军部的“满蒙征服论”有着很大不同,也模糊了“大亚细亚主义”的“日本主导论”。但是,由于朝鲜半岛及台湾的殖民地的存在,日本作为殖民主体的事实昭然天下,因而蜡山的“联合体制”中已经蕴含了现实的帝国主义殖民支配与理念性的非帝国主义主张的矛盾。这也是其被当时及后来学者所垢病的。第二,蜡山承接“大亚细亚主义”的核心主张,认为应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异质性”,承认其民族性的文化背景。然而这种对文化的尊重尽管重视了满、蒙、汉、日本民族,却忽略了半岛上的朝鲜民族以及包括原住民在内的台湾岛内的居民。第三,蜡山主张“东亚地域协同志体应该建设成为与自然、文化有着机能性关联的新的行政区域及自治政府”。^⑭此点也表述出了较强的地域文化的主张,也即是承认地域文化的特殊性。第四,在蜡山看来,地域协同志体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协作经济,而不是帝国主义经济或者垄断资本主义,应采取“小自主大协作”^⑮的形式。第五,蜡山又强调地域协同志体的理论绝不是自给自足经济,也不是简单的结合体制度(bloc system),而是世界体制,即世界政治经济构成的原理。^⑯不难看出,蜡山的“小自主大协作”必须放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总框架内。

纵观蜡山的观点,他认为世界性的地域会在自然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上均衡地分化为数个地域,而这数个地域正是共同体形成的基础。现在看来蜡山理论中带有明显的德国人文地理学及文化圈学说的影子,其实也与这一时期和辻哲郎的风土论的出现有关。另外还可以看到,蜡山的东亚共同体理论,也有着浓厚的政治学专业的色彩,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是由政治性新体制着手,力求建立一种新的协作性经济。这种新的协作性经济在协作体内部和外部不同地域间又是普世论性质的,同时与世界上其他的经济结构可以对接。换言之,他在强调民族性背景的同时,也重视地域性的自然地理与文化的有机联系。

三、尾崎秀实的东亚共同体论

受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间谍案牵连而被日本军部绞死的尾崎秀实^⑦（1901—1944）在中国也有很高的认知度。上世纪 20、30 年代在中国旅居 4 年多的尾崎与中国左翼作家鲁迅、夏衍等人交流颇深。尾崎不仅仅是新闻界人物，同时与当时日本政界也有着密切联系，其政治敏感性强，对具体时事问题认识深刻。例如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 1938 年 5 月 26 日开始讲述《论持久战》，而几乎同时 1938 年尾崎也在日本《改造》杂志 5 月号上发表文章，同样认识到了战争的长期性问题，虽然其内容不尽相同。^⑧

蜡山的共同体理论发表后不足半年，同为昭和研究会成员的尾崎于 1939 年在《中央公论》1 月号上发表了《“东亚共同体”的理念及其成立的客观基础》一文，算是对蜡山政道一文的呼应及补充。具体而言，关于“东亚新秩序”的建设理念，尾崎认为在中日战争结束后，应该形成一种新的秩序，而不是旧秩序的复旧。同时东亚“各邦”^⑨在保持自己的独立的情况下，清算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关系，更加紧密地保持联系，并成为世界新秩序的一环。^⑩此点与蜡山的世界政治经济构成的原理存在一致之处。尾崎的“东亚新秩序”与宫崎正义的“东亚联盟论”也有着一定的联系，尽管后者依旧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影子。然而，尾崎也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与欧美帝国主义相比存在着落后、不足的一面，日本的资本主义的形成离不开对亚洲大陆的经济性要求，而相对弱小的资本主义只能通过武力的诉求来达到经济目的。也即是说，日本在资本主义形成及发展阶段中，对周边的侵略性是其特征。

在一定意义上，尾崎的“新秩序论”与蜡山稍有区别。对于东亚地区所蕴含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理想中的共同体的矛盾，尾崎认为应该通过关系清算来加以解消，另外尾崎也深知日本帝国主义经济的必然的对外扩张性，以及日中战争的长期性。对于前者，尾崎认为可以通过战后的“东亚经济结合体”来解决，以经济的相互联系来解消不同的经济诉求。这与蜡山的主张相似。而对于后者即战争的长期性，尾崎并没有更多的想法，只能是等待战争结束。处于战时东亚对立的历史时期的尾崎，其对共同体的真正考虑是必须在战争、对立结束之时才能开始的。战争结束后国际地缘政治怎样变化却未在尾崎的考虑之中。

尾崎的东亚共同体论更多地强调了以下的五点：第一，东亚的共同防卫；第二，政治性的联系；第三，民族性的联系；第四，经济性合作的紧密化；第五，新东洋文化的建设。^⑪作为近卫文麿的智囊团成员，其认识或多或少对时政产生影响。1938 年 12 月 22 日发表的 11 条《关于日中国交调整的近卫声明》^⑫中都可看到尾崎的一些想法。^⑬虽然尾崎自身也认识到实现共同体构想的困难，但是这五点仍成为后来批评的焦点，被认作是所谓“同文同种”、“亚洲觉醒”的口号。

尾崎秀实的共同体理论时常被解读成理想主义式共同体理论，由于其共产主义思想立场，其宣扬的共同体也被称为“世界性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尾崎构想与蜡山不同之处在于，尾崎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东亚“同文同种”的认识。尾崎的共同体论是在中国全面抗战初期出现的，而此时反对侵略、谋求民族独立的中国与日本在政治、军事上处于对立状态，因此，已经明察战争会长期化的尾崎，其所持的共同体理论也只能是对战争结束后的一种理想化的认识，遗憾的是尾崎没能看到战争结束。

四、二战以后日本的共同体构想

上个世纪 60 年代,随着朝鲜战争的特需经济以及东京奥运会的刺激,^②日本的经济步入了高速发展期,工业化程度日益提高。在此背景下,日本开始反省二战并重新开始考虑与周边诸国的外交、经济等关系,尽管此种考虑仍基本立足于本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1951 年 9 月 8 日签署《旧金山条约》以后,日本恢复了独立国家的政治地位。接着,得益于 60 年代初日美关系的再定位,日本更有余力专注于经济的发展。^③1966 年 1 月,日本经济学研究重镇一桥大学的贸易专家小岛清从自由贸易的角度首次提出了“太平洋自由贸易区域(PAFTA)构想”。就小岛清的立场而言,自由贸易区是由太平洋周边的亚太地区发达 5 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所构成的。其实,此时的日本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发达工业国家,但是小岛清还是将日本列入了西方发达国家行列,并在构想中更多地强调太平洋地区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利益,希望能与欧洲经济体(EEC)抗衡。^④

由于小岛清的理论忽略了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间接地不利于身处东亚位置的日本自身的利益,因而 60 年代日本参议院议员鹿岛守之助提出的“亚太共同体”^⑤开始修正小岛的理论。在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 60 年代末,时任外务大臣的三木武夫提出的“亚太外交”构想、时任经济厅长官的宫泽喜一提出的“宫泽构想”也都是力图修正小岛理论的尝试。在重视与发达工业国家关系的同时,日本也必须重视与亚洲诸国的关系,这更为符合日本的国益。在此基础上,1977 年福田赳氏的“太平洋主义”中首次提及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强调了东盟在经济、外交、政治上对日本的重要性。1979 年大平正芳的“大平构想”则更强调了日本对亚太地区的特别关注。日本针对亚洲诸国的大规模官方发展援助(ODA)也由此开始。作为对“大平构想”的承接,1980 年的《环太平洋合作报告书》则第一次将合作内容细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其合作三原则,^⑥规定了具体的合作形态。在中曾根康弘执政期间,三原则又被拓展为四原则,更加强调了东盟各国的主导作用,倡导以民间为主导的合作形式,淡化了合作的军事、政治意义。

2009 年 10 月鸠山由纪夫公开表示赞成“东亚共同体”构想,同年 6 月鸠山在访韩时也曾提及这一构想,但当时更多地考虑处理日、美、中三国外交关系,作为民主党执政的政府对外展示出与前执政党自民党亲美立场的不同姿态,^⑦在美中之间试图找出一个新的平衡点。综上所述,除了中曾根的四原则较为重视他国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民间主导的合作,有非常淡薄的文化意义之外,6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日本的各种共同体构想,几乎都是与地缘政治(特别是外交政策)及自身和周边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五、文化理论中的共同体

罗伯特·迈基文(Robert Morrison MacIver)曾认为,共同体(community)的规模可以小至村落、市镇,也可大过地方及国家。但不管如何,都必须是共同生活的某个领域。^⑧然而迈基文就“共同生活”一词却未作更多解释。由于跨界,自然环境的差异难以避免,那么基于不同自然环境的不同生活样式(life style)亦可算作是“共同生活”。因此,由于共同体的规模不一、所处自然环境各异,必定带来多种价值观和认识论。在某种意义上,共同体概念本身就具有多样性,其多样性也可能招致概念的模糊和混乱。^⑨由共同体的基本条件、共同生活(communal life)、地域性(locality)、地域社会感情(community sentiment)可知,共同体特别是规模较小的

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共同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跨越国界的共同体则大多遵从地缘政治原则或经济跨界原则。这种认识在约翰·鲁杰(John G. Ruggie)的共同体理论中体现得尤其明显。鲁杰的共同体理论中有三个重要的原则，其一为一般化的行动原理，其二为集团成员间的不可分性，其三为扩散的互惠主义。^②一般化的行动原理强调一种超越特殊性的普遍性的原则，也是某一共同体的普遍价值的体现。集团成员的不可分性，无非是集团结合的强度的体现。扩散的互惠主义其实与蜡山的构想相近似。由此分析可知，在共同体理论中，如果对象是小规模的共同体，则文化对于共同体的形成及维持的作用更为强化，在自然的相互关系中形成的文化的地域性也会更为显著。反之，对于一个规模空前的跨区域、跨国界的共同体而言，文化的纽带作用常常需让位于普遍化的价值观、基于某种利益的集合以及地缘政治、经济体系。

1957年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提出过“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的概念，安全共同体原指不可能或很难发生大规模武力冲突的地域。在多伊奇看来，如果几个国家的组合存在着集合性的认同，安全共同体就有望建立，共同体内部的成员由共同体感觉(sense of community)、信赖以及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但是冷战结束以后，在所谓重视规范及认同的社会建构主义学者的论述中，安全共同体又有了一定的修正。有学者认为，冷战后的安全共同体是由共同的认同(identity)、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文化意义等多个方面的直接性相互作用以及互惠的长期利益所构成的。^③此类安全共同体理论，重在强调共同性即文化的普遍性对于共同体建构的根本性作用，对于求同存异和保障地域的最大利益有着积极的意义。

六、共同体理论与跨文化认识

众所周知，1883年清朝与法国在谅山及台湾开战后，福泽谕吉提出了著名的“脱亚论”。^④“脱亚论”本是一篇篇幅极短的社论性文章，但其所产生的冲击力却超乎人们的想象。在文中，中国及朝鲜均成为了日本的“恶友”，日本宁愿与西洋共进退，也不愿与亚洲的“恶友”为伍。可见，“脱亚论”与东亚共同体正好是相反的主张。安藤彦太郎在《日本人的中国观》中曾经指出，脱亚论的系列思想的源头在于“民权论”，其价值观体现在西洋的近代文明上，其批判对象是日本及亚洲的封建性遗制，带有一定的进步性。而“兴亚论”系列思想的源头在于“国权论”，其重点在东洋，强调的是东亚的传统精神以及东亚的连带感，有一定的保守性。^⑤安藤之论道出了所谓“民权”与“国益”的两难选择。

由“兴亚论”而起步的蜡山政道的构想有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异质性、承认其民族性背景的成分。但从另一面来看，蜡山的这种认识正好说明了其对汉、满、蒙文化的正确的认知态度，即汉、满、蒙文化是特殊的、异质性的，而尊重异质性恰恰体现了东亚缺乏共同的文化基盘。尾崎的共同体构想则基于东亚“同文同种”之上。但是这一“同文同种”的论述却流于表面，无论是从人类学(或称民族学)角度，还是从语言学角度出发都很容易找到尾崎“同文同种”论的缺陷。过于单薄的“同文同种”的认识方法终将泯灭掉文化的特殊性，使得共同体的主张显得简单化。

在蜡山及尾崎的共同体理论盛行的同时，在日本学界也存在着另外的声音，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高田保马(1883-1972)就是这种声音的代表者。作为日本知名学者，高田首先反对“东亚协同体”的地区主义，认为将东亚看作是命运共同体的认识，其实是误读了东亚的社会

性质。^⑨高田认为,当时中日的对立局面以及两国各自不同的历史脚步,都很难将中日看作为“命运协同体”。同时“命运协同体”这一概念原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用来说明民族的本质问题。在高田看来,东亚地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命运应该是共同的宿命,仅仅存在于共同的历史性遭遇中。当然,高田在批判蜡山、尾崎的同时,也强调了东亚各民族在“习惯、风俗、信念、学问”上有一致之处,由于存在“三同的纽带”^⑩,东亚已经是“文化共同体”。但是如果仅仅强调地域性纽带,东亚的团结亦即东亚民族的形成是不可能的。^⑪

文化人类学的传播理论(diffusionism)强调异文化间的共同要素,^⑫这一要素在跨文化研究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尾崎所谓的“同文同种”其实与高田具体化后的“习惯、风俗、信念、学问”相一致。而正是这种文化上的一致或共通性要素的存在成为共同体成立的基础。但是如果一味地强调共通而忽略特殊,承认共通性要素亦可能产生一个否定文化特殊性的后果。在上文分析中,蜡山看到了文化的特殊性,而尾崎及高田却强调文化的共通性,这正是共同体形成的最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解消极为困难,这也正是东亚中、日、韩三国文化状况的现实写照。找出解决或减弱此矛盾的方法应是今后探讨的主要方向。文化共通要素可以在中、日、韩三国间的相互文化理解上产生良好作用,如能使之形成某种文化平台以承载上层建筑,并能切合个别文化的不同诉求,方是唯一可行的道路。芹川博通以东亚共同的儒教和佛教经济伦理来阐述东亚经济伦理,应该是一种新的尝试。^⑬

七、结 论

在梳理日本关于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历史时,可以看到,蜡山与尾崎虽然同为昭和研究会成员,但两者的构想中对于东亚文化的认识不尽相同,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冷战结束后,苏联的解体使得全球地缘政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济政治形态也更为复杂和多元。美国的一极化、欧盟的强化、上海合作组织的活跃、朝鲜半岛对立依旧,都增加了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同时,随着日、韩、中的经济成长,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东亚拥有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共同体理论的倡导者往往是政治、军事或经济强国,其争取地区主导权的意识也暗含在共同体理念之中。小熊英二在《日本周边地域政策及其特征》一文中,曾以“包摄”与“排除”两个概念来分析日本在吞并北海道、琉球、台湾、朝鲜半岛及委托统治南洋群岛、建立伪满洲国后,其民族国家的建设由于时间过短,所以只是将上述地区包摄而已,而包摄的同时,对于上述地区的住民又采取了排除政策。比如尽管给予了日本国籍,但没有赋予参政议政权利;虽然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但学习时间被缩短等等。在已属自身势力范围的地域中尚且有歧视现象,更何况东亚共同体。可见,强者的共同体理论在道德上有一定的欺瞒性。在今后的共同体理念中如何避免某一成员独享主导的局面,也是不得不令人深思的问题。

在讨论跨地域的共同体时,似乎追求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共同体,也应该由共通的文化要素作为基础,然而事实上普遍化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往往与特殊化的文化产生矛盾。这一矛盾难以解消,尾崎的特殊时期的共同体理论就是实例,很多问题连尾崎自身都未能理清头绪。这就使得诸多共同体理论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因此,在现实意义上如何处理这一矛盾,找寻切实可行的策略,应是共同体理论新的突破口。

注 释:

- ①转引自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 ②格雷厄姆·汤普森:《全球化与国内经济政策的可能性》,王列、杨雪冬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56—57页。
- ③可参见赵军:《大亚细亚主义与中国》,亚纪书房,1997年。
- ④陈德仁、安井三吉编:《孙文演讲(大亚细亚主义)资料集》,法律出版社,1989年。
- ⑤李廷江:《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3页。
- ⑥《三醉人经纶问答》的三种认识也正是当时日本知识界真实思想的反映,参见木下顺次等编:《中江兆民的世界——读〈三醉人经纶问答〉》,筑摩书房,1977年。
- ⑦提倡“大亚细亚主义”的日本政治家、思想家诸多,如胜海舟、植木枝盛、樽井藤吉、大井宪太郎等。各自的出发点不同,阐发的要义也有别,因而使得“大亚细亚主义”的理论体系显得异常复杂。
- ⑧玄洋社是1881年以头山满为核心的福冈武士在九州结成的政治团体。1946年被盟军总司令部解散。尊皇、爱国、维护民权是其核心主张。玄洋社所主张的对外活动与日本政府的对外侵略政策是一致的。1901年玄洋社还成立过负责海外事务的黑龙会,而黑龙会对辛亥革命的支持是众所周知的。参照李廷江:《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第45—48页。
- ⑨蜡山政道在中国似乎知者不多,然而在30年代其《行政学总论》、《国际政治之理论与实况》及《同盟经济》等论著在上海曾经被译为中文出版。
- ⑩昭和研究会是近卫文麿的政策研究团体,相当于智囊团。1933年12月设立,1936年成为正式的政治团体,1940年11月解散。其研究范围涉及外交、国防、经济、社会、教育、行政等各个领域。研究会所主张的“东亚共同体论”以及“新体制运动”都对近卫内阁产生了很大影响。
- ⑪参见1957年《中央公论》5月号特集《关于改废安保条约》。
- ⑫1938年6月及8月,日本在图谋图们江前苏联的领地时招致大败,史称张鼓峰事件。直至二战结束,日本始终未能扩张到前苏联领土之上。
- ⑬蜡山政道:《东亚与世界》,改造社,1941年,第29页。
- ⑭同上,第30页。
- ⑮“小自主大协作”为笔者归纳,是指因重视文化的特殊性,满、蒙、汉、日本都应有自己的经济生产方式,谓之小自主,而小自主又得服务于共同体,因而是大协作。
- ⑯蜡山政道:《东亚与世界》,第31页。
- ⑰尾崎秀实因其日语发音为Ozaki houtsumi,在1983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聂崇厚所译《佐尔格案件》(F.W. Deakin and Richard Storry, The Case of Richard Sorg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中被错译为“大崎保美”。
- ⑱米谷匡史编:《尾崎秀实时评集:日中战争期的东亚》,平凡社东洋文库,2004年。
- ⑲尾崎在此用“各邦”一词,已经开始考虑东亚国与国之间新关系的建立,重视共同体的政治体制,因而故意避开了“各国”的用法。
- ⑳尾崎秀实:《尾崎秀实著作集》(第三卷),劲草书房,1977年,第152页。
- ㉑同上,第154页。
- ㉒由11条构成,在第1条有关中国主权的声明中,其实是偷换了概念,已经有了树立傀儡政权之意。
- ㉓尾崎秀实:《尾崎秀实著作集》(第三卷),第153页。
- ㉔其间尚有神武景气,即1955—1957年间的爆发性的经济增长。
- ㉕1960年6月23日日本与美国签订《日美安保条约》,从此决定了日本在美国羽翼下的政治位置,同时也使得日本政府可以放开手脚专心于经济发展。
- ㉖小岛清:《肯尼迪回合与太平洋自由贸易地区构想:世界贸易的自由化与一体化》,《世界经济评论》,1966年1月号。

②⑦鹿島守之助:《鹿島守之助外交論選集(3)亞洲太平洋共同体》,鹿島研究所出版会,1972年。

②⑧此三原則分别是:(1)地区合作是开放性的,而非排他性的;(2)合作地区内部也是自由的、开放性的相互依赖关系;(3)不排斥本地区内已经形成的双边及多边关系,努力形成新的相互补充关系。参见:《环太平洋合作报告书》,《世界经济评论》,1980年4月号。

②⑨据称鸠山的外交构想多受日本综合研究所会长寺岛实郎的影响,2009年10月寺岛实郎在《文艺春秋》上发文,阐述了日本民主党应该持有的外交立场。

③⑩R.M. MacIver, *Community: a Sociological Study*, London: Macmillan, 1917, p.46.

③⑪C.Bell and H.Newby, eds., *The Sociology Of Community: A Selection of Readings*, Lightning Source, 1974.

③⑫J. G. Ruggie,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 J. G. Ruggie, ed.,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s of institutional 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1.

③⑬E.Adler and M.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③⑭原载明治18年(1885年)3月16日的《时事新报》,中文有林思云译文。

③⑮安藤彦太郎:《日本人的中国观》,劲草书房,1971年,第52—53页。

③⑯高田保马:《东亚民族论》,岩波书店,1939年,第90页。

③⑰此处的“三同”为同文、同种、同地域,较尾崎的“同文同种”的认识更进了一步。

③⑱高田保马:《东亚民族论》,第92页。

③⑲共同的要素又时常称为文化公分母(common denominator)。

④⑳芹川博通:《为何现在讨论东洋的经济伦理》,北树出版,2003年。

(张曦: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东北亚文化研究所讲师 责任编辑:胡令远)

模因论视阈下茶文化在日本的传承与创新

彭新勇

内容提要 模因论作为人类文化的进化论,为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茶文化模因在日本的传播遵循着文化进化的规律,经历着选择、适应和变异的动态进化历程。日本茶道汲取中华茶文化、禅宗、儒家“和”文化的思想精髓,复制到自身文化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模因复合体和价值体系。

关键词 模因论 模因复合体 茶道 禅宗 儒家 “和”

一、模因论概述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976年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创造出“模因”(meme)一词并用以阐述文化的传递问题。模因论是关于人类文化的进化理论,模因理论将小到一个理念,大至文化都看作是模因。一种文化和理念之所以不同于其它文化和理念,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模因。模因被视为文化信息单位,正是由于人类的模仿行为,观念得以传播,文化得以传承和进化,任何事物只要能通过模仿而得到复制和传播就可以成为模因。^①思想、言语和行为都可能成为模因。模因作为新的复制因子通过模仿而传播、驱动文化的进程。

模因不但是一种可传染的信息模式,同时也是一种认知或行为模式,可从一个宿主传递到另一个宿主。单个模因之间既互相竞争,又互相支持,构成模因复合体(memeplexes)。道金斯指出模因具有三个特征:(1)复制保真度(copying-fidelity):复制得越忠实,原版就越能保留;(2)多产性(fecundity):模因的复制速度越快,模因散布越广;(3)长久性(longevity):复制模式存在越久,复制的数量越大。

模因从一个宿主过渡到另一个宿主,尽管不断变化着形态,但始终保持其固有的性质或相同的模式。同时,任何一个事物要构成一种复制因子必须可遗传、可变异、可选择,只有那些适应社会规范与文化环境的模因才得以成功地被横向、纵向、交叉传播。

模因论将进化论的观点引入到分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它作为一种动态的研究方法对文化的生成、传播、变异和壮大具有强大的阐释力,使抽象的文化传播研究借助模因这个介质变得具体可感,能弥补传统文化研究的不足。

二、茶在日本的受容与模因

茶在中国已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传说神农氏“尝百草”偶然间发现了茶具有解毒的功

效,从而用于药膳。到了两汉、魏晋时期,饮茶习惯开始流行。“茶”这一汉字则是在中唐以后出现的,此前一直都用“荼(と)”来指代。西汉王褒《僮约》中就有“烹荼尽具”、“武阳买荼”的记载。日语中茶的字音有吴音“だ”、汉音“た”和唐音“さ”,“ちや”音最早见于院政时代的《色叶字类抄》,可知是介于汉、唐之间传入日本,所以日语的“茶道”保留了“さどう”和“ちやどう”两种读法。奈良时代(710~794),以入唐求法的僧侣为主体的遣唐使在学习中国政治制度和佛教、建筑文化的同时,也将“茶艺”带回了日本。据日本《茶经祥说》记载:天平元年(729)圣武天皇曾用茶慰劳前往宫殿诵经祈祷的僧侣;天平胜宝元年(749)孝谦天皇亦效法先皇用茶来奖励建功立业者。《日本后记》中还有“弘仁6年(815)4月22日,入唐求法回国的僧侣永忠(743~816)为嵯峨天皇煮茶献茶”的记载。

经过几代人、特别是以僧侣和皇族为主体的上层社会的大力推介,饮茶模因的“复制保真度”不断强化,跨域东传的饮茶习俗风靡一时,不断被社会各阶层模仿接受并进而扎根。此外,模因的多产性和长久性也使得模因复制能力强,传播的速度快,复制模式存在愈来愈久远,复制的数量则愈来愈大。^②从憧憬中华文化派生出来的消费观念强有力地支持日本人完成了接受茶饮料的学习过程。中国传统饮茶文化模因因其独特性和效用性最终被异文化模因环境所选择。

我国的茶叶依色、香、形区分有数百种之多,按国际上通用的不发酵茶、半发酵茶、发酵茶的发酵程度加以甄别的话,可分为绿茶、白茶、黄茶、青茶、红茶和黑茶等。日本虽然在昭和40年尝试栽培红茶,在昭和54~60年尝试生产青茶中的乌龙茶,但都因品质、价格等因素无法供应市场,未能形成量化生产,以完败而告终。所以一般我们提到的日本茶完全就是绿茶。

即使是单一的绿茶,日本人仍然按照栽培方法、采摘期、工艺流程的不同加以区分,对茶的命名也表现出多样化,例如:一番茶、二番茶、三番茶、秋冬番茶、煎茶、玉露、芽茶、番茶、蒸茶、抹茶、头柳等等。煎茶是日本茶的主流,是采青后的生叶经热蒸处理抑制发酵而成。“蒸”的时间如果达到普通煎茶的2倍,蒸汽充分渗透,茶叶就会变得细长,成为“深蒸煎茶”,这道工序是为了使不溶于水的有效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道金斯将模因视为一种文化进化的基本单位,如我们头脑中的思想、观念、技艺等。^③成功的模因传播有赖于它及时发生变异,适应变化中的模因环境和宿主环境。传入日本的“茶”在完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的培育和发展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中国自明代以后,在制茶技术的热处理环节上逐渐以“炒”取代了“蒸”并推广至今,而日本仍然沿袭相对繁琐、困难的“蒸”的工艺。如果把一个模因库看作是一个模因的集合体,集合了不同的观念和思想的话,制茶技术热处理环节中“蒸”的工艺在日本得到了坚持并强化,成为突出的强势模因复合体,并感染新的宿主,从而将自己的特征传播出去,技术上的纤细化程度在世界上也独树一帜。

尽管中国的乌龙茶在半发酵茶的技术上突出,但世界上只有日本在生叶采青后刻意避开发酵环节,直接生产不发酵的绿茶,从而更接近绿茶“绿”的本质,创造了洗练的制茶技术。正如日本著名茶文化史学者熊仓功夫所指出的,唐代饼茶类似于现代中国普洱茶的后发酵茶,有强烈的霉变气味,不适合在温暖湿润的日本列岛生活的人们的口味嗜好。对于这个发酵的化学研究还不是很充分,但是已经判明发生了不同于自然发酵的发酵(有时被称作后发酵,由一种菌的作用而发生),进而产生了独特的风味(可以说是一种霉味),这个气味在温暖的日本决不是香味。这里隐藏着荣西再次引进茶并且扎下根的秘密:荣西引进的茶是没有经过

后发酵、嫩叶清香、适合日本人的茶。^④

这说明由于传播的文化环境即宿主环境和模因环境发生了改变，茶艺的模因势必发生变异才能进行复制传播。这其实也反映了日本人在学习引进外来文化方面的不遗余力，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新的强势模因。茶文化在日本的进化过程正是一个变异、选择性保留且有所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由于不同模因的生命力不同，在为数众多的模因当中，有些被传播复制并代代传承下来，也有很多模因没得到传播复制而被淘汰。

三、茶道与禅宗的结合是文化模因的变异过程

变异是异模因环境选择的结果。在复制和传播过程中为了适应异文化环境和宿主环境，原模因会随着其所在具体时空中的思想意识形态而出现相应调整，通过进行一定程度的变异，产生各种模因变体来与已有的其他模因竞争。只有通过变异和对变异的选择性保持和淘汰，模因才能得到进化。^⑤茶道与禅宗的结合是宿主对目标文化模因进行同化、保存、表达并最终实现跨文化传播的变异过程。文化在传播时，往往不是以单个要素的形式展开，而是围绕着一个要素的整个综合体的传承。在茶文化传播中，也形成了茶与禅作为一个文化综合体被接受的现象。

在中国茶文化的萌芽期即两晋时期，饮茶文化中已经渗透了节俭、朴素、清谈、廉洁等諸多元素。《南齐书·武帝本纪》所记武帝萧颐临终遗诏：“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惟设饼、茶饮、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但无论是皇室贵族、文人士大夫还是普通平民，饮茶都是倡导品茗解乏、聚友消遣的实用价值，不会在日常的饮茶生活或茶艺过程中去刻意追求达到某种理念，或着意在饮茶过程与茶艺过程中去贯彻这种理念。因而，中国人饮茶始终没有进入“道”的状态，仅仅停留在“艺”的阶段。^⑥

日本茶道的形成是在将“禅”导入精神世界以后的事。村田珠光(1423–1502)跟随一休参禅，获得了参禅登堂入室的不二法门——中国宋代禅僧圆悟克勤的墨迹，村田在点茶供香、研悟墨迹当中领悟到佛法即蕴含于茶汤之中，开创了茶禅一味的境地。茶道从其创立者村田珠光、发展者武野绍鸥开始的草庵茶到集大成者千利休时，已经升华为一种在家禅，即在家佛教。在批判性地吸收了禅之后，禅就成为茶道的创造主体和生活规范。茶上升为“道”的终极意义——人生修行的手段。

日本茶道较早承担了一部分社会职能，阐发一种精神价值，追求刻意的精神修炼，以茶艺和品茶为媒介和路径，去体悟、进入禅的境界。如李泽厚在《己卯五说》一书中所说：“日本茶道‘和敬清寂’一举手、一投足的精心苦练，都是在刻意追求禅境的寂灭和超越。正是这样才能与世俗环境和世俗心境拉开距离，显示差别。”

在文化的发展进程中，相互竞争促使新模因不断产生，并随着社会环境的选择而传播或消逝。不同的社会个体对特定模因的表达能力不尽相同，模因宿主的接受复制能力也并不均衡。特别是文化背景的差异性会对模因传播过程中的保真性造成重大影响。从茶文化产生的古代中国背景来看，生活相对安逸，乐天知命的儒家中庸思想深入人心，“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逐渐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人与自然的关系达成了和谐与平衡，凡此种种都不利于把“艺”推向“道”的模因变异。

反观日本，火山、地震频发的汪洋大海中的孤岛环境造就了日本人强烈的生无常观、人

生短暂感和追求极端的岛民根性,加之镰仓和室町末期的战乱造成了社会剧变,人心躁动,带来了人们精神世界的不安。可以断言,险峻的自然环境和泛滥的末世思想催生了大和民族爱好“禅”的民族特性。由于日本人深藏在内心深处的孤岛感、哀怨感和危机感,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的悟道精神超越了宗教领域,成为日本民族所需要、所追求的一种境界,在禅的境界中人们获得心灵的须臾安宁。因而,当荣西及道元等人,将禅传入日本后深得大和民族善待,使得“禅”能很快在日本普及开来,且不断生活化、世俗化,并最终与茶道结合,建构了一个完美的归宿。正如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所说的:“室町时代的文化,不是有禅宗的影响,而是禅宗成了室町时代的文化。”而千利休的草庵式空寂茶的精神,则超越人力回归自然,视茶道为佛道,通过禅宗与茶道的结合,达到“茶禅一味”的精神境界。^⑦

禅宗模因是靠有意识、主动的筛选得以在日本茶道中保留与变异的。日本民族主动选择该模因的主要标准就在于是否与其文化环境相适应。茶文化作为一个系统,有不同的类型和层级,由许多方面的文化模因构成。任何一个层面的模因发生变化,都会不自觉地引起其他层面的变化,继而使整个文化出现新的整合。^⑧具有穿透力、能融入其文化环境的模因最终被优先选择。

可见,文化并非一成不变,文化模因在传播过程中产生变异,在变异中得以发展或创新,它在传承过程中通过不断地进化来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日本茶道在进化与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不断吸收了中华茶文化和禅宗的精髓,把这些精髓复制到自己文化中,并不断传播,与自己的文化融合,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文化模因复合体和价值体系。

四、“和”的思想与民族文化定型模因

“和”的思想早在西周末年开始萌芽,太史史伯最早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合”思想,标志着中国传统“和”文化思想正式发端。春秋战国时期是“和”文化思想的繁荣鼎盛期,孔子将“和”的思想运用于人伦社会的道德修养中,在《论语》中就有“仁者爱人,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的论述,孟子则更进一步提倡“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儒家强调:与天地四时合其序,即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能共达、和能共立的核心基础是互爱,即人要爱人,可见“和”是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和”文化提供了社会理想图式。最高的和谐,儒家称之为“太和”。“从价值取向看,儒家的全部道德伦理,都是为了追求最终的和谐。”^⑨

日本茶文化以禅宗为核心,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儒家的思想精髓。千利休提出的茶道“四规”中,“和”表示整个茶事进行过程中具体形式的和谐、内心情感的和悦,也指讲究本来面目、不造作、与茶事的自然融合。“和”与“敬”都寄语社会安定、国家和平。茶道“七则”也倡导主、宾和睦谦让的和谐理念,追求心灵融合于自然之中,使主观与客观的融合得到一种美的升华。茶道中的“一期一会”的心境则强调重视彼此之间的缘分和人与人的互相关爱,即人与人一生仅此一聚,只有还原自我,怀着缘不再来的信念,不造作、无杂念全身心地投入,“以心传心”,才能从短暂的茶事中获得无限的自由。

透析日本茶道的方方面面,不难发现儒家“和”的思想是运行其中的精神传承纽带。茶道中的“和”概括了大和民族的美学特征,所以学者梅原猛说,“和”是日本精神的核心,是贯穿日本文化的原理。

模因论奠基人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说,基因在一个特定基因在场的情况下发挥的是一种作用,而在另一组伙伴基因在场的情况下发挥的又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作用,模因在不同的情况下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独特性。“和”在茶道文化语境中也浸染了微妙的日本民族特色。日本茶道不仅在内在修为上追求“和”的共鸣,即使在饮茶礼法上也贯彻“和”的理念。例如,千利休推行了轮饮法,即宾客同饮一盏苦涩浓茶。茶艺师献茶之后,宾客须从茶盏的同一位置喝茶,传到最后一人要正好喝完。轮饮的用意无疑在于“祛利”与“忘私”,以超乎物欲之上、净化心灵的“和”的力量来对抗私欲,达成心意和谐相通、消弭等级差别。

尽管茶道中的“和”文化模因传承过程中会有某些变化,但具有本质性内在特征的“文化遗传密码”却得以贯穿始终。美国社会学家李普曼(W. Lippmann)把这种“文化遗传密码”定义为民族文化定型(stereotype),其形成过程可以概括为:被认识的客体(特定的群体或民族)→认识主体(人脑)→认知结果(对该特定群体或民族的认识)→(模仿)复制→传播→定型认识(民族文化定型)。^⑩由于文化定型模因具有强制性特征,在人脑的认知结构中占据着认知基础的地位,因而更容易“强制”人们优先对其进行复制和传播。“和”的思想之所以能在茶道的漫长演变历史中被选择继承,显然得力于儒家主流思想的强势地位,它所蕴含的辩证和理性内涵,具有普世性的价值意义。

五、结语

日本的茶文化源于中国,却侵染了浓郁的民族色彩,并因其繁复的形式手法和神秘深奥的精神内涵而为世人所瞩目。这种讲究“和、敬、清、寂”的茶文化,将日常生活行为与宗教、哲学、伦理和美学熔为一炉,成为一门综合性的文化,以摆脱现实社会的羁绊,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内心深处变得融洽起来的求心之道为至高追求。

模因作为文化的基因,势必会承载特定文化的典型特点。用模因论解释中华茶文化在日本的传承与创新使这种文化传播不再被看作是静止和孤立的概念,而是具有差异性和不完整性动态过程。模因复合体相互作用,通过跨时空、跨文化传播和复制的过程,使茶文化具备了在日本民族语境中的独特文化特征,中华文化的优秀部分也借助模因因子拓展了覆盖面和影响力。

注释:

- ①苏珊·布莱克摩尔:《迷米机器》,高申春、吴友军、许波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
- ②何自然、何雪林:《模因论与社会语用》,《现代外语》,2003年第2期,第200—209页。
- ③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④熊仓功夫:《茶道的历史》,朝日新闻社,1990年。
- ⑤刘静:《中国传统文化模因在西方传播的适应与变异》,《西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5期,第112—114页。
- ⑥施由明:《自由的性灵舒放与刻意的精神修炼》,《农业考古》,2009年第2期,第249—252页。
- ⑦叶渭渠:《日本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 ⑧卢松琳、傅福英:《模因论视角下谈文化传承》,《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71—74页。
- ⑨修建军:《论“和”为儒学之精义》,《孔子研究》,2005年第3期,第43—52页。
- ⑩宋洪英:《从模因论看民族文化定型》,《外语学刊》,2012年第1期,第69—73页。

(彭新勇:湛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徐静波)

浅析日本能剧之“幽玄”美学特质

——以世阿弥戏剧为中心

李依含

内容提要 能是日本传统古典戏剧中两大国剧之一，形成于公元 13 世纪，曾受中国古典戏剧影响。开创期能剧艺术家世阿弥创造发展了较为系统的能剧理论，其中体现出了鲜明的本土特色，即“幽玄”美学。“幽玄”美学源于和歌文学，在能剧中形成了独特风格，被称为能的最高境界。本文以世阿弥的能剧理论作品《风姿花传》及若干剧目为分析对象，尝试探讨了“幽玄”美学在能中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 日本能剧 “幽玄”美学 世阿弥

在东亚地区的戏剧高潮中，中国的古典戏剧自元代起迅速发展，并分化出杂剧、散曲等诸多分支。然而，相匹配的戏剧理论却并未在同时段出现。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曾言，“自元以来，戏曲虽相当发达，但论戏曲之文却并不多。”同时，邻国日本却在元末明初时期通过理论的迅速发展，建立了成熟的古典戏剧体系，并体现出了鲜明的本土戏剧特色——“幽玄”之美。作为日本中世纪古典文化形态的两大内涵之一（另一内涵为“物哀”），“幽玄”最初形成于平安时期，对日本本土戏剧、文学、书画都有着深远影响。它在戏剧中的艺术内涵保留至今，较多地脱离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并从一个侧面反映其独特民族美学与思想。

在日本古典戏剧中，两大“国剧”之一的能，又称猿乐能，形成于公元 13 世纪，其诞生受到中国舞乐、散乐等传统戏剧的影响。日语中，“能”指“艺能”，即艺术技能。在表演形式方面，它全部由男性参与，“使用‘能面’（能剧用面具），由谣、舞蹈、伴奏所构成并伴以谣曲演出的乐剧”；^①在表达内容方面，它被定义为“宗教意味浓重的祭祀性戏剧样式”，^②这是日本古典戏剧的一个共有特色，由自然神崇拜的日本传统神道思想所决定。

日本戏剧的集大成者、能剧界最伟大的艺术家世阿弥（ぜあみ），所撰写的能乐传书《风姿花传》讲述了能剧的基本思想及人生理论，是能剧理论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古时期东方戏剧理论的巅峰。^③由于同时期中国元代并无造诣较高的系统性戏剧理论作品，《风姿花传》成为这一时期东亚戏剧理论的代表作；其中的“幽玄”美学思想，作为能戏剧理论的几大要素之一，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能剧的发展变迁。

一、“幽玄”美学的成型

《风姿花传》等能剧传书中，世阿弥提出的“幽玄”美学源于和歌文学。平安后期，随着遣唐使停派、假名出现，日本本土文学有了长足发展，和歌开始与汉诗分庭抗礼。但社会动荡，战乱不断，部分贵族、武士与文人归隐山林，以当时佛教虚无思想为基调，从隐居生活提炼出

“无常观”理念来升华文学的审美情趣,形成了超凡脱俗、内心宁和、朦胧空蒙的“幽玄”美,给予败落、残缺的事物以足够怜惜。此后的镰仓时期,著名贵族歌人藤原定家则为和歌的“幽玄”美代表,其名句如“樱花红叶无觅处,海滨草屋秋日暮”反映出颓废、朦胧、寂寥、悲哀的意绪。著作《每月抄》中,已提及“幽玄”一词,在和歌文学中意指“不外是意在言外,情溢形表,只要‘心’‘词’极艳,则其体自得”,^④基本解作词意朦胧微妙,情感含蓄委婉,多表达孤寂、哀怨、恋慕之意。

从和歌文学转向戏剧表演,世阿弥之父、能剧鼻祖观阿弥首次吸纳“幽玄”之风,将文辞之“幽玄”化用于戏剧形态,摒弃其中颓废、绝望的消极成分,因循时代变化融入新兴武家政治的质朴之风,明确以“幽玄”作为无上“风体”,在表演形式上提倡虚幻氛围下朦胧、优雅且孤寂的姿态,尤以舞蹈为最;在戏剧理论构建上,则融入佛教与禅宗的“空寂”和“虚无”思想,形成其抽象的美学理论体系。如《松风》、《吉野静》等能剧目,其中演员高雅优雅的舞姿与虚妄的内涵,显出能剧的“幽玄”之风。

二、世阿弥的能剧“幽玄”美学理论

世阿弥对其父的理论进行丰富与完善,以“幽玄”为能乐的“第一艺位”,在另一部能剧传书《花镜》中提出,“唯美而柔和之风姿,乃‘幽玄’本体。”^⑤其中的不同形态,包括语言、音乐、舞蹈等方面。在语言上通过学习和歌遣词造句达到优美,音乐上通过节奏韵律协调达到悦耳流畅,舞蹈上通过模拟姿态达到含蓄美感。这几个要素,与学艺之初心相关联,推动能的“幽玄”达到最高境界。

(一)剧本结构

世阿弥曾在传书中如此告诫后代:“编写‘能’的剧本,为此道之生命,”^⑥充分强调了剧本的重要性。在能中,其“幽玄”美学多体现于造型、姿态与音乐美感,较少着重于能剧本的描述上。然而,能剧本的叙述式特质使其与欧洲古典戏剧相区分开,具有更大的抒情空间,以及更多余地与空白以表达“幽玄”。

中国戏剧尽管将表演置于故事之上,但故事情节依然丰富多变,从发展到高潮、结局,交代清晰,背景明确,结构完整。欧洲戏剧更甚,将剧本的情节冲突的戏剧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其情节张力甚至成为比表演形态更重要的因素。然而,能剧在放弃情节、以抽象意象提供大量空间的抒情意境上,与前两者背道而驰,将抽象的“幽玄”抒情美学表达至极致。从这一点看,作为日本最古老的传统戏典,能剧本具有特殊意义。

能的剧本又称谣曲,其具体结构由“序、破、急”三部分、共五段构成。“序”为开场一段由配角交代剧情,“破”以主配角对话与对唱形式分三段叙述主要情节,最终“急”迅速收尾,这一点与中国元代杂剧及南戏有相似之处。然而,谣曲并不写实地再现时代生活风貌或激烈的戏剧冲突,而将人之情感理念抽象化作为戏剧主体,以幽暗隐蔽的方式逐渐表达。世阿弥创造并发展了能剧目中重要的一种“梦幻能”,即以鬼、神、幽魂为主角展开的能,以舞台背景为梦境,回顾生前往事种种,感慨人世无常,传递对现世的执念,憧憬成佛解脱的结局。其“梦幻”多结合虚实,梦幻与现实交替,虚实真假,本源皆无,当归尘土。正因如此,诸多梦幻能剧目表现出“‘无中万般有’的禅精神”,^⑦作为主人公的亡灵魂魄在宗教指引下得到救赎,最终皈依向善或就此消逝。而观众得以体会潜藏于词曲、表演之外的能剧“余情”之美。因此,梦幻

能最能体现幽玄的美学精神。

(二) 美学理论

世阿弥认为，“幽玄”美学风体乃是“无上之花”，是代表能剧的炉火纯青的最高境界。纵观蕴含世阿弥的能剧理论体系的一些作品，最早的《风姿花传》强调能剧演技之“花”的精进与实用性技巧，而之后的《花镜》、《至花道》则在提升演技的基础上深入细致地阐释了“幽玄”的表现要求。

根据《风姿花传》，演员之“花”随着年龄的增长与演出经验的积累而愈发趋近“幽玄”之境。世阿弥认为，四十四五岁时期，“若还有‘花’尚存，即为真正的‘花’”。而进入五十岁的阶段，世阿弥举其父为例，“尽管他所演甚少又有所保留，但是人感觉其‘花’更艳丽……用树木来比喻的话，即使成为枝叶很少的树，即使成为无枝无叶的老木，但仍有最具魅力的‘花’开于其上。”^⑧所谓无叶而有花的能剧表演审美，已经远远超越“物真似”的模拟程度，表现出其演技中内在沉淀的最深厚精粹，正所谓“幽玄的‘物真似’自成为幽玄”。^⑨因此从外在看来，相较肉眼可见的外在模仿性，老木之“花”已趋于具有禅意的虚无之境，回归“有”的初始本源之无。因此，无枝无叶正意味能的“无上之花”——“幽玄”之美。

而在《至花道》中，世阿弥又将“花”的最高境界称为“兰位之境”。想到达能剧的表演顶点“幽玄”，要点在于“心”，讲求“动十分心，动七分身”，其核心表现在于后天形成之“花”，即能剧表演的魅力与丰采。世阿弥对各年龄段学艺之“花”根据不同特质而提出不同要求与总结，将对诗歌创作的要求化用于表演之上，认为“‘花’呈‘余艳哀婉’之状才会让人觉得富有情趣”。^⑩这种“余艳哀婉”的悲伤气质最先于和歌中出现，而引用进入谣曲后，对“花”的理解程度则决定了能剧演员如何展现谣曲刻画的“幽玄”之风。

而想要达到“幽玄”风体的“无上之花”境界，就应当从心出发，“对万事都用心揣摩”（《花镜》）；学习各种表演技巧和优雅风体；在此之上便是立足现实生活经验的角色模拟。“观赏能艺之事，内行者用心来观赏，外行者则用眼来观赏。用心观赏就是体也”（《至花道》）。“用心”也包括在模拟逼真的同时，学习分辨相差迥异的不同剧目风格，在“强”、“美”、“弱”、“粗”四种不同境界中维持微妙的平衡，从而最大限度地表达谣曲的不同风格：“能乐的演员在演勇悍的风体时，万不可忘记在心里必须保持‘柔和之心’；而演优美的做派戏时，也万不可忘记在心里必须保持‘刚强之心’”。^⑪可见，欣赏与表演能剧的双方均需以心体会，方得“幽玄”之美。

世阿弥始终将为人与演剧相提并论，透过分年龄段的“花”之阐述，间接委婉地形容了人生不同阶段的特质。“幽玄”这一禅意浓重的美学观念投射进入人的内心，构造出理想中平静、寂寥但安定的内心世界，这不仅是日本文化提倡的个人理想境界，也是能剧表演的无上之“花”。

此后，世阿弥的女婿与徒弟、代表金春流能剧的金春大夫禅竹继承并发展了“幽玄论”，尤其通过剧本内容上“无常论”的充分表达，将能推向了“幽寂”的境地。经过此三代能剧艺术家的创作发展，能的“幽玄”美学特质开始凸显，此后沿袭六百多年。

三、谣曲中的“幽玄”美学范例

在能剧中，以舞蹈动作为主要叙述模式的舞台表现，将情节冲突弱化为背景符号。诸如

爱情这一永恒的戏剧主题,出现在舞台上的魂灵“凭栏”回望人生之爱,洗练浓缩的情感在梦境虚幻幽寂的氛围中尽收眼底。能剧终时,多有“为我成佛祈祷”等台词表达,尽管其中佛教因素已消失殆尽,其残存痕迹仍旧是传达人世无常的“幽玄观”的基础。平安时代以来,日本传统的神道思想与外来佛教相互不断摩擦融合。在此精神指引下,在面对代表着自然万物的八百万神众的信仰之时,佛教无常生死观得以保存,在战乱时抚慰贵族平民之心,和平时融入武士道“向死”精神的一部分。能创立之初,依然依存于神佛二教,并在舞台架构、剧本描写等方面受其影响,神佛二教也因此成为促成“幽玄”的思想支柱之一。尽管也存在少量剧目表现戏剧冲突,但能剧往往以追忆过去为重点,如《自然居士》、《小町》等名剧,以往昔繁华衬今日衰败。

相当数量反映武士生活的谣曲,多取材于《平家物语》、《源平物语》等物语文学中的战争传奇。相比当时盛行的皇族文化情趣,其中高雅优美的内涵减少,愈发侧重武家质朴之风与无常之感,其中“幽玄”情趣达到了顶峰。

《风姿花传》中,世阿弥也论述到戏剧刻画追求“幽玄”的内容:“由于模写的角色的性质,本应要求幽玄的余情或风趣之处,作者却将‘粗’的词句,或将人所不易理解的晦涩的梵语、汉语写进去,这不能不说这是作者的错误。”^⑫这是“幽玄”美学对戏剧语言的要求,也促使世阿弥“将能诗化,使能成为一种诗剧”,^⑬以大量优美和歌为语言载体描述宫廷贵族男女故事,将“幽玄”舞姿作为主要表现手法。谣曲对白上,世阿弥以长篇和歌与连歌编织出人物内心幽美寂寥的意境,文学性极强。可以说,其部分谣曲乃是古代和歌典故的故事化,以大量歌句组成一个故事,其故事主体恰是一首首和歌。本时期,藤原定家父子的“幽玄”风格的颓艳和歌盛行,不可避免地对世阿弥剧本创作带来了语言风格上的重要影响。谣曲结构严谨,短小精巧,辞章典雅,韵律性强。能剧多直接引用日本的和歌诗句,并融入大量双关语、谐音与古语,相比表演形态上的发挥,剧本本身更具强烈抒情性。

作为能剧史上最杰出剧作家,世阿弥的大量能剧作品具有“诗情美”和“幽玄美”的特质,代表了能的主要剧本风格,多为后世作家沿袭。以著名的《井架》为例,《井架》故事取材于《伊势物语》,以秋季大和国为背景,讲述云游僧在大和在原寺与一村女相遇之事。村女讲述自己与歌仙在原业平^⑭的故事,并表明自己就是歌仙之妻纪有常女(井姑娘)。井姑娘之魂此后登场,身着业平的贵族男服,在井水中映现了业平的身影,因此而思慕业平,跳起舞来。

开场后,僧人与村女相遇时,村女唱道:“清水清澄月亦明,让我心亦澄。秋季夜色多清冷,古寺少人踪。晚风吹拂庭中松,夜深人更静。明月渐向西方斜,斜檐杂草生。静夜无人独追忆,追忆往昔情。已无任何期与待,缘何世中行。人所经历各种事,都留记忆中。唯有一心拜佛勤,无休亦无终。求佛之手牵彩线,引我入佛境。佛光普照迷惘世,众生极乐行。阿弥陀佛宏愿景,如画展夜空。明月西行极乐界,光照秋夜澄。惟闻风吹松涛响,无常风不止。无常好似俗世梦,何音梦终剧?”^⑮此番话语乃是引出身世的情感表达,利用借景抒情、融情于景的手法,透过秋夜古寺的寂寥景物,追忆往昔情感,将俗世哀怨寄托于佛教虚无观。

作为剧目中见证情感冲突的重要配角,云游僧的话语具有烘托气氛、推进剧情之功效,并诉说着主角井姑娘对俗世人生的恋慕和内心向佛的解脱渴求,展开戏剧画卷。村女退场,井姑娘上场前,僧侶如此唱道:“在原寺内夜色浓,月悬秋夜空。月下重新现往昔景,古人今显形。和服衣袖翻将来,梦中待相逢。青苔之上入梦境。”^⑯遂描绘展开秋夜明月、青苔入梦的虚幻场景,为井姑娘魂出场而铺陈。

井姑娘魂出场跳序舞,与歌队对唱:“飘袖宛如风吹雪,舞姿好似飘雪轻。”“今日来此在原寺,犹如返回前世中。”“古寺井水清,明月亦清澄。”“明月莫非去年月,今春莫非往年春。业平吟咏此和歌,曾是何时记不清。”^⑩

其中,“明月莫非去年月,今春莫非往年春”^⑪乃是《伊势物语》中在原业平的和歌名句,又译作“月岂昔时月,春非昔日春。此身独未变,仍是昔时身。”不禁使人想起唐朝诗人张若虚诗作《春江花月夜》中“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两者均借月叙述情感,其情感趋向却截然不同。张若虚由岸汀明月引发哲理探求,把思绪引向人生真谛。孤月是永久不变的,而“孤月”之孤寂由思妇的心灵撞击而生。而在原业平与井姑娘的和歌中,明月从全景中抽离,其寄托并非只有井姑娘的思念,而是体现出了一种超越性的普遍“怀旧”意识,将佛教无常置于一切思情之上,在淡然景致中展开极致虚幻的“幽玄”美学。

结尾处,歌队唱道:“亡妇幽魂此形态,花萎色退惟残香。在原寺中过一夜,报晓钟声荡。夜色朦胧天将晓,风吹古寺蕉叶响。梦中醒来天已亮,梦中醒来天已亮。”^⑫梦醒剧终,回归现实后一切归于虚无。这种将意识与现实截然分开的叙述形态,始终将梦境或虚幻作为表达情感的最终平台。无论对白如何发展变化,全剧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幽寂的烙印。

四、表演形态中的“幽玄”美学

除谣曲这一能剧本形态,能剧的表演形态从外形、姿态与舞台等方面,也充分展示出“幽玄”美学的文化审美趣味。动作形态所蕴含的内涵与代表抽象符号的舞台器具相结合,从硬件与软件两方面加以表现。

《风姿花传》中,世阿弥以“花”形容能之美感精髓,从静态的角度而言,不外乎扮相与道具之美。在扮相上,能演员扮演剧中人物要佩戴相关假面具,即“能面”,如翁面、男面、女面等。室町中期,现代能面样式逐渐形成,其宗教意义削减,随着对美感的强调而更为注重外形美学。能面表情除去鬼怪幽魂的夸张丑恶外,男、女面多保持平静、柔和却又韵味无穷的“中间表情”,有的看似微笑,眼角却如泣如诉;有的看似悲伤,唇边却漾出一丝笑意。这对演员的表演姿态有极高要求。有能剧界人士认为,“能面为能之生命”,“能面之心乃能之心”,^⑬可见其重要价值。表演时,由于能面的硬度和构造,面部表情较少,视野有限,发声吟唱时肌肉难以大幅度运动。因此,戴上能面,“否定生身、实现抽象之所在”。^⑭否定生身,即否定作为“人”的肉体,凸显精神领域的神圣元素。无法在面部做出相应的改变,便从心而动,将内心对角色的体味与驾驭展现在缓慢、细腻且微妙的姿态与动作中,与中间表情能面相映照,并丝丝凝合。

能剧中,演出愈发深入,表演动作愈发轻缓、静态或凝固,某种程度上,如同山水画中的大片留白,回归了艺术的原初、人生的虚无状态。正因为“无”即是原初,是一切的源头与轨迹,如同万物之“道”。融入寂寥、哀婉的无常感慨,能面张开虚幻的视域,以完全平淡的外形表达静态的“幽玄”美。从这一角度看,为表演留白的能面,代表了能艺术的形象美学。能剧本固然借诗歌表达深刻“幽玄”之意,若无能面与演员结合,质朴、原初的表演姿态,也仅仅是纸上的文字,而非生动的场景情境。

在能面具的主导下,能服饰、动作等抽象为一个统一体。能面具自身并不只是静止的美

艺术品，经过与演员互相磨合的舞台表演历程，拥有了更幽美、更深刻的性格。

除去能面，能道具、能服饰均为能的重要硬件。其简洁质朴的设计，也为幽寂的场景、“幽玄”的姿态展开提供了抽象的表达途径。能装束，即能服饰真实再现了从唐朝传入、在安土桃山时代急速发展的染织工艺，多采用花鸟风月等自然式样，运用稳重高雅的色调，与能面组合，表现为能演员形象之“幽玄”美。道具方面，包括房屋、车辆、山川草木等内容，以简洁类型化的形状辅助程式化、抽象化的表演形态。竹制的舟、屋棚、车、坟冢，同中间表情的能面一样，以形态的充分质朴，回归戏剧艺术的原初，即高于一切外在修饰的表演形态。这决定了演员与能剧语境赋予的内涵意义超越了物体本身，可称意识与现实分离在道具上的体现，如竹编裹以白绢和树叶的“坟”，立柱与白布组合而成的宫殿等。又如取材自《源氏物语》的能剧目《葵上》中，光源氏曾经的情人六条御息所遇见情敌葵上后为嫉妒蒙蔽心智，大发雷霆而至发狂。此时，演员脱下代表美人的女面，换上龇牙咧嘴代表鬼怪的般若面，表现强烈妒性。但代表表情敌葵上的并非实际演员，而是舞台中央的一件衣物。六条的扮演者将其视作所痛恨的情敌，充分表现出憎恨与幽怨情感，将抽象符号外化为精准生动的表达，才是道具对于演员意义的所在。因此，能乐才得以成为“凭借歌舞来彻底‘表现’的世界，是人的一半情欲的典型化和形体动作的抽象化”。^②

能剧场舞台布置，其主体是用白木茬建造起来的朴素的建筑，^③庄重的外观提供给表演平台“幽玄”的气氛。建筑外观乃特意为能这种象征性的艺术而设置，形成于室町时期，在此后安土桃山时期定型。能剧场与中国戏剧剧场最大的不同，在于连接方形主舞台的长方桥廊——长14米，180度面向观众，通向称作“镜间”的准备房间。伴奏与歌队均在主舞台靠后与靠右有固定的位置，而表演者上场时，在镜间内凝神定气，戴上能面而使心进入角色。此后，从镜间挑起门口的扬幕，自内缓步而出。因此，桥廊也是表演空间。

桥廊靠近观众一侧前，均等地种着渐远渐小的三棵松，一说，有指引天神降临人间，观看幽灵表演之意；^④一说表示渐渐近来、渐渐远去的时空感。^⑤这样的舞台形式，恰好为梦幻能提供了充分发挥的空间：主角的魂灵从天界或地狱世界缓缓降临，经过几颗松树，以幽冷、孤怨的姿态进入现世，在现世回望当初的人生，感慨人世无常与寂寥怨情。讲述过自己的故事，在人神的共同注视下，再回到幽深的另一个世界，一切只是梦境。

能剧中，梦幻能中诸多情节都在这条桥廊上行进。无论是它所代表的深刻含义、背后体现的佛教人世观，还是演员在桥廊上缓步行进所传达的信息，都因这一整体所表现的“幽玄”美学而笼罩着淡淡的恐惧之感。但这恐惧却并非使观者畏缩，而是愈发深入地进入鬼神幽灵的世界。在“物我合一”的日本人心中，八百万自然神与他们为伴，主宰与掌控着人们的衣食住行，包括戏剧娱乐。能至今保留着“娱神”的目标，观赏能的过程，一如参与祭奠供奉的宗教仪式。在审美同时，无论是遥望桥廊的观众，还是身处两个世界连接之处、代表神鬼的演员，都得到灵魂的洗涤或安抚。如若通过表演充分实现这一目的，“幽玄”境界便触手可及。就这一点而言，相比其他各地区的正统戏剧，日本戏剧始终散发着浓郁幽玄的“鬼”气。因此，能剧强调幽寂演出空间形态既应演出而生成，又在其生成之后，翻转而对能演出施加影响，使其形态上的“幽玄”美学加深。

作为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能演员的动作同器具一样程式化、抽象化，利用看似简单，然而凝重精致的手脚动作表达幽深情感。能动作以静止姿态为原点和终点，愈到关键之处动作愈发缓慢，其目的在于给予观众更多也更大的遐想空间，以充分体味其中“幽玄”情感内涵。尤

其是步行动作,作为所有静态动作的基础和能舞的中心,本身就具有戏剧表现的诸多功能。各种瞬间的精妙心情转变,都可通过步行动作的细微变化体现。

动作中的舞蹈部分,则是体现“幽玄”情怀的重要形态。无论是梦幻能还是现在能,大部分剧目在高潮部分均存在舞蹈配合对唱的表演形式,以舞姿的高雅优雅配合唱词的幽凄婉转,将整体气氛推向高潮。同其他动作相同,愈是高雅、关键的部分,舞姿愈加缓慢,其中千般情感幽深曲折将如何融入“幽玄”的情境,传递情感信息,对演员的考验就在于此。诸如《井架》中井姑娘的舞姿,行步虽缓,在幽玄的气氛烘托下,每一步都浸润出对在原业平的思念与追怀。尽管最后仍是梦境结束,回归虚无,其舞蹈姿态本身传达的信息有着抚慰亡灵的作用。

五、结语

能也曾受到过外国文化的影响,但始终保存其民族文化的美学传统。日本民族性始终保持着两个极端——即菊与刀,或称樱花与武士。武士代表阳亢坚毅之思,樱花则代表哀婉凄艳之美,在开放最盛时凋零,乃是其美之渲染到达极致。这是“幽玄”美学对自然的解读。至刚与至柔的结合,此乃日本民族的生活状态。反映在能上,乃是男演员沉稳雄浑的音声与优雅表演形态的结合。无论是伴奏者还是演员,能之“幽玄”姿态、动作皆如发自灵魂深处,具有撼动人心灵的神圣力量。

能创立之时的室町时期,传统文化迅速繁荣,在前一阶段文学繁荣的基础上,将“幽玄”美学运用到各方面:“枯淡的水墨画,静寂的佗茶,清纯闲素的生花,龙安寺的石庭,以及银阁寺闲雅的庭园等等,就是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文化。”^⑩无论建筑、书画,还是花道、茶道,发展至今仍旧保有“幽玄”的影子。因此,能的艺术美学自然也遵从这一大趋势,随着世阿弥等一批杰出艺术家的完善发展,将其每个要素与“幽玄”充分融合,逐渐影响到狂言、歌舞伎、净琉璃等其他古典戏剧艺术。

尽管世阿弥之后,日本古典戏剧界不曾出现更令人瞩目的戏剧家,戏剧理论的创新也逐渐衰退,但能剧的“幽玄”美学特质,却已不再只表现于能自身,而逐渐发展为戏剧美学的理论标帜之一,为日本本土戏剧的美学表现提供理论指导,影响至今。

注释:

- ①吴廷谬等:《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08页。
- ②翁敏华:《中日韩戏剧文化因缘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142页。
- ③张文江:《风姿花传讲记》,《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第4页。
- ④同上,第17页。
- ⑤余秋雨:《戏剧理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58页。
- ⑥同上,第53页。
- ⑦唐月梅编著:《日本戏剧》,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26页。
- ⑧世阿弥:《风姿花传》,天野文雄、王冬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1页。
-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十册,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73页。
- ⑩世阿弥:《风姿花传》,第53页。
- ⑪唐月梅编著:《日本戏剧》,第43页。
- ⑫余秋雨:《戏剧理论史稿》,第53页。

- ⑬王冬兰:《镇魂诗剧:日本古典戏剧“能”概貌》,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第93页。
- ⑭在原业平(825–880),平安时期著名歌人,六歌仙、三十六歌仙之一。
- ⑮王冬兰:《镇魂诗剧:日本古典戏剧“能”概貌》,第164–165页。
- ⑯同上,第168–169页。
- ⑰同上。
- ⑱原和歌“月やあらぬ、春や昔の春ならぬ……”
- ⑲王冬兰:《镇魂诗剧:日本古典戏剧“能”概貌》,第169页。
- ⑳同上,第39页。
- ㉑翁敏华:《中日古典戏剧形态比较——以昆曲与能乐为主要对象》,《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第93页。
- ㉒河竹登志夫:《戏剧概论》,陈秋峰、杨国华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第91页。
- ㉓松原刚:《现代中国戏剧考察录》,丛林春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第105页。
- ㉔蒋星煜:《中国戏曲史钩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0页。
- ㉕翁敏华:《中日韩戏剧文化因缘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147页。
- ㉖余秋雨:《戏剧理论史稿》,第48页。

(李依含: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本科生 责任编辑:徐静波)

中心大事记

2012年下半年

- 6月 张浩川副主任主编的中国第一部日本留学指南工具书——《日本留学指南》出版,该书首次收录了日本所有大学的留学信息资料,受到日本文部科学省的高度评价。
- 7月6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未来10年亚太安全合作架构与中日美三边关系”研讨会,胡令远教授应邀出席。
- 7月6-8日 徐静波副教授赴韩国仁川参加“一个亚洲”国际学术会议,探讨亚洲区域交流和合作事宜。
- 7月12-14日 贺平讲师赴日本立命馆大学,就中日对于东亚共同体的比较研究发表主题演讲。
- 7月17日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举办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研讨会,胡令远教授应邀出席。
- 8月15日 胡令远教授出席在香港大学召开的“日本研究:动态与走势——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研讨会。
- 8月15日 在香港大学召开的“中华日本学研究协会(香港)”代表大会上,胡令远教授当选为该会副会长。
- 8月29日 胡令远教授、张浩川副教授赴北京参加由中华日本学会主办的“增进互信互惠 共同面向未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 8月30日 我中心与中华日本学会、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在北京国际饭店联合举办“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酒会”,中日友好及相关人士150余人出席。
- 9月1日 中心向Find Asia Limited总裁余晓先生颁发兼职研究员聘书,聘期2年。
- 9月7日 胡令远教授应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之邀,为该院300余名研究生作中日关系专题报告会。
- 9月8日 贺平讲师赴北京参加外交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日本外交:新议程与新方向”学术研讨会。
- 9月9日 戴晓英副教授赴日本一桥大学创新研究中心访问研究,研究课题为“非完全竞争体制下的创新:中日的比较研究”,访问期至2013年3月8日。
- 9月15日 胡令远教授应邀出席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举办的中日关系研讨会。

- 9月18日 胡令远教授应上海交通大学邀请,赴该校作中日关系专题报告。交大党委副书记徐飞教授、校党委宣传部长顾峰教授及200余名师生出席。
- 9月26日 早稻田大学依田熹家教授来访并开设讲座。
- 9月27日 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驻日原大使、复旦大学特聘研究员徐敦信先生应邀在复旦大学作题为“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的辅导报告。
- 9月28日 胡令远教授应邀赴中山医院作中日关系专题报告。中山医院党委书记秦新裕教授、院党委沈辉副书记及60余名党员医务工作者出席。
- 10月22日 IMIW株式会社神村昌志会长来访。
- 10月25日 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新闻处新任文化领事高山美果一行3人来访。
- 10月27日 “多元文化交融下的现代教育——第七届池田大作思想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胡令远教授应邀出席。
- 10月30日 日本国誉株式会社2012校园宣讲会在中心举行。
- 11月1日 郭定平教授赴英国诺丁汉大学任孔子学院院长。
- 11月2日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胡令远教授出席。
- 11月3日 徐静波副教授参加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课题”。
- 11月6日 胡令远教授应邀赴上海海关学院作中日关系专题报告。
- 11月17-18日 徐静波副教授参加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举办的“中国和日本:自画像和他画像”国际学术研讨会。
- 11月17日 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郁志荣副主任来访并开设讲座。
- 11月17日 国际交流室沈浩主任赴日本进行日本养老保险情况调查,访问调查期至2013年1月3日。
- 11月29日 胡令远教授赴日本神奈川大学参加“东亚的日本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 12月3日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第13届会员大会第4次会议暨学术年会举行,胡令远教授当选为学会理事。
- 12月8日 瑞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调查部部长陶山健二访问中心,并作2012年度复旦瑞穗冠名讲座第一讲“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方向——借鉴日本政府和证券市场的经验”,校内师生80余人参加。
- 12月17日 瑞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调查部高级研究员杉浦秀德访问中心,并作2012年度复旦瑞穗冠名讲座第二讲“亚洲股票市场和日本企业发展战略——政府与企业的发展战略,从投资者视角观察”,校内师生40余人参加。

- 12月8日 中心与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共同举办“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趋势”研讨会,国内近50位专家学者与会。
- 12月15-16日 “中国日本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日本史学会2012年会在天津举办,胡令远教授出席,并当选为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
- 12月17-20日 徐静波副教授参加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联合举办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
- 12月18-19日 由中心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后援的第22届国际学术讨论会“全球格局变动下的中日经济关系走向”隆重举行。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经济研究室主任张季风教授、原上海世博会日本馆馆长江原规由发表基调演讲,复旦大学校长外事特别顾问陈寅章、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佐治智领事出席并致辞。日本京都大学、同志社大学、东北大学以及中国社科院、南开大学、山东大学、河北大学、辽宁大学、上海社科院等中日学术研究机构近50位知名学者与会。
- 12月28日 日本独协大学经济学部学部长斋藤美彦教授,我中心原副主任、现明治大学教授童适平先生来访,商谈合作事宜。

(华 莉)

目 录

政治·经济·外交研究

中日韩三国企业经营课题问卷调查报告 2011

..... 张浩川等(1)

中国崛起、中美日安全困境与钓鱼岛争端 朱 鸣(18)

日本与印度“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探析

..... 李 坤 杜 钦(29)

(一) 论中韩战略合作及其对日本的战略影响 查晓刚(37)

(半年刊)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析论 朴昭姬(48)

东亚跨区域双边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国内动因 郭 佳(55)

主 编 胡令远

副主编 贺 平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李振声 陈建安

林尚立 郑励志

胡令远 郭定平

贺 平 徐静波

樊勇明 瞿志军

社会·历史·文化研究

“兴亚论”与“东亚共同体理论”的源流分析

..... 张 曦(63)

模因论视阈下茶文化在日本的传承与创新 彭新勇(72)

浅析日本能剧之“幽玄”美学特质

——以世阿弥戏剧为中心 李依含(77)

2012年下半年刊

(总第 39 期)

2012年12月出版

附:中心大事记 华 莉(85)

稿 约

一、本刊为日本研究的综合性刊物,将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展开多视角、多层次的探讨和研究,以期为我国日本学研究的繁荣和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作出贡献。为此,本刊特向校内外从事日本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诚意征稿。

二、凡有关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文学、教育、法学、新闻传媒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均受欢迎。立意新颖及从中日比较的视角展开研究的文章尤受欢迎。

三、来稿要求:

1. 字数一般在五千至一万之间。
2. 文稿请用 A4 纸打印。来稿一般不退,三个后未接到通知的,请自行处理。
3. 正文前请附“内容提要”、“关键词”;注释务请附在文后。
4. 请详写作者真实姓名(用笔名者)、职称、通信地址(包括工作单位、部门和邮编),以便联系。
5. 来稿请寄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集林》编辑部,邮政编码 200433,同时将电子文本发送至如下邮箱:

huali100@fudan.edu.cn

四、来稿一经采用,即奉致稿酬。